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费虹寰主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
(巨星灿烂丛书/刘武生主编)
ISBN 7-5073-1052-3

Ⅰ.周… Ⅱ.费… Ⅲ.①周恩来(1898~1976)-生平事迹
②中国共产党-党史-历史事件 Ⅳ.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1701 号

巨星灿烂丛书·周恩来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

主　　编/刘武生
本册编者/费虹寰
责任编辑/孙　翊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新时代服务公司
印　　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　　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 开　18.125 印张　415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73-1052-3/K·503　定价:198.00 元(全 7 册)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巨星灿烂》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刘武生

副主编　孙　翊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双梅　王玉强　王纪一

刘武生　刘金田　孙　翊

张素华　张爱茹　赵士刚

度　平　费虹寰　蔡庆新

4C9707

新的开端

——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五四运动前夕，一个青年从日本回国。出国时，只有满腔的壮志和求索的雄心。但一年多的异国生活见闻和新潮洗礼，为他的灵魂和血液浸注了理性和成熟

1919年4月间，一个面貌清秀的21岁的青年告别东瀛岛国日本，告别一年多来朝夕相处的老同学和新朋友，乘坐轮船，回到了他的祖国。

这位青年1917年9月东渡之前，曾经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他像很多同学一样，怀着"济世"的宏愿和振兴中华的决心。可是，两度升学考试的失败和日本社会的现实，使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这时，国内南开学校大学部设立的消息传来，又使他重燃了希望的火花，于是，他归来了。

回想他离开祖国的时候，身无长物，只有满腔的壮志和求索的雄心。如今他回来了，依然是身无长物。但一年多异国的

生活见闻和新潮洗礼，已经在他的灵魂和血液中浸注了几分理性和成熟。

他，就是中国现当代史上声名赫赫的周恩来，一生都在时代波峰和浪谷中遨游和搏击的弄潮儿。

在留学日本短暂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可是它们并没有给他彻底解决救国问题的良方。但他在偶然中看到的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8 年 4 月 23 日的晚上，周恩来到东京堂去买书，在停下来随便看看新出杂志的时候，看到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他。回来后，他在日记中追记了 800 多字的摘要，里面说：

> “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
>
> “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做两派，一派是‘过激党’，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即列宁）。还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
>
> “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

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日本的社会现实和新思想出版物，也给了周恩来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的机会。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除此之外，他还是河上肇创办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读者，思想受到震撼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在山河破碎的祖国和异域文明的勃兴的双重作用下，周恩来已经开始用新视角观察社会，并着力于参加对旧世界的改造了。

归国前夕，周恩来曾在京都写下了一首《雨中岚山》的诗作，其中写道：“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可以肯定地说，这“愈见姣妍”的“一线阳光”和周恩来“偶然中见着”的“一点光明”，就是周恩来心中憧憬的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就是这样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朦胧感受归国的。

周恩来投身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他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

这时的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划时代的思想革命。几年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中国大地开始焕发

出思想的生机，人们激情洋溢地呼唤着真理，呼唤着公理和正义，呼唤着使中国新生的救国思想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战胜国的一员。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奴役的中国人民盼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们的目光自然聚焦于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

会议开幕后传来的消息，却使中国人的心里不得轻松：日本会接替德国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情况可能会比以前更为恶劣。果然，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路易·乔治和克里蒙梭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所有的权益都转让给日本，并没有提及日本1914年所作“交还中国”的诺言。这项决议后来被写入了《凡尔赛和约》第8号第156条、第157条和第158条。

此外，中国在4月曾向和会提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说明中国“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订之条约和换文”；另一个是关于下列七点的调整：（一）废除在华所谓势力或利益范围；（二）撤退外国军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消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恢复关税自主权。但是，都被和会拒绝了。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猛地跌入了沮丧和愤慨的深渊。一个北大毕业生曾追述“五四”前几天学生不安的情绪和对西方国家的失望。他说：

> 巴黎和会的消息最后传到这里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记得5月2日晚上，我们很少人睡觉。我跟一群朋友谈了几乎一整夜。结论是更大的一次世界大战早晚会来，并且会在

108045

东方作战。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任何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所谓伟大领袖像威尔逊这种人的原则。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要奋斗。

五四爱国运动的烈火就这样被点燃了，而且越烧越旺，终于燃遍了神州大地。

5月4日那一天，愤怒的学生和群众在北京首先喊出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被卖国的北洋政府拘捕了30多人。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进行广泛的示威游行和罢课声援，揭露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各界奋起救国，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周恩来回国后，离学校开学的时间尚早，就直接在大连登陆，前往沈阳看望伯父，然后，他又来到哈尔滨东华学校作客。5月中旬，他回到天津。此时运动的形势发展已经是如火如荼了。

周恩来一直十分重视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参与，认为这是获得真知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一回到天津，就投身进了南开校园火热的斗争生活之中。他在给留日南开校友的信中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他曾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曹担任校董。6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学生领袖赴京时，他也曾赶到车站为他们送行。鉴于运动进行两个多月后学生的斗争情绪开始松懈的现状，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对下一步的斗争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108073

为了把天津的五四爱国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由于从前在南开学校主办过《敬业》和《校风》，而成为办报的重要人选。学联负责人谌志笃和马骏找到周恩来，他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周恩来缜密的策划和组织下，《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热火朝天地创办起来了。经过认真的准备，7月12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发刊旨趣》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订数一下子就达到四五千份。

在7月21日的创刊号上，周恩来撰写了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词，再一次获得了各界的一致称赞。

山东问题一直是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所在。8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并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消息传到天津，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周恩来激动地在《会报》上撰文《黑暗势力》，号召全国人民不畏牺牲，打倒安福系的黑暗统治。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经过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共同商定，决定再次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10人，和北京代表15人一起，在8月23日到总统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严惩马良。可是这些代表却被无耻的军阀政府全部逮捕了。

周恩来意识到这正是扩大学生爱国运动的极好机会。8月26日，京津两地的学生公推马骏为总指挥，2000多人再次包

围了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指挥警察，演出了一场“全武行”，打伤学生100多人，逮捕了马骏等代表，扩大了事态。为了营救两次被捕的学生代表，周恩来也随着天津的五六百名学生来到北京，战斗在第一线。他们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终于在全国各地的声援下，迫使反动政府在30日释放了全部请愿学生代表。

周恩来参与创建“觉悟社”。“觉悟社”成为全国著名的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厉害”

9月2日，请愿代表们高兴地乘火车返回天津。在火车上，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邓文淑（邓颖超）等人说说笑笑，热烈地交谈着斗争的心得。他们在斗争中深切地感到，由于封建意识的束缚，男女两界各自为战，极大地影响了各自力量的发挥。可喜的是，眼下这个界限正在一点一点被冲破，如果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能够合并起来，势必力量大增，而且可以协同步调，向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发起更为有力的冲击。聪明的张若名提出了合并的动议。周恩来接着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为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大家一致赞同周恩来和张若名的提议。爱国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就呼之欲出了。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进行筹备工

作。经过一个星期的充分酝酿，他们决定成立一个20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定名为“觉悟社”。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两个组织各出10人。这个团体的宗旨，由周恩来考虑拟定，在成立的会议上民主讨论通过。

9月16日下午，在天津草场庵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办公室里，觉悟社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怀着激动的心情，起立宣布开会说：

“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的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的人互相还没有交谈过。先请女社员们介绍一下吧！”

郭隆真逐个介绍了女社员。接着，与会的男社员也进行了自我介绍。

会议决定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名叫“觉悟”，团体的名称就叫“觉悟社”，最早的会员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根据大家的共同看法，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

> “觉悟”的声浪，在20世纪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本着《觉悟的宣言》所阐明的“革心”和“革新”的精神以及求得大家“自觉”和“自决”的宗旨，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先生前来讲演。李大钊先生的褒奖和鼓励，使全体社员深受启发。

转眼暑假过去了，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校园里，社会上，再次掀起了爱国学生运动的高潮。此时，周恩来顺利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后来大学部改名为南开大学，他成了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开学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觉悟社成为了天津各界人士心目中的明星——他们不但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和罢课斗争，还多次请社外名人讲演，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广大爱国青年在斗争中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经验，增长了见识，壮大了力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北京的《晨报》客观地评价说：“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做觉悟社。”

在“一·二九”流血惨案中，周恩来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生涯的滋味。“思想是颤动于狱中。”陶然亭聚会后，他的心灵和思想之舟又一次起锚，在严修的资助下，踏上旅欧的万里航程

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影响巨大，还同它曲折发展的过程本

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断有新的事件发生，运动也就不断地被引向深入，科学和民主的观念也就愈发深入人心。

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从11月25日到1920年初，天津爱国青年纷纷投入到声援福建人民、抵制日货的斗争中，以周恩来为首的觉悟社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激起了黑暗势力的恐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决心严厉镇压爱国运动。1920年1月23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的时候，遭到了三个日本浪人的殴打，反动警不但不为同胞做主，反而镇压请愿学生，逮捕各界代表，查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的办事机构。

29日，周恩来率领各校学生五六千人，直奔直隶省公署请愿。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被推选为代表，强行闯入省公署，遭到逮捕。外面的请愿学生也遭到殴打，酿成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

周恩来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生涯的滋味，但他并没有消沉，而是愈加坚决地和战友们一起展开囚牢中的苦斗。铁窗之外，天津的爱国学生们在邓颖超等人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展开营救工作。

周恩来等人先是被关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可是反动当局既不讯问，也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直到监狱中的勇士们展开坚决的绝食斗争，黔驴技穷的警厅才不得不把被捕代表移交给地方检察厅。条件改善了，周恩来等人一边坚持合法斗争，一边利用在囚禁中的有限自由，开展体育锻炼和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讨论。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议决每周一、三、五开演讲

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于是，周恩来在日本所接受的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思想，就在监狱中传播开了。“当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周恩来在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分5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所讲内容，据周恩来当时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编者注）、《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虽然周恩来当时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能够在监狱中利用有限的知识，比较系统地讲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问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中，周恩来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情有独钟，是因为在时代大潮的洗礼下，他经过艰难的探索和深刻的思考，已经开始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逐步在理智深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正如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信中所说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7月16日，经过狱里狱外和艰苦的法庭斗争，在天津各界的大力声援和营救下，天津地方审判厅虽然仍以所谓“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但是他们被囚禁的日期折抵了他们的刑期，于是法官宣布期满释放，周恩来等代表们重又回到自由的阳光下。

出狱后，周恩来深感要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把众多的爱国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进而提出“改造”和“联合”的主张。在8月16日北京陶然亭聚会上，周恩来的主张受到了李大钊先生的嘉许。李大钊尤其强调：“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团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李大钊先生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周恩来的

心灵，从此，他的心灵和思想之舟又一次起航，在斗争和实践中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追寻。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由一个怀着满腔报国激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马克思主义真理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他开始感到，中国要走出百年积弱的宿命，开辟出一个活泼泼的新天地，就必须掌握一种全新的革命思想……

此时，国内正兴起着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大批有志之士去国怀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在严修先生的资助下，周恩来也得以成行。周恩来到达欧洲后，在他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明了他这次人生抉择的初衷："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此，周恩来立志追求革命真理和挽救民族于水火的思想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参与中共创建活动。"我认定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五四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思想解放，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和思潮纷纷流行，各领风骚。素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对自由与解放的向往，他们沉潜于自由解放运动的实践和对各种思想的推求比较，寻找着个人的信仰和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踏上旅欧的万里航程。这是一次令周恩来刻骨铭心的旅行。他在将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又向灾难中的祖国深情凝望，他将做一个伟大的盗火者，从天际放射出红光的西方，盗回不熄的火种，照亮祖国的暗夜，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炬。

12月中旬，邮船到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周恩来无心流连异域风情和蓝色地中海如诗如画的风光，次日乘火车来到巴黎。他打算在英国读三四年大学后，再到美国读书一年，以开阔眼界，了解社会。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缩影，这里对于一贯重视社会调查的周恩来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绝好的学校。他因病在巴黎耽搁了半月有余，1921年1月5日来到伦敦。

当时英国煤矿工人正在搞同盟罢工。周恩来在认真考察中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全局性的大破坏，而这场大罢工正是战后欧洲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产物。在此之前，周恩来认为拯救中国有两种社会改革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以暴力革命为特征的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另外就是以渐进改革为特征的英国社会改革的道路。他当时似乎认为两种道路各有利弊，主张将二者结合。通过对这场罢工的考察，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他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道路。

1921年2月上旬，周恩来回到了巴黎，在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他除了日常学习和为天津《益世报》撰稿之外，

一直把“研究主义”放在首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还与觉悟社社员们通信交流学习心得。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还是基尔特主义都“不免等于梦呓”，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周恩来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他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时光，确立终生的信仰并将努力为之奋斗对于青年周恩来来说，不仅意味着绝大的幸福，同时也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无比沉重。1921年春，他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郑重地写道：“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此时国内各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在进行着艰苦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以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等人为核心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也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悄悄诞生，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8个发起组之一。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本来要派出代表参加党的一大，但因为路途遥远，只好作罢。因其在法国所开展的建党活动，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创建人之一。

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还没有联合起来。周恩来从英国回到法国的时候，勤工俭学生同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的斗争正进入高潮，而且听说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救济捐款。2月28日，400多名学生到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示威，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中国学生自由入校。请愿示威代表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逮捕。对这个事件，学生中出现了不同看法。周恩来在《益世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留

法勤工俭学生的大波澜》，在表示同情学生遭遇的同时对他们的某些具体要求和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经过这场斗争，各派革命力量都感到了联合与团结的必要，留法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开始了成立少年共产党的最初酝酿。

1921年6月初，报上披露了北洋政府同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消息。周恩来愤怒声讨了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他与袁子贞等人，联络了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等六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借款通告》，表示中法借款一旦成立，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他们四处宣传，奔走呼号，还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有300多人参加的拒款大会。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终止对借款的讨论。后来，8月13日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又迫使中国驻法使馆全体官员签字声明反对此项借款，拒款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拒款斗争中，周恩来先后写了《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之近讯》等四篇通讯。

1921年9月发生了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周恩来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场斗争。他在别人热血沸腾的时候，冷静地提醒他们要讲究斗争策略，建议各团体留下一部分骨干，以便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进军里昂中法大学的“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写了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文章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昂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922年3月，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一起，从法国搬到德国，住在柏林南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45号。到德国不久，国内传来了觉悟社社员黄爱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残酷杀

害的消息。周恩来满腔悲愤，当即写下《生离死别》这首诗：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周恩来将此诗寄给国内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他在信中写道："正品（即黄爱）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惟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 P. 坚定的倾向。""我认定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为了把留在法国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周恩来和赵世炎、李维汉开始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直到1922年5月底筹备工作完成，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条件就成熟了。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秘密举行。在会上，周恩来报告了组织章程草案，并在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委员中负责宣传工作。

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决定加入5月在广州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接到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并对他们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指示的复信后，1923年2月17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讨论改组问题。经过4天讨论，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并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周恩来在新的五人执行委员会中任书记。3月13日，在正式收到团中央同意加入的公函后，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在党团活动和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大显身手。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入党，与邓颖超定情，成为周恩来的人生佳话。1924年，周恩来应召回国

1922年10月底，周恩来在柏林的住所来了两个陌生人。

长时间的奔波在二人的脸颊蒙上了风霜，然而不变的追求又使他们的眼中充满了热切和渴望。其中一个人身材魁梧，年纪30多岁，显出与其年龄几乎有些不太相称的成熟。周恩来哪里知道，这位来访者早在护国战争中就在蔡锷将军麾下担任旅长，后来又任昆明陆军宪兵司令和警察厅长。在中国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现实中，他毅然弃官出走四处寻找中国共产党。不得其门而入的痛苦煎熬着这位有着赫赫战功的将军。在他和同行者孙炳文——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追求者，并在后来的革命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的革命者——被陈独秀在上海拒绝接纳后，仍然痴心不改，远渡重洋，来到了法国然后又转道德国。当他们几经周折来到周恩来的住处的时候，周恩来从容、得体的谈话，使他们心中升起了归宿感，他们已经感觉到，那一天，他们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了。

那位来访者，就是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在1922年那个金色的晚秋，周恩来和朱德在柏林相识，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另一位来访者孙炳文，也由此成为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在他牺牲以后，周恩来收养了他的女儿孙维世，视如己出。

1922年11月，周恩来和张申府在柏林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夏天，周恩来来到法国，专门从事党团工作。当时他们主要从事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还出版了“传播共产主义学理”的理论刊物《少年》。周恩来在上面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热情洋溢地赞美共产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在马克思以

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清谈；自马克思出，本着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现代的社会经济组织，并从人类历史中找出阶级斗争这条根本线索，这才能顺应社会变迁的客观趋势，得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样的科学结论来。他在详细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以后，着重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而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惟一的指导。”

当时，旅欧学生比较广泛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对初到法国的周恩来也曾产生过一些吸引，但经过认真地推求比较，周恩来很快地摒弃了它的影响。他在《少年》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辛辣地嘲笑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他指出：“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他还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谬论。经过对无政府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的批评，他进一步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认识，以及为之献身的坚强决心。

1923 年 6 月 12 至 20 日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及时与国民党代表王京歧取得联系并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对如何实

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 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实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这以后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11月25日，国民党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周恩来被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还开展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周恩来在参与发起组织并担任中文书记外，还在7月15日旅法华人在巴黎举行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散发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团结斗争。当晚，各团体代表集合，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仍被选为中文书记。

随着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少年》根据斗争需要于1924年2月改组为《赤光》，原因在于“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这反映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的进展。《赤光》有力地批驳了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

争、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的谬论。在《赤光》上，周恩来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此时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任务和远景等问题都有了比较明晰而实际的认识。他在《革命救国论》中尖锐地提出了革命的敌、我、友问题；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中认为：国民革命“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他恳切地提出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指出了它的弱点；为回答国家主义派对国共合作的恶意攻击，他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中精辟论道：

> 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这段话明确地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可贵的。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与远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邓颖超经常鱼雁往还，在来往的信函中，他们谈主义、谈现实、谈理想也谈未来和感情，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在五四运动中结成的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的发展，终于使他们确定了爱情关系。周恩来回国后，他们喜结连理，结成了令人赞叹不已、举世无双的灵魂

同盟。30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女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1924年，国内斗争需要大批干部。根据组织安排，周恩来离法回国。这一年他26岁，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了。

（费虹寰）

岭南烽火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周恩来初到波谲云诡的广州，就参与平定商团叛乱的工作。他的才华在斗争中逐渐崭露出来，受到各界瞩目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法国归来的时候，正是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日新月异发展的时期。在北方，北洋军阀继续着他们风雨飘摇的统治；在南方，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正逐渐站稳脚跟。广州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

这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它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选出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从而使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起来。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便从事过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次他远渡

重洋回到祖国，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当时，广东的政治局势纷繁复杂，波谲云诡，蓬勃的气象之下充满着无量的变数。欣欣向荣的革命形势引起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视。他们在广州阴谋策划以大地主大买办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反动商团叛乱，企图将刚刚诞生的广东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里。

陈廉伯自行筹款百万，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长短枪 9841 支，子弹 337.42 万发，并由悬挂挪威旗帜的丹麦商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8 月 8 日，枪械运抵虎门，所运到的枪支数目较护照多出 4000 余杆。“哈佛”轮运械来广州未经遵章报明，是违反国际惯例的，引起了广东革命政府的怀疑。

于是，孙中山命令杨希闵、刘震寰查办此事，但他们阳奉阴违，“奉令而不照行”。孙中山于是只好在 8 月 9 日命令黄埔军校学生军查缉“哈佛号”。10 日清晨，“哈佛号”被发现开至广州市区省河白鹅潭，孙中山当即令“永丰”、“江固”两舰将“哈佛号”押至黄埔，又令黄埔军校把查获的私运枪械全部扣留。陈廉伯于是调动 2000 名商团军包围孙中山的大本营，蛮横要求发还被扣留的武器，并以鼓动商人罢市和拒收中央银行纸币要挟革命政府。斗争越来越尖锐，早日解决反动商团的武装威胁，已经成为广东革命政府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

可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决定大举北伐，甚至不惜放弃广州而破釜沉舟，北伐各军陆续向江西进发。再加上国民党右派的姑息和纵容，反动商团气焰更加嚣张，他们认为孙中山调兵北伐正是他们进行叛乱的最好时机。

周恩来归来时，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的正是这样严峻的局势。

10 月初，商团进一步把没有发还扣械作为扩大事态的借口。10 月 4 日，全省 188 个商团于佛山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停止纳税，以封锁革命政府的经济命脉，再次举行大规模罢

市，准备以直接手段对付革命政府和革命群众。他们还决定从10月10日起，“规复武装出巡”，其意不言自明。

冲突一触即发。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3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下，各界群众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召开大会，声讨商团的反革命行径。公园里人山人海，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登上主席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

> 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嚣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

会场上掌声雷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的口号声响震云天。会后，广大革命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进到太平路的时候，商团军满街密布，荷枪实弹，警卫森严，正在起运发还之枪械。游行队伍与全副武装的商团军迎面相遇。商团军号枪一响，立即向游行群众施放排枪。手无寸铁的群众当场被打死20余人，打伤100多人。反动商团还四处张贴告示，公开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广州主政。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有力支持下，孙中山立即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并抽调一部分北伐军回师广州平定商团叛乱。周恩来、杨匏安等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10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积极配合下，击败了商团的武装，彻底平息了商团的叛

乱，赢得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周恩来为此在10月30日撰写了《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总结了平定商团叛乱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广州政府受南方军阀挟持，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而时时压迫工人、农民的解放运动，其原因是包围孙中山左右的，大都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文章还强调国民党必须让中间分子打破“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孙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国民党当务之急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周恩来的分析切中肯綮，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恰恰验证了周恩来的科学预见。

青年周恩来的才华在斗争中逐渐崭露出来，受到了各界的瞩目。1924年10月，他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在广东区委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下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在风云突变的岁月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周恩来的到来，使黄埔军校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部成为对学生进行政治训练的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由国共两党

合作于1924年6月创办的培养革命军队骨干的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是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事学校的一项重要标志，因此学校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就显得格外重要。

起初，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是戴季陶。他总是贩卖“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陈词滥调，受到学生们的抵制。接任的邵元冲，也毫无建树，被称为“催眠术教官”。为了政治部主任的人选问题，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伤透了脑筋。这年11月，他总算根据张申府的推荐，并商得中共中央同意，请周恩来前来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周恩来的到来，使黄埔军校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此，政治部成为学生进行政治训练的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

周恩来上任时对政治工作也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但是他凭着对革命事业强烈的责任感，以苏联红军为榜样，结合当时大革命的需要和黄埔军校的实际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他把政治训练和教育作为政治部的中心工作，用上政治课的方式，给广大师生灌输革命理论，培植革命思想。在课下，他还注意采用多种方式，如办好图书馆和书报室，创办报纸和刊物，成立演出剧社，举行演讲会和讨论会，利用标语、口号、革命歌曲等，创造良好的政治教育气氛和环境。在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方面，周恩来扩充了政治部的组织机构，增设了指导股、编纂股、秘书股，增加部员20多人，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各学员队的党代表制度，对各项制度作了明文规定。周恩来还多次强调，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人员要言行一致，起模范带头作用等等。1924年11、12月，由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军校教导团第一、二团先后成立，这是区别于旧军阀部队的国民革命军。周恩来所一手建立的黄埔军校和

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良好开端，其作用一开始就十分显著。经过周恩来的辛勤努力，校园内的革命空气空前高涨，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这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中坚力量。

周恩来的伟大功绩受到了人们的崇高评价。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

> 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周恩来亲冒锋矢，组织黄埔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军队政治工作初显神威。毛泽东曾对此高度评价

1925年1月11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周恩来代表留法组出席了这次大会。

此时，商团叛乱虽然已经平定，但是广州的局势仍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军阀陈炯明盘踞东江地区，对革命政府虎视眈眈。

陈炯明在东江地区实行军阀、官僚和地主三位一体的残暴

统治，欺压民众，盘剥农民，租重税多，手段残忍，并与北洋军阀曹锟、段祺瑞、吴佩孚以及邻省军阀赵恒惕、方本仁、周荫人经常密使往返，函电交加，互相利用。他同帝国主义，特别是港英当局勾结得也很紧。1924 年底，孙中山离粤北上，卧病京师，陈炯明认为广州大元帅府群龙无首，有机可乘，于是便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于 12 月 7 日在汕头重任粤军总司令，以援助广州商团为名，在 1925 年 1 月 7 日，悍然下达进攻广州的总动员令。

当时广州大元帅府所辖各路军队对东征很不坚决，在这种情况下，10 月底到广州担任大本营高等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力排众议，经过一个半月的酝酿和讨论，军事委员会终于决定在 1 月底前开始行动。1 月 15 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决定讨伐陈炯明。

参加东征是黄埔学生军的第一次对敌行动，他们和粤军第二师、第七旅一起共同组成右翼军。周恩来也亲冒锋矢，随军出征。

在这次东征的过程中，右翼军长驱直入，直捣潮汕，取得了淡水之役的胜利；随后，又一鼓作气，在棉湖击溃林虎部主力，从此黄埔校军英勇善战的美名天下流传。很快，右翼军又连克五华、兴宁，迫使陈炯明军队残部退入江西和福建。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这次东征胜利的取得，与周恩来所主持下的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的威力是分不开的。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黄埔校军官兵时刻牢记自己是“革命军”，保持严明的纪律，并适时地展开对民众的政治宣传，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像这样的战地宣传工作，是以往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

同时，周恩来还注意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他在东莞的演

讲中说："本校希望东莞同胞者约有三事：（一）为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之关系；（二）实行民治，县长民选；（三）各界团体宜有强固之组织。"他特别重视民众组织的问题，将武器发给海丰农民自卫军，恢复海丰农会，在东江各地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他还着手打击土豪劣绅，为苦难的人民伸张正义，深受民众的欢迎。

周恩来在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最早尝试。毛泽东曾经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沙基惨案。周恩来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刹那间经历了生死考验。后来他说："惟一的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联合起来，以打倒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

第一次东征的同时，广州的刘震寰和杨希闵叛乱已露端倪，廖仲恺果断建议东征军一部回师广州，于6月12日向广

州的刘、杨叛军发动猛攻。周恩来随军参加了这场战斗。只用了一昼夜的时间，党军就彻底削平了心腹之患。

几乎与回师广州同时，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帝国主义镇压工农的反动事件：福州、青岛、上海都发生了帝国主义残杀工农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此时，担任广东区委常委兼任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和战友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一起，决定在6月19日举行省港工人大罢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

为组织好这次罢工、罢市，6月18日在广东大学召开了由广州各界120个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会上，各界代表愤怒声讨了帝国主义近年来在华的暴行，并决定成立“广州各界对外协会”，隆重推举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为协会主席，还决定以抗议“五卅惨案”声援上海工人和支持“省港工人罢工”名义，于6月23日上午举行10万余人的集会并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军队列队参加，廖仲恺为大会和游行总指挥。

沙基街位于广州城城垣的西南角。这里原本是一个荒凉的河滩，自从对面的沙面岛“繁荣”起来之后，才沿着河滩建起了一条西式街道。这条街道与沙面隔河相望，相距不过50至100米，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木桥与沙面相连。

沙面原来是一个小渔岛，它的“繁荣”其来有自——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者就看上了这个可以由水路直达的小岛。他们贿赂清朝广州府的官员，以此作为“居留地”，允许他们在此居留和停泊商船。到1925年，帝国主义者不但在这里设立了政权和管理机构，建立了英、法、日、葡领事馆，开办了许多外国企业，而且还修造了当时看来相当豪华的维多利亚大酒楼，此地已经成为“国中之国”。即使在岛上工作的中国人，进岛也要持有他们颁发的证件，接受搜身检查。但这种势头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了中国人民顽强的挑战——

自从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帮助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增添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实现了国共合作，帝国主义者才真正感觉到与过去不同了。他们认为，这是继俄国之后在东方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险情，它的名字叫“赤化”；广州此时已经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抱有激进主义情绪的国民党在黄埔建立了军官学校，接受俄国教官的训练，并由此发展了两种对抗情绪，一是反对英国，一是反对基督教。

于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中国人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就愈加激化。帝国主义分子一贯相信手中的洋枪洋炮的威力，认为在中国，只有武力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可是，这一次，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沙面的英、法、日、葡领事馆对当时中国的局势是清楚的，也知道6月18日广州的120个团体已经集会并作出决议，广东和香港外国工厂的中国工人19日开始罢工，23日就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他们猥集在阴暗的角落里，制定了一系列比上海、青岛等地帝国主义屠手们更富有西方高度“文明”特色的办法。6月22日一大早，英国领事詹美逊代表英、法、日、葡四国政府，向广东革命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我从可靠资料获悉，而我也有理由相信，安排在明天的爱国游行的学生分子中有人准备进攻沙面桥，侵入沙面，而企图成为烈士。”我“庄严地警告广东政府，如果任何人企图入英国租界沙面，将会引起武力抵抗，而其后果将由你们政府负完全责任”。“照会”最后说：“我写的语气很严重，以便将来不致有人再说是残酷的帝国主义无辜杀死毫无防备的中国青年。”

詹美逊的“照会”一方面打出了“仁慈”的旗号，摆出一副“先礼后兵”的文明样子，另一方面则是杀气腾腾，给广东革命政府打来一个无法接的擦边球，让你进不得，退又不能。当时广州的一家报纸报道说：

> 22日沙面东西桥铁闸完全关闭，并派水员登陆，所有沙面之重要地点，高筑沙包，如临大敌。又，是日上午11时许，英国浅水舰“罗便号”驶入我华界同德大街海面寄碇。又，是日下午2时，有日本兵舰两艘驶进白鹅潭水面。统计现湾泊沙面之外国军舰，英国三艘、美国两艘、日本三艘。

同时，詹美逊等人19日派兵封锁了沙面东西两桥，即使持有通行证的中国人也一律禁止入内。岛上的妇女儿童一些去了香港，没走的也搬到了船上去居住。

6月23日，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反帝示威大游行的会场就设在东校场，因为当时没有扩音设备，总会场又分为三个分会场，每个会场都有主持人和演讲人，军警界被划在一个分会场。周恩来一身戎装，缠着武装带，打着裹腿，站在军警界分会场高高的主席台上，和汪精卫、何应钦一起主持大会。

下午1点半的时候，声援集会结束了，10万人的队伍，开始沿着预定的路线游行。走在最前面的是香港罢工工人的队伍，其后是工、农、商、学、兵的队伍，队伍迤逦前行，声势浩大。周恩来走在军警队伍的最前面。天空中，革命政府的两架飞机上下翻腾，抛撒下漫天的彩色传单，吸引了全市百姓的注意力，振奋了游行队伍的精神。……

队伍在一步一步行进，危险也渐渐逼近游行的人们。下午3时20分，当队伍行进到沙基街的时候，人们看到了沙面帝国主义的堡垒，群情愈加激奋，脚步撼地，铁臂如林。就在这时，沙面响起了罪恶的排枪和机关枪的枪声，密集的子弹射向了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停泊在白鹅潭的帝国主义军舰，也开始了疯狂的炮击，游行队伍顿时秩序大乱。

周恩来在刹那间经历了生死考验。第一阵排枪响处，和他并肩前进的一左一右两位战友，当即被帝国主义的枪弹夺去了生命。他来不及细想，当即和其他的同事们匍匐在地，并迅速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

屠杀发生的第二天，詹美逊在代表英、法两国政府答复广东革命政府的抗议书时，露出了马脚。他说：英、法租界仅仅是为了对付来自沙面方面的中国军队和军校学生的进攻而进行的武力自卫行动。这恰恰说明，这次屠杀帝国主义者早就选定了黄埔学生军和激进左倾的国民党军作为目标。从伤亡人数来看，也印证了这样的结论——在死难的50多人中，黄埔学生军和党军就占24人，受伤的170多人中，黄埔学生军和党军占53人。

沙基惨案激起了省港两地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7月1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31日，他又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的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联合起来，以打倒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他总结东征和平定杨刘的经验，指出：

> 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联合的努力；打倒刘杨，亦不是军队的

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努力。工农兵联合的势力，已能打倒军阀，犹如摧枯拉朽，现在更要进一步而打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

周恩来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工农兵反抗帝国主义、反抗黑暗的军阀政治的豪情，使反帝反军阀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羊城喜结连理，开始了他们甘苦与共、悲喜分担的事业和生活。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此时身在天津的邓颖超也由于领导并参加了五卅运动而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7月初，她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天津南下广州。

1925年8月7日，邓颖超到达广州黄埔港码头。她已经在信中和周恩来约好在码头上见面。可是，怎么不见他的身影呢？邓颖超认真而耐心地在码头上寻找了好长一段时间，无奈她只好轻叹一口气，按照周恩来以前告诉她的地址独自地寻去。

周恩来的副官陈赓来接邓颖超。可他从没见过邓颖超本人，凭着一张照片在码头上寻找，非常困难。他只好回去向正在日夜指挥省港大罢工的周恩来报告。

邓颖超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来到周恩来住所的门前，房门紧锁着，不见一个人影。正在这时，陈赓回来了。

“您是小超同志吗？”陈赓一下子猜到了眼前的人就是邓颖

超。

“是的，我是邓颖超。您是……”

“我是周主任的警卫副官陈赓。小超同志，可把你盼来了！……周主任派我到码头上接您，可我……”

“没关系，我们彼此又没有见过面，码头上人又那么多，怎么能够接到呢？……恩来呢？他怎么……”

机灵的陈赓马上打断她的话头，接过手提箱，让邓颖超进屋稍事休息。

陈赓请邓颖超在房间里休息一下，连忙四下里忙碌起来。邓颖超转过眼睛打量着陌生的环境。只见室内陈设朴素而雅致。一色的浅色家具，一张双人木床，一张书桌，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几把藤椅，一个衣架和一个洗脸架。放在窗台上的两盆盛开的鲜花，传来阵阵幽香。

陈赓端上广州凉茶，开口笑说：“小超同志，您是先休息一下呢，还是马上让我带你去找周主任？”

“我是来广州工作的，你还是带我出去随便看一看广州的革命形势吧！”邓颖超答道。

邓颖超来到街上，为广州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深深吸引。他们来到文明路中共广东区委，没有找到周恩来，便又来到省港罢工委员会，这里是广东省总工会，为指挥省港大罢工临时将指挥机关设在这里。

陈赓轻车熟路，带邓颖超来到开会的房间。他一边向邓颖超介绍这里的情况，一边将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指给邓颖超看，邓颖超嘴上一边应承着，眼睛一边搜寻着别处。

周恩来正坐在角落里的桌边。已经是五年不见了，他还是那样英俊、严肃、睿智和深沉，只是比在天津的时候更加成熟了，而且有些消瘦。陈赓快步走到他的跟前，用手指了指邓颖

超。周恩来抬起眼眸，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随后继续埋头工作。……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就站起身来和陈延年他们一起走了，将邓颖超和陈赓抛在一边。看来他们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晚上10点多钟，陈赓正要送邓颖超回去，不巧宵禁提前了两个小时，只好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给邓颖超安排了临时住处。夜里，邓颖超翻来覆去睡不着。周恩来的身影和广东沸腾的生活像走马灯一样在她的脑际轮番出现。她知道，这就是她日思夜想的战斗生活。

第二天一早，陈赓捎话给邓颖超，周恩来一早已经赶往黄埔军校去了，今天一下班，一定尽早赶回寓所。

邓颖超赶回周恩来寓所，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去中共广东区委报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热情地接待了邓颖超并为她安排了工作。邓颖超听了陈延年介绍，觉得身上的担子分外沉重，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在她的心中升起……

傍晚，当邓颖超回到周恩来寓所的时候，周恩来早已等在家中了。她接过周恩来递过的热毛巾，与他相视一笑，温馨和思念就像傍晚的日光一样，弥漫在整洁而清爽的房间……当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羊城喜结连理，开始了他们甘苦与共、悲喜分担的事业和生活。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廖案”发生后，周恩来义愤填膺。在调查凶手过程中，周恩来再次涉险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是布满荆棘和艰难曲折的。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后不久的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势

力合谋，指使凶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骑楼门口暗杀了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

廖仲恺的不幸遇难，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巨大损失。周恩来满腔悲愤，作为“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马上参加了调查工作。8月24日，蒋介石和周恩来、何应钦一起商议，决定在当晚加强戒严，组织兵力进行搜捕。他们决定开始戒严的时间为晚11时，并且决定了内部口令。

蒋介石恐怕晚上的行动计划泄露，便私下与亲信商议，又决定提前戒严，并更改了原来商定的内部口令。可他们并没有将变化的内容通知周恩来。

当晚9时过后，周恩来见戒严的时间即将来临，便结束手边的工作，坐车急忙赶回司令部，准备督察部队行动。为周恩来开车的司机是一个有着朴素阶级感情的工人。周恩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来不像其他官僚那样动辄训斥、骂人。司机从内心深处对周恩来充满了尊敬和仰慕，所以他每天都把车开得非常平稳，而且随叫随到，非常尽职。

汽车在不平坦的马路上疾驶。

就在可以看到司令部大门的时候，门卫高喊“停车”。汽车司机从来没有想到周恩来的汽车会在离大门较远的地方被叫停车，仍旧向前行驶。门卫又大声呼问：“口令？”司机按照原定的口令回答了讯问。由于口令错误，加上车没有停下来，门卫手中的步枪就朝着汽车开了火。汽车司机身负重伤，见势不妙，赶紧调头把车拐进小巷，自己却倒在驾驶座上。周恩来在听到枪声时伏下身体，幸免于难。他大声高喊：“我是周恩来，我是周恩来！”灾难被遏止了，司机却在这场事故中无辜丧生。周恩来非常生气，但他来不及去质问蒋介石和何应钦，就一心扑在搜查上了。

直到深夜搜查行动结束以后，周恩来才返回文德里他的寓

所。自从廖案发生以后，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邓颖超在灯下悄悄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一见到周恩来满身鲜血地归来，禁不住大惊失色。周恩来为了让妻子少一点担心和后怕，只是咧嘴一笑，并没有多加解释。

邓颖超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廖仲恺的安葬仪式。蒋介石假惺惺地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说是提前戒严，没有及时通知，害得周主任一场虚惊。周恩来铁青着脸说："多谢蒋先生关照了。以后有事，希望蒋先生还是要多通声气。"

廖案发生后，蒋介石乘机逼走了强劲的对手胡汉民和许崇智，逐渐窃取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领导权。

8月25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9月下半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1926年1月下旬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从此离开了黄埔军校。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这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合作得比较好的时候。这种合作是富有成果的，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有益的，从而给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其中，周恩来的独特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政东江

1925年9月，由于东江地区再次被刘震寰和杨希闵余部

所占领，刘志陆、杨坤如相继叛变，与陈炯明旧部邓本殷阴谋会攻广州。于是，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这次东征进展十分顺利，周恩来主持下的总政治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比第一次东征时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政治周报》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东征纪略》中曾有这样的叙述：

> 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这正是对周恩来所领导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就在周恩来随军第二次东征期间，为了不牵累革命工作，年轻的邓颖超背着周恩来打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周恩来对此惋惜不已。

1925年11月，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地方政权。就这样，周恩来开始了他主政东江的工作。

按照革命政府的规定，东江、南路各行政委员的职权是：（一）督率所属各县县长处理地方行政事宜；（二）对于所属各

县县长，得先行任免，再行报告于省政府。周恩来主政东江，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任命的，也不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的，但对于发挥共产党的作用，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极为注意把群众观点运用于政权建设，使政权体现出充分的人民性。1926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在永平酒店四楼招待汕头各界代表宣布施政方针时指出："一定要使人民知道政府政策实施之目标，然后合作可成。"周恩来还有计划地组织工、农、商、学、妇群众团体，发布保护农工的布告，褒扬省港罢工工人，支持工农斗争。在周恩来的扶持下，东江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妇女群众组织起来的规模都是空前的，而且逐步地团结联合。东江各县、市基本上都有了农会、工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和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有的县、市有了各界的统一组织。

1926 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会议议题涉及诸多方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状况，揭露了帝国主义帮助军阀土豪压迫人民的罪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会议通过议案 93 件，涉及建设、教育、财政、民政、商务、农工、妇女等很多方面，提出了东江民众急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并作出了决议。会议于 3 月 3 日闭幕。这次会议是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之第一步，"启政府与人民合作之机，开东江革命政治之新纪元"。

为了革除封建军阀统治的诸多弊端，拯民众于水火，周恩来大力进行了整顿地方、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他铲除苛政，推翻反动政权，成立新的行政领导机构；认真处理战争遗留的各种问题；大力扶持和积极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为了搞好东江地区的建设，周恩来十分重视人才的使用，团结进步力量，提

携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还十分重视整顿和占领宣传阵地，发展教育事业……

在周恩来的有力领导下，东江所属各县不久便显示出勃勃生机，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秩序开始安定。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遭软禁，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周恩来为北伐做积极准备

正当周恩来准备在东江地区有计划地推行各项改革的时候，1926 年 3 月 16 日，广州革命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出的辞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请求，周恩来仍旧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此时已是蒋介石阴谋策划的反共的“中山舰事件”的前夜了。

3 月 17 日周恩来回到广州后，发现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来往密切，察觉到蒋介石会有阴谋，马上报告了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但由于当时党内思想不一致，未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3 月 20 日，“中山舰事件”便发生了。

在这次事件中，周恩来不畏险难，挺身而出前去质问蒋介石无理扣押共产党员的可耻行径，被蒋介石软禁了一天。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何香凝、谭延闿、程潜、李济深等人的强烈谴责下，蒋介石只好以“误会”为解释，解除了对周恩来的软禁，又不得不释放了扣押的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共产党员在蒋介石的蓄意破坏下，

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国民革命处在危急关头。

当时，周恩来曾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一起，研究对付蒋介石的策略，力主组织革命力量，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可是由于苏联顾问不同意，而且陈独秀也持反对态度，此举只好作罢。但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将“中山舰事件”后遭到排挤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到广州大佛寺，举办了“高级政治训练班”，为发展革命势力、准备北伐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党团骨干。

同时，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集中力量主持军委的工作。当时为北伐战争做好准备，成为迫切的任务之一。周恩来几乎每周都要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党的工作会议，听取汇报，部署工作，为行将开始的北伐做准备。他还曾经帮助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定北伐的军事计划。

在叶挺独立团出师经过广州的时候，周恩来在叶挺家中召集了团内连以上党员干部开会，分析国内外局势和敌人的情况，并向他们提出郑重的希望，激励党员骨干分子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奋斗，极大地鼓舞了全团的士气。

1926年7月9日，在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下，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终于揭开了帷幕。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有力地组织和指导了北伐军中共产党员的工作，为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此时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渐突显。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与他们的种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于1926年底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上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国民

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和《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

1926年12月，周恩来奉命调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离开了风云变幻的广州。

（贵虹寰）

为人民军队奠基

——与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枪声大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受命领导的南昌起义，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呼吁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当时正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议，加紧组织武装力量，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4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要求致电中共中央，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他说：政治上，中央“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从“四一二事变”可以看出，“老蒋只有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汪精卫·陈独秀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他还指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案。”“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

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方面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这是周恩来对蒋介石叛变后提出的应对措施。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意见书分析了当时军事势力的状况，强调趁蒋介石篡夺的政权还不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意见书针对陈独秀妥协投降的错误着重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怎样迅速出师讨伐？意见书从军事战略策略进行分析，建议“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周恩来等提出的这个响亮口号，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选择，也为酝酿南昌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恩来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决定“东征讨蒋”，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从4月下旬起，周恩来在聂荣臻协助下，处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善后工作，并部署江浙一带地下武装斗争。5

月下旬，周恩来赴武汉。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分工主持中央军事工作。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他着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做好应对突发事变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为酝酿决定武装起义，周恩来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5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6月1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方针。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先后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这次湖南暴动。后因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反对，没能实行。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这时，改组后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新政策：一方面，着手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另一方面，以中共所掌握和所影响的部分北伐军队为基本力量，联合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的周恩来，负责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工农武装，以反抗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并将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在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发奎）返粤的准备工作。随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当晚，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军事部同志传达中央决定，并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回忆说：“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传达后，周恩来指

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7月20日，聂荣臻在九江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举行谈话会。鉴于张发奎日益右倾，谈话会提议：

> “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谈话会后，他们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都同意这些意见。

7月24日（或25日），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一）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二）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三）共产国际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举行第二次北伐。根据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进一步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重大决策。

周恩来宣布成立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指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举行南昌起义的决策确定后，周恩来立即紧张地进行组织

准备和军事部署。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赶赴九江，向正在这里讨论起义问题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针对会上讨论中是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起义政纲的争论，周恩来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作出了决定。随后，会议研究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结的部署，并派聂荣臻设法把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朱德家里。朱德向周恩来介绍了当时南昌的军事布防情况，并画了一幅详细的军事布防图。周恩来看后满意地说："你为准备起义立了一大功！"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宣布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接着，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关于起义的各种事项，进行周密部署，贺龙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会议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当天，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先后抵达南昌。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向他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中共前委关于起义的行动计划。一见面，周恩来就坦诚地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即就谈行吗？"贺龙爽快地回答："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风趣地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洗耳恭听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听完周恩来的转达，贺龙立即坚定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7月29日，张国焘却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给中共前委发来两封密电，提出

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周恩来立即和其他几位前委成员商定，起义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准备工作。7月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周恩来和其他前委成员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们坚决表示：

> 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

张国焘看到大家都强烈反对他的错误主张，就声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想以此压服。周恩来被激怒，拍着桌子气愤地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是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经过几小时激烈争论，会议没能解决问题。7月31日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又继续争论了几个小时，直到得知张发奎已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指挥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结束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军歼灭敌军3000多人，缴获机枪800多挺，步枪4000多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天，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共3000多人赶到南

昌。这两个团是以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有很强的战斗力。见到他们后，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三河坝分兵使起义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是起义军南征受挫的直接原因

8月1日晚，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定，主持召开参谋团委员会议，研究南下行动方案。会议决定，取道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直下东江。8月3日，起义军陆续出发南征。周恩来向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了解南下沿途各地情况，并向中共中央写信汇报南昌起义情况后，于8月5日撤离南昌，踏上南下征途。7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占临川。周恩来和其他前委成员研究决定，部队在临川休整几天，正式组建第二十军第三师。当地农民和青年学生纷纷参军。为解决部队粮食给养困难，周恩来研究决定，实行征收地主的粮食、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或罚款的新政策。为稳定部队和提高战斗力，周恩来把追赶上起义军的原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的陈毅，派到第七十三团任政治指导员。周恩来不无歉意地对他说："派你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豪爽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8月12日，起义军进占宜黄。为了向农民宣传土地革命，周恩来指示总政治部起草印发《土地革命宣传大纲》。起义军进占瑞金后，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得知，敌军准备在会昌集结18个团兵力同起义军决战。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参谋

团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先击破会昌敌军。30日，第二十军从东北面向会昌发起进攻，吸引敌军主力；第十一军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进攻，攻占会昌城。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来到第十一军阵地前沿，指挥主攻战斗。周恩来询问因夜行军走错路才赶来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他们坚决表示："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经起义军英勇冲杀，当天下午5时许，起义军攻占会昌城，歼敌6000多人。

会昌战役后，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动情地说："贺龙是个好同志。"50年后，周恩来仍然记得这句话，并且在贺龙追悼会上又说了一遍。

在会昌，从报纸上得知原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叛变投敌，出卖了起义军南征的部署，周恩来立即召开中共前委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决定部队改由长汀、上杭进军东江。9月5日，起义军进驻长汀。在这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写了南昌起义后的第二封信，汇报离开南昌后起义军在瑞金、会昌作战经过。信中说：

> "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信中强调南征的目的是，"建立

工农政权”，“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在长汀，周恩来召开中共前委会议，详细研讨攻取东江的行动计划。会上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和叶挺“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兵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败”。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当时，起义军经炎夏长途行军作战，十分疲劳，盼望早有个安定的地方休整。因此，大多数官兵赞成后一种主张。后来的作战事实证明，这次分兵是导致起义军南征失败的直接原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领起义军一个团先进驻上杭，听取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罗明汇报，并向他介绍起义军南征的任务。当得知闽西地区有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时，周恩来要他们积极配合起义军，并拨给一些枪弹，供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用。在上杭，周恩来等还研究决定没收地主土地，但没来得及实行。19日，起义军进占三河坝。按照长汀前委会议决定，起义军在这里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部队进军潮、汕。三河坝分兵，把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拆开，使起义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23日，起义军顺利攻占潮州。24日晨，起义军进占汕头。26日，起义军在汕头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演讲，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这时，敌军正分三路在潮、汕周围集结。经过几天激战，起义军于30日晚撤离潮州，汕头随之放弃。

撤离汕头时，周恩来已重病缠身，被担架抬着行军。10月3日，中共前委机关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起义军部队，在普

宁县的流沙会合。在流沙，周恩来和其他起义军领导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20多人召开决策性会议。后来，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一书中回忆说：

>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农友做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会议还决定，起义军不再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会议进行中，发现村外山头上已有敌人，于是匆忙结束会议。这时，周恩来高烧达40度，同志们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表示：“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流沙会议后，起义军余部由流沙经钟潭向海陆丰道上的云落前进，进入乌石地区时遭敌军重兵截击。周恩来、贺龙、叶挺等指挥部队还击，被敌军截为两段，部队失控，被冲散了。第二十四师余部1000余人经甲子港赴海陆丰，第二十军余部2000余人由云落赴海陆丰，以同当地农民结合。这时，周恩来发着高烧，常处在昏迷状态，还在喊：“冲啊！冲啊！”叶挺、聂荣臻守在他身旁，几个人只有一支小手枪，已无自卫能力。后来，由当地一位中共负责人杨石魂帮助他们隐蔽起来，并找来一条小船，

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一行人去香港。

周恩来科学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

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英勇奋战，南征终于失败了。南昌起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性转变关头，无论是实践经验还是思想认识都很不够，需要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毛泽东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所说的：“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苛求于前人的。”对于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曾经多次认真总结过。

早在筹备召开中共六大期间，1928 年 3 月 14 日和 5 月 16 日，在莫斯科召开过两次“南昌暴动讨论会”，周恩来、刘伯承、邓中夏等 12 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当事人在会上发表意见。周恩来在 5 月 16 日的会上作总结发言，讲了 8 个问题，其中讲到：“前委到九江时，对土地革命观点模糊，200 亩没收根本没有实行”；“国焘错误在开始时动摇”；“主力下潮汕是错误的，到汕时忽略军事”；“叶挺主张调二十五师是对的”；等等。7 月 9 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南昌起义作过结论，既肯定“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还指出五条造成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

1944 年 3 月 3 日和 4 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时，进一步总结了南昌起义的经

验教训。他说：

> “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这个总结是全面而深刻的。1957 年，周恩来在审阅修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撰写的《八一起义》说明稿时，在“起义军胜利后”加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行动向南挺进的方针……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1972 年 6 月 11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再次强调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是，“没有就地革命”。他说：

> “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

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根本政策的错误。”

上列论述，是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经验教训认真作出的科学总结。

中共中央通告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南昌起义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永放光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伟大政治意义。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在历史上永放光辉吗？”萧克对南昌起义的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的确，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是永放光辉的。

对于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早在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通告就明确指出：

“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项。”“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

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新纪元。”

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说过许多，但对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却几乎没说什么，仅仅肯定“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他甚至谢绝观看歌颂南昌起义的话剧《八一风暴》。他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又不批评我，我就是不看。”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周恩来严格自省的崇高精神境界。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个闪光的标志。

（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的新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面前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失败教育了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革命新路。李立三曾经说过：“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以南昌暴动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二）南昌起义标志着开展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直到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举起屠刀，血的教训才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毛泽东在论述战争和战略问题时曾经说过：“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贺龙也深有体会地说过：“八一”南

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起中国革命斗争鲜明的军帜，坚决进行武装斗争”。

（三）南昌起义标志着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南昌起义集中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所影响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起义军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虽然大多数人牺牲了或失散了，但起义军余部却成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朗、颜昌颐率领的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余部约3000多人，陆续进入海陆丰，同当地农民结合起来，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约1000多人，转入粤、赣、湘边区，1928年2月举行湘南暴动后，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中坚。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支持下，贺龙、周逸群回到湘西后，按照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实行“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1928年3月在桑植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经过南昌起义和南征战斗洗礼的起义军官兵，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积累了作战经验，从而为创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得力的军事干部，其中许多人成为我军的帅才和将才。仅新中国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就有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等六人，如果加上积极策应过南昌起义的叶剑英，则有七人之多。正因为南昌起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作用，1933年7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中革军委的提议，规定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纪念日。7月12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发布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训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动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

毛泽东说："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

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南昌起义伟大意义的重申和肯定。在"文革"内乱期间，林彪、江青一伙恣意歪曲和篡改南昌起义的历史。在他们的煽动下，有些人提出要改换建军纪念日，要砸掉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楼顶上的八一军徽。1967年7月22日，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九月九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毛泽东气愤地说：

> "为什么要改为9月9日秋收起义？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是8月1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

毛泽东对杨成武的记录稿过目后，还加写了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

"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这话说得多好啊！真是一语中的！

（刘武生）

奔突的地火

——在上海地下斗争岁月里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在香港养病1个多月，1927年11月上旬，接到中央的通知，在九龙深水埗乘船潜回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反革命统治的心脏。蒋介石全力加强对上海的反革命统治，大规模“清党”，镇压革命力量。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伤。上海共产党员从8000人锐减到1220人，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从82万减至28万人。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周恩来擦干心中流淌的血泪，和许多坚定的共产党员一起，在血泊中站立起来，继续向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

在11月9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虽然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但周恩来卓越的才能还是为人们所公认，他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不久又担任了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在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的4年多时间里，周恩来除了短暂离沪外，一直在这里坚持地下斗争。

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指导根据地武装斗争和白区地下斗争，逐渐形成了一套缜密而细致的秘密工作方法，在诸多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

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巨大损失，一些地方党组织怀着满腔的悲愤，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急于举行武装暴动，向国民党讨还血债。虽然周恩来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是坚持认为举行武装暴动，一定要知己知彼，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纠偏的作用。

他多次为中央起草致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信，提出组织武装暴动要从实际出发，即使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党的主观力量尚不具备时，应先加紧党的工作，各地党组织要注意开展艰苦的群众工作，从日常斗争着手，培植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1930 年 9 月，周恩来告诫长江局领导人：你们的首要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弄清”，而且，不仅要注意先进分子的要求，更要注意“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如果不知道下层群众的实际情况，“要想定出一个切实而具体的计划，是万万不能的”。

当时，在干部中存在着忽视下层工作的错误观念。早在 1928 年底，周恩来在《中央通告第廿一号》中指出，全党应“坚守‘深入群众’的口号，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使党真能生长在群众中而不是架空和

脱离群众的组织”。1930年回国工作的帅孟奇，几十年后仍旧记得周恩来指导她深入群众开展工作的情景。记得周恩来有一次对她说：

> 你们这次回来正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你们要有精神准备，要准备做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你们到工厂去，就要像个工人的样子，要设法钻到工房里去接近工人，不要嫌工人落后，不要光接近积极分子。到工人中去争取群众，首先要稳定进步工人的情绪，帮助他们坚定革命的信心。对中间分子不要歧视，要想各种办法去接近他们，问长问短，关心他们，耐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还要带领进步工人、积极分子同你们一道去做中间分子的工作，并长期地坚持下去。对落后的、反动的、有些黄色工会里的工人群众，也不要讽刺和辱骂他们，而是要做工作去分化他们，把他们中表现较好的拉到中间分子这边来，表现坏的，让中间群众去揭露他们，你们自己和积极分子不要轻易出面，尤其要注意的是，你们不要一到工厂就去反工头（拿摩温），一反就暴露了自己，而且工头也不是统统都是坏的。……你们要腿勤、手勤、嘴勤，做工就要像个工人，才能同工人接近，并要学会做一人一事的工作，多做个别谈话、启发引导。

为了恢复白区党组织的正常工作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周恩来多次对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作出指示并具体指导。为了纠正顺直省委和江苏省委软弱涣散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错

误，周恩来亲自来到他们中间，终于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抓住矛盾的关键，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使斗争形势一步一步朝着有利于革命高潮到来的方向转化。同时，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白区地下斗争的成功开展、为苏区培养和输送干部以及党内反倾向斗争方面，周恩来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白区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斗争中不断吸取经验的周恩来开始逐渐形成了一套缜密而细致的秘密工作方法。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他组建中央特科，开展情报工作，培养无线电人才，严格地下工作纪律，在诸多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

赴苏出席六大旅途遇险，周恩来夫妇与密探巧妙周旋。同志们拊掌大笑，夸奖他们是擅长演戏的好“演员”

为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1928 年 5 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在上海登船去大连，准备经东北转赴莫斯科。为保证旅途上的安全，他们乔装改扮，化装成古玩商人夫妇，匆匆上路了。

为了尽量地减少出头露面的机会，他们一上船就将上海的各种报纸都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然而在只有阔人才能涉足的头等舱，衣着随意的二人多少有些引人注目。

就在餐厅用餐之际，有两个商人模样的人，引起了周恩来

和邓颖超的警惕。他们满口天津口音，经常用目光注视着周恩来和邓颖超二人的一举一动。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五四时期天津学界的风云人物，莫非这两个人认出了他们？

周恩来冷静而自信，他沉着地对邓颖超说："沉住气。我离开天津已经八年了，你也离开那里有三年了，况且我们的容貌和衣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一定能够认出我们来。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沉着应付了。我这位古玩商人肯定是不会露马脚的，就看你这位富商太太的表演了。"

船到大连，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的几名警察，拦住了正要登岸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了阴险的盘查。在找不到破绽的情况下，他们硬要带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周恩来镇静地向那个领头的警察说："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并请你们送她到旅馆先住下。"他又像个做惯大生意的阔商那样，加上一句："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卫生。"

在日本水上警察厅，周恩来和日本水警斗智斗勇，终于摆脱了他们的怀疑，顺利地回到了旅馆。一见到邓颖超，周恩来便低声对邓颖超说："马上销毁接头证件。"等到邓颖超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做好一切工作后，二人才相视一笑，暗自松了一口气。

大连不是久留之地，周恩来和邓颖超拿着日本水上警察代买的火车票登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在车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发现在软席车厢有一名日本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经常将目光向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座席瞟来瞟去。不用说，这一定是日本的跟踪密探！周恩来假装漫不经心地和这位"先生"闲聊起来，自称是古董商人，用在上海平时学到的一些古玩知识与之相周旋。

在长春下车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住进旅馆。周恩来换下西

装，穿上长衫，剃掉胡须，他要到吉林看望多日不见的伯父。他们在伯父家住了两天后，周恩来决定自己先到哈尔滨三弟家小住，隔日邓颖超再去哈尔滨，两人在哈尔滨会面。

几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哈尔滨如约碰面。因为他们已将接头的证件销毁了，无法与联络人接头，只好耐心地在火车站等后来的同志一起前行。直到他们遇见了李立三，才在李立三的证明下，踏上苏联的国土。同志们听说了他们遇险的经过，个个拊掌大笑，夸奖周恩来和邓颖超是随机应变的好手，是擅长演戏的好“演员”。

1928年6月，莫斯科郊外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庄园，中共六大在这里举行。周恩来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

1928年6月，莫斯科郊外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庄园。平坦绵软的绿地上，开放着多姿多彩的鲜花，成片的白桦林，在建筑的后面静默无声，只有一条欢畅的溪水，向远方流去。在苏共中央的安排下，中共六大即将在这里举行，因此周围很少有人停留，更增强了静谧、安恬的气氛。

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后，马上投入了紧张的会议准备工作中。

这次会议，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八七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苏共中央十分关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会前，斯

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和苏兆征等人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见。

斯大林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和这次会议将要解决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现阶段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低潮。接着，斯大林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给中共六大指出了明确的方向。6月14、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个“政治谈话会”，这实际上是一个小范围的预备会议，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和项英等21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进行了进一步的思想准备。

6月18日，在苏共中央的大力协助下，经过精心准备的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正式举行。周恩来在会上担任了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大会由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6月19日，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6月20日，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

在讨论大会政治报告和布哈林报告的时候，周恩来经过认真准备，详细阐述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基本看法，表示赞同斯大林的两个观点，认为这两个观点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判断，对于指导今后的革命斗争具有重大意义。通过长时间深入地讨论，深化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

在大会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周恩来传》（1898—1949）里这样写道：

6月30日，他（指周恩来）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31万至34万人，还有4600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

党在今后的组织任务是什么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把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7月3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在当时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结果，

“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一旦蒋介石叛变，革命便遭受严重的挫折。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专门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他还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7月9日、10日，中共六大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大会闭幕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其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大后，周恩来和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人留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周恩来找到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员逐个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考虑将来这一批人回国后的工作安排。他还抽出时间，到各处去宣传六大的精神，介绍国内的斗争形势。周恩来着重解决了当时在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的王明等人捏造的所谓“江浙同学会”的

审查工作，澄清了事实真相，推倒了王明等人恶意制造的这一假案，伸张了正义。1928年10月初，周恩来从莫斯科踏上回国的路途。

周恩来领导特科建立了好几个重要的暗线关系，获取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伍豪之剑”的威名在大上海不胫而走，令敌人闻风丧胆

1928年11月，周恩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到紧张而充满危险的地下斗争中。

周恩来一回国，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会就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中共中央工作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又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因此，他万分谨慎。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所，严格控制外出的时间。他集中时间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通常装扮成商人，又蓄起浓密的大胡子，所以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美誉。

1928年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负责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科一成立，立即发挥了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2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

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周恩来满腔悲愤地写下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的文章，并积极组织营救工作。虽然因为客观原因营救失败，但这一损失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报，对保证党的机关的安全和正确开展各种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先后建立了杨登瀛、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重要的暗线关系，获取了很多极为重要的情报，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伍豪之剑”的威名在大上海不胫而走，令敌人闻风丧胆。

1931 年 1 月下旬，张国焘和妻子来到西藏路的东方旅社。这里是我党干部经常出没的地方。六大之后受到斯大林亲自接见的张国焘，此时在共产国际的指派下回国工作，根本不知道就在几天前何孟雄等 17 人在东方旅社开会时被捕。有幸的是，张国焘的妻子在街上巧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他焦急地告诉了张国焘妻子在东方旅社发生的一切。约莫一小时后，张国焘夫妇迅速地搬离了这家旅馆。这次马路上的这个巧遇，便成为整个 1931 年一连串惊心动魄事件的第一枚多米诺骨牌。

前前后后事情的发生，让中国共产党感到危机四伏，中央决定逐渐将领导重心转移到苏区。在这种背景下，两个多月后，张国焘在中央特科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上海经汉口前往鄂豫皖苏区。

这天深夜，中央常委和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派他的助手护送张国焘从上海乘船去汉口，自己带另一名助手连夜坐火车赶到南京，再跳上一艘小火轮，在汉口迎接了张国焘。顾顺章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工人，早年曾在卡德路（今石门

路）开过一家魔术店，还在南京路上的游艺场作过表演。他精明干练，在他的安排下，张国焘被安然无恙地送走了。可是顾顺章却与党中央断绝了联系。就在他一时兴起，在新世界游艺场重演魔术旧技的时候，终于被一个叛徒发现，被捕后马上就叛变了。一夜间6封绝密急电发到南京中山东路305号正元实业社，这里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顾顺章对党内主要领导人和地下组织的情况简直是了如指掌。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的航船，如同汪洋中的一叶孤舟遇到了惊涛骇浪，转眼之间就被卷入了湍急的漩涡。也许没有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扣压了电报，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可能改写。

26日凌晨，大上海还在梦境中沉睡，一个青年从沪宁特快上匆匆跳下，他就是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刘杞夫设法找到了中央特科的李克农。数小时后，钱壮飞也来到上海。他在南京路给天津的一个“钉子”拍了份急电，而后在离跑马厅不远的中央军委联络站找到了聂荣臻。当周恩来从陈赓处得知这个十万火急的密报的时候，不由得惊呆了……“福兴字庄”的中央特委与清河坊中央军委紧急召开会议。一个大胆而又无可奈何的危机拯救计划就此出笼。

只有彻底地斩断顾顺章的所有关系，改变所有机关和人员的联络方式，才能扶大厦之将倾。中央特科紧急出动，顾顺章的一切关系被切断了。谜与血和火一起被夹在了大都市沉重的记忆书页里。

也许这仅仅是生死搏杀的开始？繁华的静安寺，是大上海又一段历史的记录者。

1931年6月22日上午，一个高个浓眉留平头、50岁出头

的古董商人走在静安寺的街道上，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这位来自湖北的船工，是中共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在1928年6月20日莫斯科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习惯上称为总书记。他有着喜欢女人的致命癖好，尽管乡下发妻与孩子都在上海，他还是借口古董商人要有女人作点伪装和掩护，与一个烟花女子杨秀贞姘居。他的女佣是顾顺章介绍的。顾顺章叛变后，组织上把他从南京路南边的善钟路（今常熟路），搬到西边的小河渡路（今西康路），与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还把杨秀贞与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安排到了一家外国人开的德华旅社。中央已经决定向忠发转移到苏区去，可他因为迷恋女色迟迟不愿离沪。这位古董商在静安寺的幽会踪影，已被一个汽车行会计与那个顾顺章介绍的女佣所注意。尽管周恩来再三催促他迅速撤离上海，他还是坚持与杨秀贞见最后一面。

他是头一天晚上去德华旅社的，按规定只能呆一会儿，可他贪恋温柔乡中的美梦，所以当这位古董商第二天悠悠来到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的时候，一群人突然扑来，扭住双臂将他推入一辆轿车——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了。九根手指和一口金牙，身份无法抵赖。他被引渡到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立即就叛变了。24日，虽然向忠发跪地苦苦哀求，但还是被枪决了。

上海滩上的生死搏杀还在继续。

一个漆黑的夜晚，一辆黄包车停在了外滩十六铺码头。一个蓄着浓黑胡须的男人，一身蓝哔叽熟练工人的打扮，头戴顶蓝便帽，提着一只小手提箱。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他登上一条外国洋行的小火轮，在夜幕的掩护下前往汕头，然后从那里转到中央苏区的瑞金。此时，任

何悲怆沉重的言辞都不足以形容他当时的心境。

周恩来紧锁双眉告别了上海，这将成为他惊涛骇浪一生中最险恶的记忆。他刚刚经历了一次虎口余生。向忠发被捕的那天深夜，他得到了报告后，迅速销毁了存在家中的机密文件，与妻子邓颖超匆匆搬进福州路江西路口的都城饭店。十来分钟后，一群国民党特务“造访”了他的寓所。周恩来此后隐藏在一条横穿南京路最窄小狭长的山西路，租了一家纸烟店楼上的亭子间。10 平方米空间住了 3 个人，他、妻子、岳母，还有一盏 15 支光的灯泡。他同等候撤往苏区的李富春、聂荣臻一样，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深居简出，只有星月满天的时候，才出来活动身子，呼吸新鲜空气。也许，这亭子间沉默孤独的苦思，为他今后漫长辉煌的人生里程准备了充足珍贵的思想源。

历史上总是有人喜欢回头看看来时的路途。在“文革”中，江青又重提所谓“伍豪事件”。毛泽东说：“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周恩来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关于他的故事仍在继续。翌年 2 月，当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正在江西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战事的时候，上海的《申报》于 20、21 日在广告栏里连续刊出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周恩来又名伍豪、周少山等）。为反击毁誉企图，继 2 月 27 日中共秘密党报《实报》11 期刊出《伍豪启事》外，3 月 4 日《申报》广告栏里又出现

了以租界著名法国律师巴和名义刊出的《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曲折地澄清了敌人的别有用心的诬蔑。

35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与江青又重提此事，把材料专门送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周恩来传》这样写道：

> 这个材料，其实就是《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两天后，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
>
> 29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直到这时，对所谓“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浪奔，浪流，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费虹寰）

历史的真实

——与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3至8日间，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成员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宁都会议的召开，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同王明推行的“左”倾“积极进攻战略”的对立与斗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维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真诚。因此，宁都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的重要会议。

“积极防御战略”与“积极进攻战略”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1931年，在毛泽东、朱德“积极防御战略”和“诱敌深入”方针的指导下，中央苏区军民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使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局面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证明毛泽东坚持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加紧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错误路线。1931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任弼时，王稼

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4月初到达瑞金。8月3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发来指示信，指责中央苏区“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要求红军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信的错误主张，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议围绕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是，中央代表团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严厉指责，并通过了五个决议案。他们把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他们把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主张，指责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他们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是有意排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底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会见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和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顾作霖等。周恩来到苏区担

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是早在193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周恩来、毛泽东、项英、朱德、任弼时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因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上海，只得由项英先去，暂时代理书记，后来毛泽东也曾代理书记。

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面临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是处理军事斗争的问题。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在粉碎敌军“围剿”后不停顿地进攻，把“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更有甚者，对于赣南会议的错误做法，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中央代表团没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1932年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批评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大会最主要的错误和缺点。”周恩来当时还没有到达中央苏区，因而没能参加赣南会议，但是指示电仍对周恩来横加指责。指示电说：

> “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在中共临时中央的催逼压力下，5月30日，周恩来不得不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第5期上发表文章，检讨“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7月2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发出一封长达15000余字的指示信，继续批评苏区中央局。信中说：

> “而中区的同志没有了解到目前增长着的全国革命危机与苏维埃运动开展的顺利的条件，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中央责成中局根据中央的指示来严格与切实的检查各部门的工作与进行彻底的转变。”

中共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与指责，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分歧与斗争。这种分歧与斗争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仍在继续发展着。

宁都会议围绕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的争论，是两种政治、军事战略对立与斗争的总爆发

1932年春、夏，国内政治局势和战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5月5日，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出卖淞沪权益的停战协定，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向红军进攻。6月6日，蒋

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向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苏区的战争形势更加吃紧起来。这时，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赴前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7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7月25日，正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于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为坚持让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反复说明理由。他在信中写道：

> 关于组织问题，军委会原指主席团，但仔细想仍不好。我原意是在提高军委信用，故出此。现在想是否可改为最高军事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由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

同。故此，银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

8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红军北上消灭敌军的行动计划。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沿赣江东岸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8月8日，中央局采纳周恩来等人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在前方成立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后方中央局成员负责做地方群众工作，以配合前方的军事行动。苏区中央局下达了一、三、五军团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作战命令。

接到作战命令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随军行动，采取隐蔽、迅速的办法，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连续行军一周，8月15日开抵同敌军相持的招携、东韶一线。16日，红军出敌不意，突然发起攻击。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乘胜占领南丰。一周之内，连克三城，歼敌5000多人，缴获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速战速决的这一胜仗，极大地震慑了抚州、南昌和樟树的敌军。8月24日，红军开赴南城近郊，本想乘胜攻取南城，但发现南城守敌已集中三个师的兵力，修筑工事，以图固守，而且地形于我不利，敌军还正在调兵增援。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果断决定改变预定计划，红军主动撤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以利再战。

为了说明改变作战计划的原因，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报临时中央，指出“敌情已起很大变化”，敌军已经注意“固

守城镇”。“我们仍固执原定计划去攻打南城，便犯了不机动的错误”。红军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认为不打南城是个错误。为了进一步说明对目前红军行动方针的共同意见，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并告临时中央，电文说：

>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同时在工作中，也决不丝毫忽视敌人进攻的布置与小部队的随时袭击。”

为了强调前方同志提出的目前红军行动计划是最佳方案，9月24日，周恩来又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指出：“行动计划已电告。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的，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地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攻击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敌人。”第二天，即9月25

日，中央局后方成员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光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并且认为这样"可能演成严重错误"。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后方成员，坚持原有行动计划。复电说：

> "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

复电还建议："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求全体都到。"中央局前方成员从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出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部署。9月26日，朱德、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政治委员名义签发《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训令》准确地分析了敌军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主攻方向和策略步骤，对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行动作了正确的部署。但是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指责《训令》完全违背"积极进攻战略"。9月29日，他们致电周、

毛、朱、王："九月治（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本来，周、毛、朱、王曾经于9月25日、29日、30日三次致电后方中央局，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等问题。围绕红军作战方针问题，以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以前方中央局成员周、毛、朱、王为另一方，逐渐形成了互相对立的意见，而且矛盾迅速激化。因此，宁都会议的召开，是两种政治和军事战略分歧与斗争的总爆发。

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中央局后方成员集中批评毛泽东；周恩来检查了前方成员"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点"，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

1932年10月3至8日间，在宁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有：后方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前方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宁都会议只留下一份由后方成员起草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份简报是10月21日写成的，送给前方成员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征求意见后报中共临时中央，没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从这份简报和其他相关材料可以得知宁都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经过情况。宁

都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大力推行“左”倾“积极进攻路线”，并采取组织措施排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会议。

出席宁都会议的后方成员从“左”倾盲动的“积极进攻战略”出发，对攻打赣州、漳州等战役作出错误评价，并错误地批评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曾经反对攻打赣州。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攻赣本有克城可能”。他们把攻赣未克、反受严重损失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等拒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而“遂未坚决布置”。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挥、周恩来配合的攻克漳州战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与会者却从战略方向加以指责，认为“进占漳州曾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会议还批评前方成员从实际出发，在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后不硬攻南城的正确作战部署。会上有些人指责说：“乐宜战争〔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且遭敌在宜黄之袭击。”“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对于红军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早就主张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苏区逐步前进，发展闽浙赣三省之交的大块地区然后向浙江皖南扩展，造成巩固的阵地，以粉碎敌军的第四次“围剿”。项英在会上批评这个主张，有些与会者则指责这是“向偏僻区域发展”、“上山主义”等。“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早应北上，过去7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宁都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时，周恩来结合前线的实际情况，说明前方致后方的一些作战电报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则坚持《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的基本观点，认为这是从“敌强我强”这个实际出

发的，是符合前线客观情况的。但是，中央局后方成员却不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以准备为中心来解释中央指示电”，批评他只字没提“积极进攻”。后方成员集中批评毛泽东的所谓“等待敌人来进攻的主张”，指责他反对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指示电，甚至把红一方面军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斥之为“守株待兔”。“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宁都会议不仅从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上批评和否定了前方成员特别是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和观点，而且对毛泽东进行了组织处理，排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上，后方成员指责毛泽东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后，以“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为由，“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系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会上，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调毛泽东回后方工作。但是，因为与会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同时，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前一种办法，即“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并批准他“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会后，周恩来前去看望即将离开前方的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将去长汀福音医院疗养，并说“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回来”。

在宁都会议期间，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于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严厉批评毛泽东和周恩来。他

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他还说："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接到中共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报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经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成员开会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样，宁都会议便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了红军。1972年6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回忆起宁都会议没能保住毛泽东的军权时，还十分动情地说："我最心痛、最难过的是这件事情。"

宁都会议后，中央局后方成员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控周恩来，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答辩，承认对毛泽东"采取了温和态度"

宁都会议结束后，1932年11月1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指控周恩来，主要内容是：

（一）“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来解释中央指示电。”（二）“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的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三）“在会议后，我们与他谈话，指出他这结论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四）“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五）“关于召回泽东同志问题……在会议上提出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而他提出两种意见，犹豫不定。我们鉴于他对领导和指挥战争尚缺少自信心，最后方同意他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

同一天，周恩来也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进行答辩，主要内容是：

（一）“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顾（作霖）、项（英）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我以为，斗争战线并未模糊，只是方开始。”（二）“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将

做不出什么事，甚至会走向消极。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更彻底转变。”（三）“因此，我提议前方军事会议制取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局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四）“目前泽东因病暂请假到后方打针，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在情绪上还没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

引述了以上两份内容明显对立的电文，用不着再说什么，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是如何竭诚维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中央苏区期间，中共党内的主要矛盾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周恩来在宁都会议后，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而违背历史真实的无稽之谈。

共产国际不同意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要求对毛泽东必须团结。后来，临时中央表示，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

从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档案材料看，共产国际

并不同意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召回毛泽东，取消他的军权。据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述，1932年11月，王明将宁都会议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据1932年11月《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因此，他们建议，中央局应当设法劝说帮助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不能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前线回到后方养病，中共临时中央提议把他送来莫斯科“休养”的信息后，又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指出：

> 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在共产国际提出意见后，中共临时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的一些电报中也有所反映。1933年4月（原电抄件无日期），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对于毛泽东，需要最大限度的忍耐，并由同志们影响他，给他充分的可能在中央和中央局的领导之下，担任负责的工作。”这份电报的内容乃至文字和共产国际来电几乎一模一样。中共临时中央收到苏区中央局

后方成员联名指控周恩来的电报，以及周恩来答辩的电报后，当时没有表态，直到1933年（原电抄件无月、日）才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同志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看来，这份电报是临时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有关电报后发出的。

尽管共产国际不同意对毛泽东的错误处理，中共临时中央也重申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但是那些口口声声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左"倾领导人，却仍然坚持对毛泽东的错误做法。1933年6月上旬，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上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那次会议给他的不公正处理进行申诉。但是，博古作会议结论时却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认为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6年9月15日、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宁都会议时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刘武生）

在历史大转折中

——与遵义会议

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因此，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在这次历史大转折中，周恩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认为，周恩来“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为检查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解决中共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

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强调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李德。接着，张闻天根据他同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提纲作“反报告”，严厉批评“左”倾军事路线。随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深刻分析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指明红军今后发展方向。听了毛泽东等的发言，周恩来再次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发表的意见，竭诚推举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的这个倡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

周恩来的两次发言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伍修权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回忆说：

> 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伍修权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大致内容和与会同志的反应。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讲到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情况。他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倒向毛泽东。”看来，李德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一）证实了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

说的，“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二）周恩来已经同“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划清了界限”；（三）周恩来支持毛泽东不是偶然的，“果然不出所料”说明，他是早有所为的。

根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遵义会议经过三天讨论，最后作出如下决定：

>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周恩来多次赞扬过。1971 年 5 月 30 日和 31 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遵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万分困难的危机时刻，毛主席扭转了航向，使革命走向胜利，对我们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2 年 6 月 11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

> 毛主席说：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总结的话。事实经过是：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

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

对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曾经多次予以肯定。据李聚奎在《遵义会议前后》一文中回忆，1935年1月底，红军准备渡赤水河时，毛泽东对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红军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李聚奎还强调，这是红一师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毛泽东亲自对他说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又据王行娟著《贺子珍之路》一书记载，毛泽东同贺子珍谈到遵义会议时也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历史见证人的回忆，也充分肯定周恩来对开好遵义会议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据《王稼祥谈遵义会议》一文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行军途中同他酝酿要求召开中央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来"，并让他多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王稼祥说："一向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周恩来同志也赞成这一建议。"对于遵义会议的情况，王稼祥回忆说：在张闻天、毛泽东和他发言后，"周恩来紧接着表示赞成，态度诚恳，一面自己承担了责任，一面请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聂荣臻在《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回忆文章中强调指出："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

会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果断地同“左”倾军事路线彻底决裂，是建立在深刻认识“左”倾路线错误的思想基础上的

王明“左”倾教条宗派统治中共中央，是在共产国际扶植下，通过批判瞿秋白、周恩来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主义而当权的。对于王明等人用不正当手段上台，周恩来是进行过抵制的。在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时，周恩来和瞿秋白都提出要退出中央政治局。米夫考虑到王明等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保留周恩来。米夫在四中全会作结论时，粗野地讽刺说：“恩来同志自然要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1931年1月7日，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发言，对米夫、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提出批评。他说：“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是要反对的。”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四中全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名单中，王明不仅是中央委员，而且一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于这种不正常情况，在讨论通过名单时，周恩来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米夫不同意。此前，周恩来曾提议何孟雄为中央委员，但被米夫拒绝。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是被米夫、王明

等批判的主要对象。会后，周恩来还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可是，王明在《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文中，竟学着米夫的腔调说：这只是“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当时，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内心非常苦闷，但仍然忍辱负重地工作，极力维护党的团结。后来，1972 年 6 月 11 日，他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回忆说：“我当时确有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上述事实表明，对于王明“左”倾教条宗派统治中央，周恩来内心是不满意的，思想上是有警觉的，因而在行动上也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的。

当然，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革命实践经验的不足、思想认识的局限、组织纪律的约束，特别是共产国际指挥棒的压力，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对于王明“左”倾路线，当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反对和纠正，而是一般地接受和执行了的。这种情况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些文件、电报和他自己写的文章、讲话中都有所反映。但是，从总体上看，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经历了变通、抵制、争论以至最后彻底决裂的渐进过程。

周恩来在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起草文件、电报，传达贯彻王明“左”倾路线时，往往是一面讲“左”倾路线的内容，另一面则讲些防“左”的意思，用这种两点论的变通办法，对“左”的错误起一些中和与减少损失的作用。周恩来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贯彻执行“左”倾路线往往采用拖延的办法加以抵制。他到达中央苏区后，对王明等人强调的反右倾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贯彻落实，曾经受到临时中央多次批评指责。在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后，周恩来认真总结了“攻赣教训”，认识到冒险攻打敌军的中心城市是错误的。此后，围绕作战方针问题，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

问题，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坚持推行的“积极进攻路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从而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1933年二三月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为了进一步推行“左”倾路线，很快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都抓到自己手里。5月8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中革军委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并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革军委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的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这样，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直接指挥了。紧接着，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也被取消了。

同年9月间，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权拱手交给李德。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回忆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前线已经无法正常指挥作战了。12月16日，他致电博古、项英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际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要求中央“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这个电报触怒了中共中央和李德。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从前方返回瑞金。2月3日，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此后，实际上剥夺了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分

管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同博古、李德的思想分歧与对立更趋尖锐。周恩来不赞成他们采取分兵抵御、处处设防的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也不同意他们以阵地战和堡垒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他批评他们的这套战略战术，使红军作战“常付出过大代价”。1934 年 2 月 7 日，他在红军政工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反对单纯的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我们主张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一文中回忆了周恩来同博古、李德的争论。他写道：

>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的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

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由于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他的军事指挥权已被剥夺，他提出的批评意见和纠正措施，博古、李德往往不予理睬。在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处境异常艰难，已经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例如，1934 年 7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团”负责筹划长征，博古主管政治，李德主管军事，周恩来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又例如，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干部征求过他的意见，其他方面干部只告诉他一个数字。红军长征开始前，周恩来同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开始分道扬镳。从红军长征途中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完成了同“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决裂。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最激烈的战斗，周恩来一直坚持指挥部队抢渡。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红军跳出了敌军重围，但损伤惨重，中央红军由出发时 8.6 万多人，锐减为 3 万多人。红军的处境极端危险，毛泽东力主改变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博古、李德因军事失利而灰心丧气。这样，指挥部队的工作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12 月 12 日，在通道举行一次中央负责人临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周恩来不顾博古、李德的反对，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转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通称的“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虽已决定红军改向贵州西进，但博古、李德却坚

持己见，并通知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为了讨论确定红军长征今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1934 年 12 月 17 日和 18 日，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聂荣臻回忆录》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贵州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责成中央军委依据中央决定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周恩来把会议决议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看后大发雷霆，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语吵起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了，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1943 年 11 月 17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言，回忆了当年沿途争论的情况。他说：

>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黎平会议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师西进，不仅打乱了敌军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胜，红军部队的精神为之一振，面貌为之一新。陈云后来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写道：

>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猴场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样，就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开好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经历了宁都会议前中央局前方与后方成员的争论，一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特别是长征途中他同博古、李德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果断地同“左”倾军事路线彻底决裂，不是偶然的举动，而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必然。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真诚而坚决拥戴毛泽东，是他的思想认识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趋同的结果

综观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是尊重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和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领导的。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还兼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对全国各地红军和苏区的工作很重视，特别关注毛泽东、朱德、陈毅领导的红军第四军。1929 年 2 月 17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通称“中央二月来信”。由于对红四军当时的处境和状况缺乏了解，要求部队实行分散活动，并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中央来工作。这自然是不正确的。4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致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当时还没有接到红四军前委 4 月 5 日给中央的报告，但已不坚持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6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朱德 4 月 5 日来信，周恩来说：中央 2 月 7 日的信中所谈的分散问题是有些毛病。目前的形势，全国的混战期是延长的，这于红军的发展有很大的便利。常委已通过召集一个军事会议，现在很需要朱、毛处来一个得力的人。对其他处红军，军事会议也应加讨论。

中共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后，8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制造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向敌人

斗争，并调刘安恭回中央。8月2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发出，通称“中央八月来信”。指示信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一些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润之、玉阶两同志应遵守代表们的决定，一致地努力工作。安恭同志应依照中央前信的通知调来中央”。指示信还对“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前委同志召开‘大家努力来争论’，润之、玉阶同志亦特别重视个人的争论”，提出了批评。

随后不久，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并决定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开，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陈毅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就是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前委的指示信》，通称“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10月20日，陈毅把这封中央指示信带回红四军前委。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28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2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传播和推广红四军在斗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在周恩来主持下，193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登了陈毅撰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按写道："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是过去没有看见过和听到过的"。编者按还发出号召，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应当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1930年9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中央工作大纲》。会议通过了这个大纲，并酝酿决定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毛泽东、李维汉、顾顺章、温裕成四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28日，三中全会闭幕，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三中全会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说："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他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中央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二人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先去暂时代理书记。2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红军一、三军团前委指示信，强调要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

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指示信还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挥统一集中到中央局。

周恩来因忙于处理当时中共中央的内部纠纷事务，不能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但对中央苏区的工作仍很关心。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1931 年 1 月 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任委员。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宣布撤销。2 月 6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由毛泽东主持。

1931 年 12 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临时中央负责人同周恩来谈话，指出攻打中心城市已经可能，要他到中央苏区后攻打中心城市。还告诉他，到中央苏区后，组织上毛泽东只管政府工作。意思是说，不要让毛泽东管军事。12 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向周恩来讲了关于巩固和发展苏区的问题，指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应该先打掉地主豪绅的土围子，来巩固和发展苏区根据地。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警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电告中共临时中央。但是，临时中央不同意，虽不坚持攻打南昌，却要求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攻赣之战失败后，周恩来更加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

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指挥攻打漳州，就是一例。

1932 年 3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红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漳州难守易攻”，宜下定决心“直下漳州”。周恩来十分

重视毛泽东的提议，立即赶赴长汀，批准攻打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部署前后方各项准备工作。为此，红军总部和中共福建省委联合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红军东征。会上，毛泽东从巩固与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高度，分析了攻打漳州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大意义。周恩来则指出：红军入闽作战，不是为占领中心城市，而是为消灭军阀张贞的部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充实我军的给养和武装。会后，毛泽东随军出征，指挥战斗。周恩来坐镇汀州，组织支前。4月19日，红军发起进攻。20日，红军占领漳州。漳州战役大捷，俘敌1674人，缴获步枪2331支、步枪子弹133万多发、炮弹5000万多发、飞机2架，筹款100余万银元。漳州战役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取得胜利的第一个战役。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对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却很不满意。正当积极部署攻打漳州战役时，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文章，批评“中央区的同志从容不迫的去打‘土围子’”。“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4月14日，临时中央致信各苏区党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5月20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名批评周恩来，指责“伍豪同志到苏区后……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

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顾中共临时中央脱离实际的批评、指责，继续支持毛泽东军事战略主张。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赴前方。当时，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25日，周恩来和毛泽东、

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但是，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坚持仍由周恩来兼任总政委。29日，周恩来又致信苏区中央局，再次建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此后，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坚持“积极防御战略”，而反对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推行的“积极进攻战略”，并在宁都会议上开展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宁都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并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的工作，解除了他的军权。在毛泽东被迫离开前方后，周恩来仍然把有关前方作战计划“请送给毛主席一阅”，并将起草的作战文电在报送苏区中央局的同时，也报送临时中央政府。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和朱德继续沿用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歼灭敌军的范例。

在广昌战役正在进行时，中共鄂豫皖省委要求中央苏区派军事干部去支援。周恩来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去。临行前，周恩来同程子华就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谈话，强调要按照毛泽东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选择和建立新的根据地。程子华在《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回忆在周总理教诲下走过的胜利历程》一文中写道：

> 红军主力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他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

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途中，周恩来在同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争论直至决裂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主张的正确，因而全力推举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从以上比较系统地回顾和考察周恩来尊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主张和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工作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真诚而坚决地拥戴毛泽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周恩来的思想认识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趋同的结果。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思想基础上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确实是心悦诚服的，因而他确实钦佩毛泽东。综观周恩来光辉的一生，他总是从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全局高度出发，心甘情愿把自己放在“助手”的位置。1972 年 6 月 11 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感人肺腑的话：“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他还自谦地说：“我可以保证做一个辛勤的助手，不一定是一个好助手。”这是周恩来给自己的定位，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崇高风范。

（刘武生）

转换时局的枢纽

——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这座在汉唐时代就声名远播的城市，到了后来逐渐衰落。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这座古城寥落地孤处于中国西部，成为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的象征。可是，1935 年 10 月，自从陕北来了一股衣衫不整的红军队伍，古老的黄土高原就焕发了新的生机。国民党政府也调来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围剿”这股心腹大患。英俊潇洒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持重严肃的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受命经略其事，就驻守在西安。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 1936 年年末的 12 月 12 日，西安城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逮捕了蒋介石，扯起逼蒋抗日的大旗。

1936 年底，历史在西安悄悄地拐了一个弯……

中共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肤施密会张学良。张学良：“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张学良也开始了。”周恩来：“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

西安事变前夜，中华民族正处于最危险的历史关头。日本

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自1931年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相继制造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步步退让，不予抵抗，对内则极力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日本侵华后带来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底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成立了白区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反共，走向抗日。

根据张学良与日本人有血海深仇，亲身感受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杨虎城受到蒋介石排挤、十七路军面临生死存亡境地的现状分析，周恩来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可以争取。决心已下，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6年1月1日，周恩来邀请“白军军官训练班”的学员参加阅兵式，他在阅兵式前的讲话打动了一位东北军军官的心。他叫高福源，是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在同红军作战时被俘。高福源自愿做沟通红军和东北军关系的使者。

高福源的有效沟通，使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初步达成了1936年1月19日的局部停战协定。此后的3月4日，张学良会晤了李克农，表示双方要全面合作，并请共产党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中选派一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决定前往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谈判。1936年4月9日黄昏时分，周恩来和李克农率领20多个骑兵警卫，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来到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张学良得知周恩来到达，赶忙迎出天主

教堂。二人彼此寒暄后即进入正题，谈话气氛十分和谐。

张学良首先对周恩来陈述了自己思想的变化和诸多苦闷并请周恩来指点迷津。周恩来和善而庄严地对张学良说：

> 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

周恩来在详细谈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危难的态度后，向张学良指出了要救国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反对独裁的惟一道路，张学良深受启发。随后，张学良和周恩来又交换了双方对蒋介石态度以及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张学良提出了争取蒋介石，应该提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口号的意见，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张学良兴奋地说：“周先生说得对，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的。”

接着，周恩来又和张学良就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问题达成一致协议。等到双方会谈结束，天际已经泛起一片鱼肚白……

张学良凝望着周恩来，激动地说：

> 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张学良也开始了。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

周恩来也表示道："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

两人握手相别，周恩来一行马上加鞭，向瓦窑堡飞驰而去……

没有人会预料到，就是这两双巨手刹那之间的相握，不但促成了历史巨变，也改变了张学良将军一生的轨迹。

没有人会预料到，8 个月以后，就是这两双相握的大手，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在中国西北的古都西安，演出了一出可歌可泣的历史剧。

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的秘密会晤，揭开了西北大联合的序幕。从此，停止内战、挽救民族危亡的空气在中国的西北逐渐酝酿和生长。

西安捉蒋事发仓猝，中共中央缺乏精神准备。张学良征求中共意见，周恩来衔命出山

1936 年 10 月底，心急如火的蒋介石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剿匪"不利，带着许多文武大员，飞抵西安督战。同时，他还调集其嫡系部队 30 个师，布置在河南境内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待命向陕甘进发，并调动 100 多架飞机，准备投入内战战场。12 月 4 日，蒋介石再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必须服从"剿共"命令，进攻红军，否则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入陕甘"剿共"。

同时，西北地区的爱国情绪在不断积聚，对热血男儿张学

良的内心不断形成极大的激荡。张、杨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也不愿离开西北而被蒋介石吃掉，进退维谷，处境艰危。

为了敦促蒋介石抗日救国，和共产党捐弃前嫌，张、杨多次向蒋介石“哭谏”、“苦谏”均遭拒绝，终于决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清晨，陕西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惊破了蒋介石的清梦。张学良、杨虎城率部举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陈诚等国民党十多名军政大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一时间全国震惊，世界震惊。

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周恩来此时正忙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兵谏”毫无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也对西安的突发事件缺乏预料。极度兴奋过后，不得不冷静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周恩来等人具体分析了事变所引发的内战和团结抗日两种发展前途。会议决定要尽力争取实现团结抗日的前途，并根据张、杨二将军的邀请，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

“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张学良复电：“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

周恩来折冲樽俎，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张学良“摆队送天霸”，留下20世纪一段历史遗憾

12月17日黄昏，剪掉长髯的周恩来来到西安金家巷张公馆，并住在那里。当晚，周恩来就与张学良开始了彻夜长谈。

张学良在详细介绍了事变爆发几天来西安方面的情况，南京政府和各省地方势力的反应以及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态度后说：“据我个人看法，争取蒋先生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已由拒绝商谈抗日问题转为允许商谈。只要他同意团结抗日，就可以送他回南京，并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对于张学良的爱国热情，周恩来极力赞扬，并同意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多少带有‘军事阴谋’性质。”张学良听了不高兴，说：“我为公不为私，怎么是阴谋?”周恩来随即阐明：这次捉蒋与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是乘蒋不备，出其不意，在蒋的实力还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样，眼下的蒋介石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法国的拿破仑。沙皇尼古拉是经过群众暴动被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要非常谨慎。周恩来告以中共中央对事态的判断和分析：

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被日本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另一个是宣布蒋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掉，这样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灭亡中国造成便利条件，中国的前途将会更坏。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

周恩来的深谋远虑和凛然正气使张学良深受感动。经过说服杨虎城，三方终于一致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安城内猝发事变以后，南京政府上下一片混乱，在权力出现真空的情况下，各种势力纷纷粉墨登场，对于如何处理事变众口不一。在何应钦的控制之下，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又于次日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准备进攻西安。另一派，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则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人痛责亲日派何应钦的阴险图谋。为挽救蒙难中的蒋介石，宋子文于12月20日飞抵西安，派随员郭增恺会晤了周恩来，他本人则拜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并探望了幽禁中的蒋介石。宋子文探听到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底牌后，返回南京。12月22日，宋子文与宋美龄携端纳再次飞抵西安，为释蒋谈判、斡旋。

23、24日，谈判在张学良公馆西楼进行，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出席。周恩来首先提出六项条件：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以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此六条的基础上，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协议。

24日晚，周恩来和张、杨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之下来到关押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10年未见面的周恩来和蒋介石都有历尽沧桑之感，昔日不可一世、大念“剿匪经”的蒋介石如今见到令他头痛的“匪首”周恩来，真不知今夕何夕！周恩来诚恳地对蒋介石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衰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一双眼睛直望着周恩来：“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神情庄重地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宋美龄连连点头：“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以后再不剿共了。”一直默默无语的蒋介石，此刻口头表示了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

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和他谈判。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放蒋已成定局。

然而就在放蒋的方式问题上，西安城内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古道热肠的张学良不顾周恩来的劝阻，独自决定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怅望天空中越飞越远的飞机，不无感慨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果然不出周恩来预料，张学良果然一去难返，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被监禁生涯。

蒋介石文攻武吓，三位一体风雨飘摇。东北军内讧喋血，周恩来舌敝唇焦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引起了西安城内的一片混乱，三位一体的稳定受到了极大威胁。蒋介石下令调集五路大军，在顾祝同的统帅下，以37个师的兵力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为了稳定局势，早日使张学良获得自由，保卫西安事变赢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周恩来经常彻夜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研究对策。他一面建议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出措辞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赴关中，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感动。

除此而外，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

要求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除中央军大军压境外，蒋介石还并用政治分化手段，加强对西安的政治攻势。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西安古城人心浮动。东北军少壮派复仇心切，不惜与中央军开战。他们的声势非常之大，使得理性的主和派噤若寒蝉，眼看着局面动荡不可收拾。周恩来舌敝唇焦，不分昼夜地做他们的工作，维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局……

而杨虎城那方面，也对蒋介石的大兵压境心存忌惮。他们认为，和平解决是牺牲了十七路军。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被扣押。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可是杨虎城是蒋介石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和平解决以后的前途就是十七路军和杨虎城的牺牲……

三位一体的局面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西安城主战空气日益浓厚的气氛下，周恩来经与中央和前线指挥员商议，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同时，中共中央的电报也发到了西安：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2月1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面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得到了和平解决的一致意见。可是东北军少壮派原以为

这次会议会作出打仗的决定，会议的结果令他们非常气愤。他们认为东北军代表王以哲、何柱国在会上没有反映东北军的意见，东北军内部出现严重裂痕。他们一边策划屠杀主和派，一边准备派武装人员截留杨虎城派去潼关的代表，同时包围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西安已被浓重的血腥和恐怖气氛所笼罩。

2月2日，他们枪杀了王以哲，何柱国由于得到风声早一步躲了起来，才免于大劫。

王以哲被杀害以后，周恩来痛斥了孙铭九和苗剑秋等人的鲁莽错误。他还不顾安危，到王以哲家吊唁，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使东北军军官进一步认识到周恩来关心东北军团结、反对分裂的明确立场。

王以哲被害的消息传到前线，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2月3日早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声言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借机开进渭南，进逼西安。东北军的内部分裂危在旦夕。周恩来经过商议，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毅然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送到云阳红军总部，免得仇杀泛滥。同时，他还将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代表撤往云阳，自己坚持战斗在西安，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三位一体”的关系，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由于周恩来在西安中流砥柱的突出作用，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可是“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的团结，削弱了西安与南京谈判的力量和地位。再加上蒋介石文攻武吓，“三位一体”大势已去。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2月6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离开西安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到三原去了。“三位一体”解体了。

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开入西安。2月9日，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在七贤庄成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公开地走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周恩来也声名远播，成为全中国人民瞩目的伟大政治家。

（费虹寰）

雾都的明灯

——在皖南事变前后

1940年夏秋之际，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英、美、苏和德、意、日两大阵营的分化趋势更为明显，蒋介石为了在大国中寻求平衡，便把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成是进行政治投机、阴谋反共的大好时机，终于在1940年下半年黄桥战役后，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新四军转战于大江南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由于历史的、地缘的等等原因，新四军还局限于江南一隅，受到日军、伪军的包围和国民党军队的牵制，回旋余地不大，很难应付突发事件和新的局面。同时，在新四军的领导机构内部，叶挺和项英二人的关系一直不睦，直接影响到新四军的发展和壮大。而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目标，就是他的肘腋之患——新四军。

在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下，面临内部矛盾的新四军处境危险。周恩来会见叶挺、袁国平，并主持关于新四军问题的谈判

1940年年初以来，国内的政治形势恶化，新四军由于实

行单纯合法斗争，没有积极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越来越陷于危险之中。同时，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的关系恶化，叶挺离开了新四军。而蒋介石恰好借此时机，提出要给新四军另派军长。为了抵制蒋介石插手新四军，保护这支武装力量，1940年5月31日回到重庆的周恩来，马上同在那里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会面，解决新四军领导内部的矛盾，并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明确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周恩来和袁国平的第二次谈话商定，新四军军部争取移往苏南，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的谈判，不再由袁国平同顾祝同在上饶进行，一律移重庆由周恩来负责。

为打破国民党阴谋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7月8日，周恩来和叶挺、叶剑英、袁国平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并转刘少奇等：鉴于顾祝同正趁重庆国共谈判的机会，企图切断江北、江南新四军的交通，制造磨擦；李品仙也在压迫李先念部退过平汉路西，建议此时宜专打顾祝同和李品仙，以分散中央军和广西军联合逼我的阵势。第二天，叶挺就动身回新四军了。

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压迫没有一时或止。7月16日，他们抛出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中划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同时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旧黄河以北，新四军准许编为两个师等等。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了僵局。

7月27日，周恩来感到形势紧急，马上乘飞机返回延安，与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们一起商讨对策。

7月30日和8月4日、7日、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大家初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在会议上除了就南方

局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以外，还专门谈起了新四军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新四军工作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观念，不注意做群众工作。

8月25日，周恩来回到重庆。28日，他和蒋介石、白崇禧进行会谈。在会谈中，虽然周恩来表示愿意做稍微让步，可是蒋介石、白崇禧却寸步不让，坚持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到旧黄河以北，游击队留在当地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周恩来只得加以拒绝。虽然周恩来在此后多次提出建设性的对案，国民党方面仍旧坚持原意，不肯让步。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对新四军发出重要指示：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电报虽然很短，但字字千钧。

陈毅率部全歼韩德勤部主力。第二次反共高潮山雨欲来。国民党发出何、白皓电，周恩来和延安函电交驰

此时的国内形势愈加复杂险恶，这与国际形势急剧变动有关。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了三国同盟，而英美协约在此前后也已形成，国际形势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

蒋介石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领袖，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起来。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在极力拉拢蒋介石，苏联也向他伸出援手，这位本来就颇善权谋机诈的蒋先生于是膨胀起来，国内的

异己力量共产党如何在他的眼里？于是政治压迫加剧了，新四军也就愈加成了他的眼中钉。

10月6日，陈毅率部全歼9月3日以来进攻新四军的韩德勤部主力，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蒋介石恼羞成怒，10月中旬，密令特务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同时暗地里开始布置对新四军的军事行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果然，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各部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臭名昭著的“皓电”，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

次日，周恩来急电叶挺和项英，指出：蒋介石和何应钦逼我新四军渡江的决定“决不会取消”，因此急应抢渡一部，并指出在安徽无为渡江有危险，“宜在无为以东地区渡江”。要叶、项向顾祝同说明，如相逼太甚，背水之军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如此或可使顾祝同在执行蒋介石、何应钦密令时有所顾忌，便于我转移和布置各方面的分散。

对于国民党昭然若揭的军事威胁，周恩来没有丝毫大意，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在军事上争得时间，24日，他致电毛泽东，提出“皓电”原则不能同意，但是必须答复。在军事上，可将新四军主力北移，以便集结应战，或者立即分散，皖南部队一部分秘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须作应战准备”，防备“地方借故解决，李先念部要防止陈诚‘清剿’”等等。

周恩来还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他在同日致毛泽东的另一份电报中提出：国民党方面整个计划大意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第一步在打通大江南北及皖苏的补给增援路线，

切断我在大江南北及皖苏的联络，第二步恐为进攻。

第二天，延安的电报就传到了重庆，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尽管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对策是“稳健的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

此后，中共中央一直考虑如何回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周恩来一面秘密安排南方局的下一步部署，准备迎接政治高压和军事冲突的到来，一面进一步研究局势的发展，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和迹象，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判断和处理建议。

10月29日，他致电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的问题提出：

> （一）我在东部宜“致力苏皖谈判”，站稳苏北根据地，使局部“讨伐”变成僵局；（二）各根据地自给自足；（三）后方党转入地下；（四）我各地办事处和上层统战分子不放松政治进攻；（五）公开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

10月下旬，项英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由皖南直接渡江不可能。就此周恩来11月1日致电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通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表示在有充分保障下部队先从江南移动，“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并说，这实际只“放弃江南，以便集中兵力到江北，布置良好阵势”，必要时应付事变，使我能居主动；

或是“一切照旧，准备打了再说”，但也必须复电何、白。

第二天，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电。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关于南方布置，及宣传反驳诸项各同志均同意周恩来及南方局的意见。蒋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50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是能打得开局面的。对于汤恩伯和李仙洲的进攻，我们决不能听其封锁住，必须打到反共军队后方去，这一点是书记处各同志的一致意见。

接到电报后，周恩来和博古立即复电提出进一步建议：为准备同蒋介石决裂，须顾及国统区力量的疏散、隐蔽，建议缓发中共中央宣言和复何应钦、白崇禧电，“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能避免的袭击”；也便于此间争取避免破裂的最后可能。

11月3日，中共中央的复电中说：所见甚是，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宣言已决定缓发，复何、白电，也推至10号左右再发。这一天，周恩来还收到毛泽东来电，毛泽东在电报中叮嘱周恩来，认为我们现在“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

> 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着投降分裂的危险。我们共产党愿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到底，而对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决不容忍。要求积极加

紧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组织必须“全部的完全的有秩序的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这是中共中央为防止时局恶化、反对投降的主要指示。

11月9日，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这便是“佳电”。电报一方面坚决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这个合情合理的立场，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国共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佳电”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日是有诚意的，在各方面引起很好的反响，使国民党不好回答。

“佳电”发出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积极扩大宣传，争取和平，争取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周恩来领导下所做的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使社会各界、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中间势力了解了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和事件发展的真相，博得了他们的同情。这对“皖南事变”发生后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他还对黑暗时期的来临做好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将各地党组织转入地下，干部隐蔽、分散、转移、撤退等等。

11月18日，新四军军部电告中共中央，顾祝同允许皖南新四军经苏南渡江北移。

12月7日，蒋介石核准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11月14

日拟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密令各部执行。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电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悉数调赴河北"。

周恩来心明眼亮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软硬兼施，大灌迷汤，暗中屠刀已经举起

这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一直和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谈判，以期挽救时局，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方面的关系。1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蒋介石通过张冲约见。周恩来准备利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放四周年纪念日见蒋，提出皖南部队决定过江，江北部队缓调。交换条件是：速给新四军发补给；停止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同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指示："同意你见蒋时的交换条件，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

12月25日，周恩来应邀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开始就假惺惺地以极富感情的神情对周恩来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

对于蒋介石，周恩来比较熟悉。他们自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打交道，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蒋介石为人狡猾多端，不知道今天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

蒋介石接着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

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都不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蒋介石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顿感慨，转而又威胁地说：“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政治问题，都好解决。”

在政治上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哪会上蒋介石的当？第二天，他在向中共中央报告时指出，蒋介石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他们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周恩来还一针见血地写道：“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

12月底，国民党准备合围新四军的部队已经完成了部署，而项英仍在动摇迟疑，没有坚决的行动，贻误了新四军转移的大好时机。

谈判还在进行，暗地里屠手已经举起了刀——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周恩来义愤填膺。他一面准备困难的考验，一面对国民党展开政治攻势。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1941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纪念

日。重庆化龙桥虎头岩的新华日报社里，人们正在静静地聆听周恩来作报告。这时候，一个机要人员满头大汗地跑进会场，把一封特急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拿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他扫视全场，立即以异常悲愤的语调向大家宣布，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

人们一下子被严重的事态惊呆了。这时候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周恩来不为所动，意味深长地鼓励大家说：

> 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更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

这时候电灯又亮了。周恩来接着说："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最后他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投降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1941年1月，是一个黑色的月份。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

消息传到各地，爱国进步人士无不扼腕痛惜，同时表现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痛恨。

周恩来随后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纸上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消息披露出去，然后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并向中央请示报告。周恩来一方面组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交涉，同时告诉大家立即销毁文件，准备应付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进行气节教育，准备坐牢。

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悍然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叛变”，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从而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

周恩来义愤填膺地给何应钦打电话：“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周恩来气愤地摔下听筒，随即乘车赶往张冲处抗议，然后返回红岩。

国民党当局生怕丑行败露于世，对于《新华日报》所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实行严格检查，全部扣押，禁止刊登。周恩来决定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在报纸上题写了举世闻名的诗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同时，周恩来严密策划，动员报童、报丁和工作人员，连夜从报社的后山将报纸偷运进城，送到广大读者的手中。当国民党特务发现这一情况后，皖南事变发生的消息早已传遍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2月2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同时，周恩来还做好了应付黑暗局面到来的精神准备。他

对南方局机关的党员干部们说：

> 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红岩和曾家岩有一个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就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不知，可以叫他们去问支部书记，问周恩来，问我！

1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处理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并针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新四军的诬蔑，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实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将十二条交给张冲转交蒋介石，使蒋介石十分被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慨，人们更加看清

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真面目。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在政治上实行全面进攻，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他们建议：就皖南事变真相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发表；由新四军各支队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扣捕官兵，退还枪支、器材，控告顾祝同、上官云相，要求严惩肇事将领。并声明在原地坚持抗战，决不接受任何命令等等。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些建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军事组在重庆秘密散发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而且还在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造成了国内外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国民党的反共行径为各界人士所认识……国民党精心策划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打退了。

蒋介石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责难下，面临着巨大的外交压力，在政治上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局面。正如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报中所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小小投机酿成了政治上的巨大失败。在这场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挺立在斗争的最前沿，像浓雾横锁的山城夜幕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人们的心……

（费虹寰）

和平鸽哨在山城响起

——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绝望和颓唐中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此降下帷幕。中国大地上饱受战争蹂躏的群众，欣喜若狂地品味着胜利的喜悦。在这历史转折关头，47岁的周恩来正在延安忙于和毛泽东等一起部署日本战败后的受降问题。

政治格局决定着政治走向。胜利后的中国将走向何处，这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全国人民拭目以待的大事。1945年8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可是，和平真的来临了吗？

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蒋介石就调兵遣将，加紧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部署，却独独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原地驻防待命。周恩来在8月13日的新华社评论中，痛快淋漓地揭破了蒋介石的阴谋

抗战时期一直偏安西南一隅的蒋介石集团，却意在党派利

益和一己私利的夺取。他们凭着手中有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妄想独吞全国人民包括中共八年浴血奋战的成果。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蒋介石就调兵遣将，加紧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部署。8月11日，蒋介石政府的最高统帅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却独独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又命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备接受国民党军队收编。蒋介石破坏抗战胜利和平局面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周恩来等中共领袖长期和蒋介石打交道，对他心中的鬼胎十分了解。周恩来在8月13日的新华社评论中，痛快淋漓地揭破了蒋介石的阴谋："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宣言及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算合法。"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现在惟有呼吁全国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蒋介石的阴谋被戳穿了。在收复沦陷区的军事行动中，由于中共军队推进迅速、国民党军队路途较远，反应迟缓，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一定的阻碍。眼看着半壁江山就被中共夺取，蒋介石大为着急。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缓兵之计出笼了——

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放出和平烟幕。毛泽东深知其堂奥，偕周恩来、王若飞毅然出山

1945年8月14日，一封来自重庆的电报被送到了毛泽东

的案头：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蒋介石的障眼法岂能骗过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毛泽东主意已定，8月16日的一封回电就将蒋介石的花招轻轻化解：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蒋介石见事情不成，马上在8月20日再发一电，催促毛泽东前往重庆。22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了复蒋介石的电报，声称："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中共中央的回电，既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又开始进一步考察蒋介石的诚意。当然，中共中央深知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正如周恩来8月2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所说：

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

中共中央之所以做好了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准备，是因为在22日前后，收到了斯大林的来电，电文指示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也正在此时，蒋介石的第三封催促电又来了，中国共产党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赴重庆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袖，深入险地重庆，自然牵动着全党同志的心。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仔细和认真的讨论，决心同意毛泽东去重庆。2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和蒋介石谈判的问题。

消息传出后，全世界的目光都紧紧地盯在了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那块飘动着赤旗的土地……

毛泽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山城重庆上空的鸽哨似乎奏响了一曲和平的交响曲，但和平能够真正像动听的鸽哨一般从天而降吗

8月27日，赫尔利、张治中来到延安迎接毛泽东赴渝。28日，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张二人的陪同下离开延安。毛泽东身穿蓝布制服，头戴遮阳帽，毅然出山。延安东门外机场登机后的瞬间挥手，成为历史画卷中极具性格特色的记忆。在毛泽东身后的随员中，自然少不了风度翩翩的周恩来。他深知此番深入虎穴，岂能不经历几番风雨？

童小鹏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 8月28日，这是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10时半，毛主席在中央负责同志陪同下乘车来到了机场，人群中的欢呼声、口号声震荡着延河两岸的山谷。……11时，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和前来欢送的中央负责同志握别后，登上了专机。毛主席站在机舱门口挥动着帽子，满怀胜利的信心，向欢送的广大军民告别。专机随即升上了延安晴朗的碧空，去进行一场新的战斗。

下午3时45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机场上聚集着蒋介石的代表以及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当然，这种万众瞩目的场合是少不了新闻记者的。《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

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9个人。

毛泽东一走下飞机就被欢迎记者们团团围住。周恩来为了使毛泽东早点脱离围拥，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周恩来用毛泽东的书面讲话将记者们吸引开，才使毛泽东有机会同民主党派人士交谈。

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就此拉开序幕。

山城重庆上空的鸽哨似乎奏响了一曲和平的交响曲，但和平能够真正像动听的鸽哨一般从天而降吗？

艰难的谈判进程。周恩来力促协议的达成。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签署

毛泽东的到来，顿时使蒋介石手足无措，他并没有想到毛

泽东居然有深入虎穴的胆量。在没有丝毫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慌忙中委派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与中共进行会谈。可就在29日这一天，何应钦还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其阴险的两面手段昭然若揭。

国民党方面根本没有准备进行真正的谈判，因此他们连基本的谈判方案都没有准备。从8月30日起，双方谈判代表开始就一般性问题作原则商谈。为了推进谈判得到一个具体的成果，9月3日，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十一项原则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十一项的要点是：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

十、军队国家化；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

说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蒋介石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的，甚至连将这十一点原则作为讨论的基础都不同意。次日，蒋介石硬着头皮提出了仓促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在他

的“要点”中，最为重要的是谋求“军令政令之统一”，并严格控制中共军队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

双方的意见差距很大，自然免不了周恩来和王若飞舌战群儒。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等人在周恩来的如山的事实和宽洪的诚恳表现面前，仍然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于是谈判一开始就颇不顺利，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9月8日，谈判恢复了。周恩来从容地面对国民党代表问道，依据我方的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也退出一半，而且在政治会议、国民大会和自由问题上，我们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可是政府方面却没有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在周恩来的一再追问下，吞吞吐吐的张群才拿出《对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满篇是拒绝之语。看到国民党方面僵硬的谈判表现，周恩来深知这全是蒋介石在背后作祟，前面张群、王世杰等人不过是提线木偶，要想取得进展谈何容易！

从10日到21日，双方继续进行了六轮会谈，焦点依然集中在军队整编和解放区问题上。

在军队整编问题上，蒋介石力图缩小中共的力量，提出将数目限制在12个师之内。双方相持两周也未获得进展。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商议，毅然决定再做让步。周恩来据此对张群等人说：“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3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如中央军队缩编为60个师，中共应为10（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我方应有20个师。”此外，周恩来还就军队驻地等问题提出让步意见。但是，这些充满诚意的提案还是遭到拒绝。

除此而外，双方在解放区问题上差距甚大，并在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上也发生了争议。赫尔利找到毛泽东，要求中

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沉着地回答他：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赫尔利碰了一个软钉子，没能打破僵局，可僵局是靠压服来打破的吗？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继续冷处理，在此中断了和国民党代表的会谈，同时向各界人士说明真相，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

在世人瞩目的情势下，蒋介石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使和谈破裂的恶名，于是，停顿刚刚持续三天，国民党代表就主动要求重开谈判，并在25日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和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谈判之门再次打开。

这一次与从前大为不同了。国民党谈判代表见识了周恩来和王若飞的雄才大略，而且在他们有理有据、有进有退的辩论中，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加上形势所迫，于是谈判的进程被加快了。

在军事问题上，中共表示愿意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将抗日军队整编为24个师、至少20个师。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驻地问题可以双方讨论决定。同时，双方均同意为解决有关军队整编问题，组成由叶剑英、林蔚和刘斐组成的三人小组。

在解放区问题上，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中共最后表示同意继续就此商谈。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虽没有达成协议，但中共从大局着眼，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在政治会议问题上，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协议和

平建国方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同时，周恩来折冲樽俎，在各党各派的席位问题上进行了细致的磋商，终于使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10月2日，周恩来提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10月8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双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磋商。10月10日，作为43天谈判成果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签署；12日，公布于世。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亲冒风险深入虎穴，周恩来自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于泰山

即使是周恩来的对手都承认，他是一位杰出的谈判大师。

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他还是历史巨人毛泽东的最默契的政治伙伴。

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亲冒风险深入虎穴，使多少人寝食难安，周恩来自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于泰山。

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就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住房和饮食习惯等方方面面的事情作了周到的安排。他对警卫人员说："到重庆后，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

到重庆后，周恩来更是事必躬亲。凡是毛泽东要到的地

方，他都要事先周密安排，仔细检查，床上、床下、枕头、座椅，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在宴会上，他接过别人给毛泽东的敬酒，生怕毛泽东不胜酒力或被人加害。甚至在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枪击误伤的时候，他没有惊动正在看戏的毛泽东，把一切处理妥当后，又悄悄地回到剧场，未向毛泽东透露一个字。而场外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则在周恩来的责令下，用自己的汽车将看完戏的毛泽东亲自护送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

10月1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由张治中陪同，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乘坐C－47式运输机，飞返延安。周恩来则留在重庆继续进行和国民党代表旷日持久的谈判以解决未尽事宜。

周恩来将毛泽东送到机场。毛泽东登机后，飞机慢慢起飞，周恩来仰头望着天空中渐去渐远、渐远渐小的飞机，内心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一群鸽子飞过长天，他不禁自问，山城的鸽哨真的能够带来和平么？

关于重庆谈判的意义，1945年10月1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社论《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做了高度评价：

> 8月底起，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之间的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这说明了为什么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如此焦急地期待着会谈的结果。昨天发表的《政府和中共会谈纪要》，给了公众以一个不负人民期望的回答。《会谈纪要》证

明了商谈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获得了重要的成果。这次会谈乃是如何用协商的方法，解决为中国和平、民主、进步发展所提出的迫切问题，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复杂和最困难问题的范例。会谈的结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的表现。

也许毛泽东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评价更切实、目光更深远，也最终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他说：

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费虹寰）

战争与和平的变奏曲

——与马歇尔关于国共关系的谈判

国共双方的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的局面。双方的谈判和当时国内战火频发的现实，构成了边打边谈的局面。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谈判陷入僵局，中国正在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上徘徊。

内战的危机引起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严重关注。自从赫尔利铩羽而归后，美国人知道公开的扶蒋反共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白宫的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若蒋介石发动内战，其结果“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出于维持美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美国政府不希望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因此，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代之以温和的调处手段。

斯大林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的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中共欢迎杜鲁门声明和马歇尔来华

1945年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宣布辞职，在

一片谴责声中“咆哮”而去。随后，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被任命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矛盾。

对于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周恩来在1945年12月5日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明确分析道：

> 胡政之回来说：在抗战时，美国需要利用一切力量打日本，故颇重视中共力量；现在抗战胜利，美国需要安定（实际上是独霸），故极力支持中国统一。这就是美国政策之最确切的说明。拿我们话说：抗战时是扶蒋用共，战后是扶蒋压共。……
>
> 继之而来的马歇尔，是不是会变更美国今天的政策呢？我以为至少在目前基本上是不会变的，可变的是办法。办法有三种：一种是武的，最多不过直接参战，其结果如上所说；一种是文的，最多不过如赫尔利的五条，其结果仍是旧民主的统一武力，蒋固不能完全同意，我亦不能完全做到；再一种是双方并压，一方面减少或暂停对蒋之军事援助，避免内战扩大，另方面对我们施以某种政治上的压力。这三种办法的目的均在支持中国统一，好便于美国取得优势或独霸。

周恩来的分析十分精道、准确，完全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华政策发表声明，认为一个紊乱的、分裂的中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分歧，扩大政府基础，推进民主改革，用和平之方式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

随后，在苏美英三国外长的莫斯科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游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马歇尔将军试图说服蒋介石与共产党达成一项专门的协定，使之成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最佳途径。"莫洛托夫回答说："美国处于了解蒋介石政府的意图和计划的最佳地位上。惟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确实希望解决其内部问题。"当贝尔纳斯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明确表示："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的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12月27日，三国外长发表会议公报，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并重申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马歇尔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华的，一时被视为三大国赞助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的化身。

马歇尔是1945年12月22日来到重庆的。五天前，王炳南就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通知美国代办罗伯逊，周恩来等中共政协代表已到重庆，中共欢迎杜鲁门声明和马歇尔来华。

22日这一天，周恩来亲自来到机场迎接了马歇尔。23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拜访了马歇尔，对他来华表示欢迎。周恩来还特意对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 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走入宪政的国家……美国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一）华盛顿时代的民

族独立精神；（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精神；（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党的工业化。”

周恩来温文尔雅的态度和他所表达的对美国往圣先贤的敬意，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叱咤风云、驰名世界的马歇尔将军感到如沐春风。

停战、政协和整军三大协议分别签订，似乎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丝国内和平的曙光，也许和平统一的前景真的不远了

经马歇尔的积极斡旋，国共谈判于12月27日正式恢复。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周恩来将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提议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中提出：（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住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的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恢复交通及解放区、收复区等，在军事冲突停止后用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实现上述两项，在政协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考察团分赴有内战的各地区考察，随时报告事实真相，公诸国人。

在国际压力和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31日，王世杰在谈判中递交了国民党的复文，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

考察团，对所有同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这一天，蒋介石决定于翌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其实，周恩来对国民党提出的邀请美方直接介入国共谈判的建议是态度审慎的。他曾委婉地向马歇尔表示，为了促进国共间的信任，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协助，希望盟国过问中国的内争，但同时也希望盟国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虽说要做到二者兼顾不致顾此失彼“极为困难”，但中共方面“很愿在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考虑问题”。

对此，中共中央1946年1月2日致电周恩来：“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能做到英苏参加更好，如做不到只好让马（歇尔）单独参加。”

1月3日，周恩来正式答复马歇尔表示欢迎他参加有关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并说明中共原则上同意国民党的复案，但强调应恢复一切交通，包括邮电、航空和解除封锁等。他还指出，军事冲突应限期停止，特别是热河省和津浦线的冲突应立刻停止。

经多次会商，国共双方于1月5日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达成了如下初步协议：

> （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

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8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代表，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经过反复磋商，特别是排除国民党企图强占已由解放军控制的赤峰、多伦两地的无理要求后，周恩来和张群于1月10日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其后，战争的确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一个时期，给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停战协议的签署，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道路。

就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同一天，万众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社会贤达9人。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和邓颖超。

开幕式上，蒋介石首先致词，他作出了四项保证：

（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释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词中说，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和民主人士多年以来所期待的，经过政府及中共代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会谈中加以确定了。这次会议主要的是各抗日党派的协商会议，为使会议的范围扩大和比较完备起见，更邀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参加。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尤其当举国一致要求迅速结束训政，积极筹备宪政的过渡期中，这个会议更负有严重的历史任务。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就是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他表示，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致词中，周恩来还对蒋介石代表政府所作的四项保证表示欢迎，他说：“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在12日向大会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总结了四点经验教训，以供会议参考。他说：

“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

“第二点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

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到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

“第三点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像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之所争执的军队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都应该在立国方针和制度之下，求得互让解决，不应要求独霸。”

“第四点是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的人民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消，才能有益于建国。”

最后，周恩来强调：“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

周恩来的讲话，为会议的走向定下了一个务实的基调，难怪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懂得宣传的人，必须懂得人民的心理，离开人民的心理而言宣传，必扞格而不

能人。共产党是懂得宣传的，因为他们时常注意人们的心理，人民的要求。”

1月14日以后，会议进入正题的讨论。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其议题有五个：一是改组政府问题，二是施政纲领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四是国民大会问题，五是宪法草案问题。周恩来除出席大会外，主要参加了军事组和宪法草案组的讨论，发表了重要意见。

对于以上五个议题的讨论，虽然意见颇为参差，但总算不同程度地达成了协议。1月27日，周恩来和陆定一飞返延安，向中央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认为“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肯定其“方针都是正确的”，并同意代表团在政协文件上签字。

1月30日下午，周恩来和陆定一飞返重庆。次日晚上，政协会议举行第十次大会，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决议案。政协会议总算取得了成功。

2月6日，周恩来在回答美国《读者文摘》记者乌特莱女士的提问时，曾对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所做的基本让步作了概括。他说，会议通过的纲领与中共原来的提案出入颇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问题上，放弃了根据边区经验而提的三三制，即最大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原则，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会中占二分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草的原则问题上，接受了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如解散国会制度；在国大问题上，做了大让步，容许始终为人民反对的十年前的代表继续存在。但“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做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

一蹴而就，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

政协会议确定了军党分立、军政分治、以政治军的整编原则，并责成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全国军队的整编办法。军事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主要围绕马歇尔提出的整军方案来进行。双方争论的焦点有三个，即国共军队的比例、整编的时间和程序、整军方案的名称。

关于国共军队的比例问题。马歇尔曾提出一个 5 比 1 的方案，即第一期整编时，国民党军队编 90 个师，中共军队编 18 个师；第二期整编时，国民党军队编 50 个师，中共军队编 10 个师。但中共方面对马歇尔所提之比例并不完全赞同。1946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第一期整编时至少坚持中共军队编 20 个师，而且要力争编 7 个军，并为东北部队增编三四个师，同时强调：“中国军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

在商谈中，周恩来一方面坚决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同时为了达成一致也采取了一定的弹性措施，但遭到了张治中的拒绝，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马歇尔又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在整编第一阶段的前 9 个月，国民党军队整编为 105 个师，中共军队整编为 20 个师，到第 12 个月，国民党军队缩为 90 个师，中共军队为 18 个师。

为推进谈判进程，周恩来率先表示同意马歇尔所提之方案，经反复讨价还价，张治中最后也表示接受按 5 比 1 的比例整军。于是，三人小组就军队数目问题达成协议，商定目前国民党军队裁编为 90 个师，中共军队编为 18 个师；整编全部完成后，全国军队编为 60 个师，其中国民党军队 50 个师，中共军队 10 个师。虽然说这一方案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但蒋介

石却认为，允许中共军队整编为18个师，是“政府最大之损失”。

在整编的时间和程序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矛盾。其中尤其在“混编”和“统编”的问题上，周恩来坚持中共中央的精神，驳斥了张治中所谓“混编”的意见，使中共军队免于被“吃掉”的后果。几经争论以后，三人小组最后敲定，在整军协议中使用“统编”一词。

在整编的时间问题上，周恩来贯彻中共中央“拖一段时间”的方案，保全了中共的利益。他的发言有理有据，给马歇尔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经验丰富的马歇尔又提出了分两步整编的折衷方案。由于军队问题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能贸然答应，于是他赶回延安汇报，延安经过认真讨论，最终也同意了马歇尔的分两步整编的步骤。

关于整军方案的名称，由于措词问题包含了诸多政治含义，周恩来先是表示不同意马歇尔提出的名称：“整编中共军队并使之合编为中国政府军队的基本方案”，继而提出应冠以“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方案”的名称。可是张治中又拒绝修改。马歇尔见状又提出是否可改为“中国军队复员和统编为国家军队的基本方案”。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但张治中仍旧反对。2月22日，休会后的谈判重开，张治中重新提出名称应定为：“改编中共军队为国民政府军的基本方案”，妄图在军队国家化的幌子下，将中共军队编入国民党军队化于无形，周恩来当然不能答应。

几经折冲，最后双方只好采用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由于这个名称基本上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较为合情合理，于是整编军队方案就此敲定下来。

2月25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在重庆上清寺尧庐

正式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至此，整军谈判画上了句号。

停战、政协和整军三大协议的签订，似乎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丝国内和平的曙光，也许和平统一的前景真的不远了？

“空中霸王号”专机载着军事三人小组来到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巡视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

为制止干戈再起，整军方案签订后，马歇尔在2月26日的三人会议上，约请周恩来、张治中同赴华北视察，了解各地对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军队整编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视察区域上，双方意见不一。在中国南方地区，当时活跃着东江纵队和冯白驹的支队，在中原尚有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东北地区也有大量的中共部队。国民党方面为了削弱中共军队的力量，妄图暗中消灭他们，便对明显存在的事实不予承认。周恩来虽然极力争取，但未取得成果。

2月28日，三人军事小组乘坐马歇尔的“空中霸王号”专机启程，先后来到了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于3月6日返回重庆。

这次视察，正如三人军事小组在汉口发表的一份书面宣言中所称：

三人小组此次出巡的目的，在于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委员举行会谈，然后会同各委员赴各地会晤各军事长官及执行小组，以谋澄清各地之意见与误会。我等希望获得机会当面解释在渝商定之数项正式协议之伟大目的，并为各军事长官对中国军队整编之繁重工作做一准备。正如我等所料，曾遇见一些困难，然此仅限于某些区域以内，而非普遍现象。我等现可声言，根据各地各有关军事长官之间所成立的协议，吾人坚信各地之围困即可解除，人民自由来往之束缚亦可停止，并使恢复各种交通之耽言得以消失。吾等并信，在各军事长官之间业已成立一种合作之健全基础，生活之正常状态可以迅速建立。此外，吾人认为，各地之军队在精神上已准备，正在从事整编与统编之艰难工作，我等并对各军事首长在明了重庆协定之广大目的后所表示之合作愿望表示感谢。

周恩来在此前后的谈判和工作中，给马歇尔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歇尔曾在3月4日会见毛泽东时评价周恩来说："在谈判中，我曾取得周将军的合作，而（他）对接触的问题也有友好的态度……就全世界而言，他都是一位极好的谈判者。和他在一起，你一无所损，但有极多收获。我们二人间有极好的友谊。"

马歇尔还曾对顾维钧说过，在他本人的经历中，他曾与各种各样的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没有哪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他还说，周恩来的谈判技巧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另一方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赖。

蒋介石公然破坏三项协议，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战争乌云再次笼罩了中国大地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感到欣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表现了履行协议、谋求国内和平的诚意。但是国民党集团却不能容忍真正的民主改革。1月15日，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1月22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好处，本党已经受害。”并告诫说：“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1月31日，顽固分子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捶胸顿足，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无”宪草破坏无遗了！他们对政协五项决议都表示不满，对于宪草尤其不满。蒋介石本人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可见蒋介石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履行这些协议。

政协会议结束后，国民党便制造了一系列破坏和平民主建国的事件，并无视中共方面的严正抗议，在其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公然提出“妥筹补救”政协决议。4月1日，蒋介石还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演，公然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

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并声称：“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这一切表明，蒋介石不仅要撕毁政协协议，而且要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决策，指示各地党组织和各根据地“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引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任何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的批评攻势。但这一切努力均未奏效，国民党还是一意孤行，坚持违反停战令，无限制地向东北运兵，战争的乌云再次笼罩了中国大地。

中国东北开始大打。周恩来与归来的马歇尔长谈，马歇尔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周恩来批评美国对华政策。他对马歇尔说：“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1946年1月10日停战令发布后，关外的内战仍在继续。

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国共冲突愈演愈烈。

马歇尔来华时，中共军队已在东北占有相当的优势。为了满足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会议所签署的协议中，对国民党做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国民党接收被苏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同意让国民党军队整编后在东北与全国一样占有5比1的优势。当然，中共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国民党必须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承认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中共中央当时曾明确指示东北局，要做好准备，在和平到来之后与国民党合作。在谈判中，周恩来也多次主动地向张治中、马歇尔提出东北问题，但国民党竭力回避。蒋介石显然看出，马歇尔对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关系正存疑虑，他愿意让国民党在东北占优势。

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临行前，毛泽东曾通过周恩来带话给他，希望他等到东北的局势安定下来再走，但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走后，国共美三方直到3月27日才签订了向东北派出停战执行小组监督调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此后，蒋介石又借口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是接收主权，而不受停火限制，结果派出的停战调处小组因受蒋方的阻挠而不能起任何作用。

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代表团明确看出，只有在蒋介石的大打大斗政策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才有可能谈判。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不能对国民党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4月18日，当马歇尔述职归来之时，正是东北的战斗升级之际。国民党军队对东北民主联军据守的四平发动总攻，而我军也在这一天进驻了长春。这个时期，虽然我们党采取了以打对打的方针，但目的乃是以反击促和谈。

4月22日，周恩来与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马歇尔进行了一

次长谈。长达三四小时的谈话，几乎都是周恩来一个人在讲。在历次重大谈判中，周恩来这种后发制人的办法在赢得主动权方面是很成功的。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向马歇尔指出：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便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给我读过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说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我们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3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随后，周恩来把马歇尔离华期间国民党政府破坏各项协议的情况做了十分详尽而准确的说明。周恩来开诚布公的声明使马歇尔无言以对。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马歇尔承认，国民党给了中共以指责他们的充分口实。

这次会谈后不久，马歇尔曾对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5月，中共军队没有能够抵挡住国民党军队对长春的进攻，22日撤出了战斗。蒋介石更加趾高气扬，决定继续向北推进。此时，中共代表团认为，形势已濒于全面内战的边缘，但美蒋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于是他们向党中央提出“逼美压蒋”的策略建议。在6月初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现实使他不能不认识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有两重政策：一个是好的方面，是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世界各国要合作，中国各方也要合作；另一个是比较黯淡的方面，就是把中国实现民主化放在一旁，而积极帮助国民党继续搞独裁。他列举了美国援蒋的大量事实，向马歇尔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内

战是负有责任的。同时，他还对马歇尔说：你来中国代表了美国政策中好的一面。在你来华初期，蒋介石就不希望你的使命获得成功，现在蒋介石已在准备大打，想把你拖下水。

事实上，马歇尔来中国的最后一张底牌就是如果蒋介石不愿让步而使得国共之间无法达成协议时，美国仍要支持蒋介石。周恩来的一番话，正好击中了马歇尔的痛处，他不得不从内心钦佩周恩来敏锐的洞察力。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周恩来为中国的和平民主折冲樽俎，但中国内战的危险仍旧难以逆转。

9月底，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周恩来马上致函马歇尔、蒋介石，声明如果国民党军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中共将认为国民党政府已公然宣告和谈破裂。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国共谈判到了破裂的最后关头。11月15日，伪国大终于开幕。

次日，周恩来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并严正谴责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恶政策。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历时一年之久的由马歇尔斡旋的国共谈判落幕了。

周恩来最后曾对马歇尔这样说：“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贵虹寰）

陕北高原上的370天

——与转战陕北

1947年初，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蒋介石由于大量主力部队被歼灭，不得不放弃原定的全面进攻，开始采取重点进攻的手法。重点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蒋介石昼夜不得安寝的心腹大患。在全面进攻中连遭败绩的国民党部队，如果能在重点进攻中一鼓而下，夺取延安，不但可以振奋低迷的士气，而且可以使国共斗争的不利形势根本改观。

2月底，蒋介石亲冒锋镝，来到西安，安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西安是蒋介石的蒙难之地，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1936年12月的那段往事。如果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心怀异志，怎么会有共产党羽翼丰满的今天？一想起这些，蒋介石就恨得牙根儿发痒……

这时，西安事变中的另一位主角——周恩来，正在延安主持中共在蒋管区的工作。这里每天函电交驰，红色电波将中共中央的指令准确地发到全国各地。西北高原的红色一角导演着本世纪最为宏大的历史正剧，运筹帷幄之中抒写着新的历史传奇。

胡宗南来势凶猛，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周恩来对战士们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早在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得到消息，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了心腹爱将胡宗南，部署进攻延安的恶毒计划。鉴于敌众我寡，中共中央决定延安紧急疏散。

3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向各地通报：胡宗南指挥17个旅主力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10日集中完毕，15日可能开始攻击。

3月8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一万多人参加的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指出：

> 过去8个月，我们消灭蒋军65个旅，捉了100多个将军。蒋介石因为在别的地方不能打胜仗，所以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别的解放区都打胜仗，我们也应该多多消灭蒋介石、胡宗南进攻的部队。就全国形势来说，不消灭蒋的力量，不打垮他的进攻，中国就绝没有真正的和平；不把他的独裁卖国统治取消，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

胡宗南的攻势来势凶猛。3月11日，美军观察组刚刚撤离，国民党的飞机就飞临延安，投下成吨的炸弹。13日，蒋

介石的34个旅23万人，分别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其中胡宗南的15个旅1万人充当了急先锋，由洛川、宜川一线北犯。为了中央机关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形势虽然严峻，但还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大局的。正如3月17日周恩来致信续范亭所说：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中国六大战场，东北、鲁苏、冀豫、晋绥，我已渐取得主动，冀察热在对峙中，只西北胡宗南集中兵力向延安突入。即使延安不守，胡敌也将消耗甚大，而我反得以从容各个歼灭之。倘以边区现有力量能钳制与削弱胡宗南主力于此，则对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

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雄才伟略，才有这样大手笔的作为。为了争取斗争的主动权，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满怀信心地对战士们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以周到细致著称的周恩来主持了撤退前的准备工作。一切井然有序，要不是有条延河，管保敌人来了连口水都喝不上。3月18日下午，敌人越来越近了，连手榴弹的爆炸声都可以清楚地听见。周恩来检查完各处转移和疏散的进行情况，快步来到毛泽东的窑洞，看到毛泽东还在头也不抬地办公，就笑着说："主席，该走了！"毛泽东成竹在胸："现在还有点时间，恩来呀，我们吃了饭再走！"二人相视一笑，于是警卫员端上了简单的饭菜。

傍晚7时左右，周恩来走出窑洞，大声下达了出发的命令，然后一哨人马从容撤退，给胡宗南留下了一座空城。那份潇洒，恐怕只有上演空城计的诸葛孔明才可比拟一二。

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负起总参谋长的职责。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人民解放军三战三捷

毛泽东的汽车驶出延安城，走了七八十里，来到了延川县永坪镇刘家渠住下。这是转战陕北的第一站。次日，他们来到了清涧县徐家沟。

胡宗南所部很快进入了空城延安。他们自欺欺人地叫嚷："中共已成流寇！"可是解放军主力部队到哪里去了，却是摸不着头脑。

此时，我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经悄悄部署在敌人的侧翼，寻机歼敌。

20日，周恩来离开徐家沟，前往子长县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24日，周恩来针对敌人有电台侦测设备的新情况，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25日，他来到瓦窑堡好坪沟新华广播电台看望工作人员。

就在这一天，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东北青化砭设伏歼灭了胡宗南第三十一旅旅部和1个团2900余人，俘敌旅长李纪云，取得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

也是在同一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四人同刚刚到达王家坪的毛泽东会合，五大书记齐集王家坪，对中央和军委机关在陕北坚持工作和向晋西北转移的人员作出部署。要求贺龙、叶剑英、杨尚昆迅速将机关转至太行。暂留晋绥的中央、军委机关，原则上不应过于集中。

28日，周恩来到达清涧县枣林沟。29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叶剑英、杨尚昆留在晋西北。毛泽东在会上解释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他不同意给陕北再增加部队，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

会后，毛泽东等人的汽车也随刘少奇和朱德过了黄河，年过半百的毛泽东和49岁的周恩来就靠马匹和步行，开始在陕北的沟沟岔岔中和敌人展开了巧妙的周旋。

枣林沟会议的次日，周恩来骑马北上前往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去部署中央机关人员的转移和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成立的准备工作。4月10日，他赶到青阳岔同毛泽东会合。

从此，因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身在前线，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实际负起总参谋长的职责。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编为四个大队，成立了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员，

陆定一任政委，名称是“三支队”。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应起个代号。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呢？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后来，周恩来曾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4月12日，部队从青阳岔出发，转移到王家湾。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工作。由于总参谋长彭德怀身在前线，周恩来事实上成为毛泽东的总参谋长。他们到王家湾后，就成立了一个军事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

在王家湾的57天，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部队转战陕北过程中一次时间较长的停留。在这期间，西北野战兵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羊马河战役和蟠龙镇战役中，共歼敌1.1万余人，活捉敌人指挥官麦宗禹和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军事物资。消息传出，震动敌胆。经周恩来修改后的5月9日新华社评论，辛辣地讥讽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

全国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此时也纷纷取得胜利，国民党发动的重点进攻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周恩来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和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后勤工作的指示，为大反攻进行积极准备。

这时候，西北野战兵团按计划西进陇东，于是留在陕北的

兵力更加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问题愈加严峻。

6月9日，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带领4个半旅搜索前进来到王家湾附近，周恩来一面组织部队保卫毛泽东在雨夜撤退，一面安排仅有的少量部队牵制、阻击。这又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中央纵队与敌人相距极近。几经周旋，部队悄悄转移至天赐湾，在这里又住了一个星期。

小河会议作出伟大的战略决策。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可谓实至名归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天赐湾，回到了小河村，正值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时刻。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在7月21至23日，在小河村举行会议。赶来参加会议的除了陈赓外，还有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等人。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召开以前，周恩来就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在会议期间召开了机要工作会议，叮嘱："行军打仗，机要人员一定要在首长跟前。机要工作如果出了问题，要拿负责人是问。"他还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不等敌人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即由战略防御

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

8月7日起，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大踏步长驱南下，实现了“千里跃进”的大胆计划，顺利开始了振奋人心的战略大反攻。

同时，中共中央又派陈赓、谢富治率军南渡黄河；派陈毅、粟裕率军进入鲁西南。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在中原大地、江淮河汉之间展开。这时候在陕北战场，也经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笼罩在陕北高原上空的乌云开始消散。

8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一任命可谓实至名归。

9月，周恩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随着各战区捷报频传，刘戡率部向南撤退到宜川一带，西北战场的局势变得更加有利了。周恩来在10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高兴地写道：“一年多内战经验，证明蒋介石反动集团败局已定。不管美帝帮助多少，甚至直接出兵，也不能挽救其覆灭命运。”

陕北大局初定，12月会议召开。周恩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殚精竭虑

陕北还没有完全解放。11月22日，中央机关又来到米脂县杨家沟。为总结18个月来的解放战争的经验，解决与战争密切联系的土改、统一战线问题，根据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于12月在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这时的直属队代号为“亚洲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整整8个月了，这才得到一个安定的环境。

12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会前，周恩来进行了细致的准备。12月26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说：

> “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7月的刘邓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比小河会议时不同，敌已完全被动。……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停战令时原有230万平方公里，现已恢复，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二。解放区人口现有一亿五千万。在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面，学生运动在全国内战爆发后发生了三次高潮……工人斗争也是如此。农村游击战争在粤、闽、浙、皖有很大发展……”

在讨论中，周恩来还对财政经济、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多次发言，对土改和整党中发生的一些“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是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转眼历史进入了1948年。

新年伊始，周恩来就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而忙碌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打破了千百年来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对调动广大农民参加全国解放战争的积极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使这项工作的开展也经历了曲折。

2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次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阜平中央局电，提出了关于土改和整党的几点意见，再次指出：在封建剥削已不存在或只存残余的地方，“不应再来一次平分土地，而应是调剂土地”；在封建剥削仍然存在的地区，“原则应是平分土地”，“但办法仍应是抽补，而不是完全打烂”。指示电同时指出：“平山用党内外民主结合的办法来整党审干是一个新创造，是最健全的整党办法。”

在这期间，周恩来还为指导前线作战、保障后勤补给、上层统战工作、城市政策等问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于2月23日发起宜川战役，10天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约3万人。不可一世的刘戡和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被击毙。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

3月10日，周恩来在陕北杨家沟向中央直属机关全体人员宣布：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23日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这标志着一年零五天的转战陕北生活的结束，新的生活和战斗即将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历史证明，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费虹寰）

开国奠基　组建政府

——在建国的日子里

毛泽东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刚在1小时前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霎时间，在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飘舞的海洋中，爆发出长久的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毛泽东启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国旗迎着高悬蓝天的红日徐徐升起。这一时刻，标志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项任命，党中央广泛地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各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对周恩来的高度信任和支持，是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

早在1948年初夏，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朱德汇报工作时，就提出了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建议。但是怎么个抓法，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当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朱德强调说："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了解中国革命形势。他在同周恩来会谈后，不无感慨地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51岁的周恩来面对的任务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百端待理：新的人民政府刚建立，政府机关还有待组成；战争还在进行，人民解放军正向南方进军；广大新解放地区经济凋敝、物价飞涨、灾情严重，财政经济处在严重的混乱状态中；在对外关系上，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也正待处理。

但是，开国奠基，组建政府是头等大事。开国大典后，周恩来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怎样设置？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前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一次报告中就已作了概略的介绍，他说：

“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总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

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筹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领导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就是在这以后陆续从各大区调来政务院工作的。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一方面，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另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却有这些方面的人才。这样做，才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1949年3月24日，最高统帅部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向古都北平转移途中，召开了一次商议25日抵达北平后所要做的有关事情的会议。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回忆：

周副主席说，到北平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和那些知名党外人士，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傅作义、柳亚子、茅盾等见面。这些人过去就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更高兴了，他们急于想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成立新政府以后，他们能安排什么工作等等。关于党外人士如何安排工作的问题，我们到北平以后，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进行协商。毛主席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

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

周恩来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将傅作义、黄炎培、李书城等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他提出来的，并且做了大量平衡与

协调工作。

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这样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着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大功劳，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

周恩来在西柏坡对傅作义说：

> 早在1949年2月22日，傅将军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的嘛……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你可以参加这样的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

鉴于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就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协助他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中共中央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个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

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北平市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第二是劝说德高望重的黄炎培担任公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始终奉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对此，有人说他是故鸣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1949年3月，黄炎培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

鉴于这一情况，10月11日下午，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1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理屈词穷”，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12日早晨，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盛情邀请之下，他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

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炎培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感到难以理解了。任职后不久，他在大连工作的四子黄大能因公出差到北京，一见面就问他爸爸："您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 70 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详告了周恩来做他工作的经过，并严肃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呵!"

无独有偶。在旧社会也曾拒绝过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的林业学家梁希，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第三是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

让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呢？周恩来解释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对党也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

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

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提出：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职务。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不予安排。民主人士纷纷称赞道："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由于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机，所以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差不多都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在这前后，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都众口一词地提出：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以做到人尽其才，使她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不予安排。

对此，有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据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卫戍司令彭干臣烈士的儿子彭伟光，1995 年在他撰写的《西花厅见闻》一文中披露：

> 我母亲认为，邓大姐除了是总理的一个贤内助外，还应该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所以我母亲问总理："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到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当时总理很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这个老太太倒想得挺多的呀！这个问题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过去已经有人提过。建国初期，党内外人士都这么提

过，甚至还有人劝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那时，听了总理的话，我的母亲和我认为总理过于认真了。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演进，证实了总理的做法是非常英明的。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其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在这项任命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有15个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他们是：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	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	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	梁　希
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	史　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

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纷纷称赞道："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不久，陈毅也对薄一波说："周总理平衡这个班子的功绩是，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还要照顾到被安排人的资历、职业和他的能力。"

40年后，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孙晓村在《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一文中，仍然感慨道：

>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上海，朋友们都讲共产党的确伟大，打下了江山，但不统统用自己的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党外人士都是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这些事情，我深感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用人唯贤的楷模。"

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

家事务工作。”他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部门就应该有一个组织法。现在由政务院先规定原则，再由各部门自己拟定工作条例、组织条例，以便依法办事。

11月1日，政府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

对于开国总理来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能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周恩来坚决地信任、依靠并支持陈云抓财政经济工作

政务院建立后，怎样才能使政府机构迅速运转起来，有条不紊而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呢？这成为周恩来一直予以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要求各部门立刻着手制定出各种基本的工作条例。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先不拟条文，等习惯养成后再定，问题是工作中缺乏一致性；再就是先定许多条文，定得很细密，缺点是容易束缚人，有些还行不通。鉴于此，他就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先作个大致的规定，不必太详，一方面不束缚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又有章可循，约束自由主义。

根据这个思路，政务院在成立后不到1个月时间内，担负起处理国家日常工作繁重任务的周恩来，先后主持制定了《政务院组织条例》、《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关于任免工作人员的暂行办法》等基本的工作条例，然后提交政

务会议通过后施行。

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政务会议的作用。政务会议的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总共21人。他们中既有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李维汉、罗瑞卿、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又有黄炎培、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等富有政治经验的民主人士。

政务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每周一次。从1949年10月21日到1950年10月20日，一年之内共召开了55次政务会议。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和人事任免都要在这个会议上讨论。

周恩来把政务会议看作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更妥善地作出决策的重要方式。会上，人人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

政务院的工作范围很广，所辖的部门很多，因此设立了三个综合性的委员会进行归口管理，它们是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此外，还设立了一个人民监察委员会。

周恩来要求各级机构都要在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切实负起责任来，并且要保证非党人士能有职有权。他说：

> 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的工作，都是要各部部长对本部工作作报告。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要非党人士作报告，如轻工业部就要黄炎培报告，水利部就要傅作义报告。开始他们情况不熟，报告后可由副部长补充，久了情况熟了，连补充也不需要。同时有任务也责成他们负责完成，比如说河水决口，要水利部负责，傅作义自然会下去布置。有职、有权、有责，自然会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方式很好。政务院的政务

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有关文件等也交非党人士审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们修改。这样，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而且还会完善我们的政策。

政务院的机构建立后，接着就开始进一步健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机构。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大行政区。东北全境解放最早，已经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在政务院各单位正式办公的同一天宣告撤销，华北各省市的事务由政务院直接管辖。西北、华东、中南、西南4个大行政区都着手建立军政委员会。这些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是这个地区所辖省（市）的上级地方政权机关。

为什么需要设立这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呢?

1949年12月9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作了耐心的说明和解释。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大行政区应该成为一级。这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要在统一政策下因地制宜，在因地制宜的发展中求统一。这样的因地制宜，不但不妨碍统一，正是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条件。"针对会上出现的"大行政区成为一级后，是不是会生了根，不容易改变"的担心，周恩来果断地回答道："不会的。那是在旧社会中的问题，在新社会中是不成问题的，华北人民政府就是例子。我们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周恩来还用很大的精力抓了各级地方政权的民主建政问题。他说："解放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有根。用什么方式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呢？用组织的方式，普

选。没有普选的地区，便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到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全国已有1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1个中央直辖的自治区人民政府、4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28个省人民政府、9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12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的市人民政府和67个省辖的市人民政府、2087个县人民政府。

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工作，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到这时已经初具规模了。

人民政府接手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长期的战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对于开国总理来说，他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能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强调：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他坚决地信任、依靠并支持陈云抓财政经济工作。

1997年陈云当年的秘书周太和深情回忆道：

> 早在开国前夕，“周总理就推荐一位能够领导全国财政的人才，来组织全国财政工作。1949年2月，陈云同志奉命由沈阳经过北平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周总理立即口头通知陈云，经毛主席同意，调陈云同志到中央主持财政工作。”
>
> “周总理在1949年4月30号和5月7号，两次电催陈云同志赴北平接受新的工作，陈云同志于5月中旬到的北平，住在怀仁堂与周总理朝夕相处，商议财政大事。”

在周恩来、陈云等政务院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财政经济

工作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奇迹般的成就，新中国经过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并顺利地开始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领导政府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华，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以后，从 1954 年 9 月起，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连续 4 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到 1976 年 1 月逝世，他在共和国总理的岗位上任职长达 26 年。

（熊华源）

首次访苏签新约

——协助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毛泽东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反问："为什么要叫他来"

1950年1月10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凛冽的寒风中，周恩来登上停靠在戒备森严的站台上的专列，开始了他建国后的第一次苏联之行，这也是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周恩来此行，是奉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之命，前去参加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商谈有关中苏两国签约的事宜。

一个多月前的1949年12月6日，在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周恩来送毛泽东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这是毛泽东首次对苏联的访问。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斯大林70岁寿辰庆祝活动，并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以及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

然而，当毛泽东、斯大林这两位伟人相见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谈话不是那么十分投机和融洽。

毛泽东提出：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一起签署商务、

借款、航空等方面的协定。

毛泽东叫周恩来去有他的考虑。毛泽东深知在与外国人谈判打交道方面，周恩来更在行些。他曾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对于周恩来，斯大林并不陌生。除了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得力助手外，斯大林对周恩来卓越的谈判才能及其他方面也早有耳闻。

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因坐骑受惊摔伤，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把他送往苏联治疗。尽管接待工作是共产国际出面负责的，但斯大林对此事也是非常关注。在苏联疗伤期间，周恩来仍然坚持工作。他给共产国际起草了长达55000余字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汇报了中共各方面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出院后，周恩来又根据备忘录向共产国际执委作了一次口头报告。共产国际执委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经修改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斯大林很重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经过一二十天的研究讨论，以共产国际名义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的决议》。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将这一决议交给周恩来时解释说：周恩来的报告斯大林看了，国际执委会关于报告的讨论情况也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研究和讨论。并且十分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了中国问题。这个决议是在斯大林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

季米特洛夫还特意解释说：本来斯大林很想接见周恩来并面谈一切，但是，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来往甚密。这次周恩来是由共产国际接待的，如果斯

大林要接见周恩来，就不能回避接见国民党的外交人员，但他又不愿接见他们。因此这次就不见面了，希望周恩来谅解。

然而，这一次，斯大林对毛泽东要请周恩来到莫斯科表示难以理解。按斯大林的想法，不管中苏之间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而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

斯大林没能猜透毛泽东的意图。他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周恩来）来？签个声明，外交部长没有必要来。"

毛泽东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话。

两位伟人各自按着自己的思路思考自己的事情。会谈遇到了难题。

12 月 24 日，斯大林同毛泽东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闭口不提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心里很不愉快。

此后，前来苏联参加给斯大林祝寿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先后回国，只有毛泽东还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里，看一些由苏联方面安排放映的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消磨时光。斯大林也避而不见毛泽东。

对这一国际交往中罕见的现象，周恩来后来曾指出："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地接待，但是还不如刘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样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外，无事可谈。"

对苏联的这种大国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不信邪的毛泽东也颇有些怒气。毛泽东后来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借口拒绝

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一天，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受斯大林之命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借机对斯大林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仅仅是来祝寿的吗？我是来办事的！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建议毛泽东到苏联各地去游览游览。

毛泽东以他的幽默拒绝了这一建议，说：我哪里也不去，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的态度给斯大林以极大的震撼。在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主权方面，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从不退让。

此时，英国的一家通讯社曾放出风来，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据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披露的《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记载：1950 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对前来看望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说：我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睡眠，打算提前一个月，即在一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

毛泽东还向罗申透露：最近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到北京谈判。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毛泽东这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发出警告。

显然，缅甸和印度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从中不难悟

出英国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有差异的，并非铁板一块。如果中苏签订新的同盟条约，英国不至于和美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

考虑到种种因素，斯大林不得不改变维持原有中苏条约的立场。

1月2日，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去见毛泽东，明确表示：苏联同意废除原有的中苏条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同意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具体商谈。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高兴地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经过短短的几天准备，立即启程。

考虑到谈判的内容，周恩来还特意挑选了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柴树藩、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等人随行。

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有20天的漫长行程。途中，周恩来翻阅了反映日俄战争题材、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旅顺口》。

周恩来是怀着一种希望去翻阅《旅顺口》的，但当他读完后，却大失所望，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种感觉在他几个月之后与身边工作人员漫谈时坦露出来。他说：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

坏。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这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中苏之间的谈判并非全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般的歌声与欢笑，也有尖锐的分歧与紧张的对峙。斯大林终于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周恩来来莫斯科

1月20日下午，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列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到车站举行仪式，欢迎周恩来一行。

欢迎仪式上，周恩来发表了简短的致词：

亲爱的苏联同志和朋友：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这个使命我认为是很荣幸的。苏联政府历来对于中国人民所作的各种友谊的表示，是根据列宁、

斯大林拥护和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一贯政策。现在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之前，周恩来在到达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与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心中有了底，故一到莫斯科就立即投入工作。

1月22日晚，中苏就签订新的条约和协定问题开始正式谈判。中国方面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等；苏联方面参加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等。

斯大林先表示：经过仔细考虑，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不适用，因为那个条约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签订的。这种情况现在已不存在，所以必须另订新约，即友好合作条约。

毛泽东说：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新的情况下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条约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及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侵略。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为着这一目的，两国应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合作关系。

斯大林和毛泽东确定了关于新的中苏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具体商谈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进行。

2月8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了一份近3000字的电报给在国内的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概括性地报告了中苏之间的具体谈判过程。这个新近由文献档案权威部门披露的电报，全文如下：

在此谈判经过，简报如下：

（一）恩来到后，1月22日斯大林同志约集谈话。毛主席说明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帝之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其他国家之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说明现有两类问题要解决：第一类为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第二类为个别请求问题，如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等等。当谈第一类问题时，斯大林对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的条约的意见肯定下来，并对雅尔塔协定问题说可以不必管它。对旅顺口问题，斯大林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确定归还，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提到大连，斯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路，我们因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故当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五十一对四十九）及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联同志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五十对五十），并另提双方代表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举例如第一期局长为苏人，副局长为华人，第二

期则改为局长华人，副局长苏人。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明我们所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大概的规定。关于借款问题，因须从今年一月算起，我们问可否缩短成四年，斯答很困难。关于第一类问题大致谈定后，即决定中苏双方由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具体会谈，后在会谈时苏方加入葛罗米柯、罗申，我方加入王稼祥、李富春。关于第二类问题，军事及空运团，当商定先由刘亚楼与布尔加宁研究材料，其他各项则另订商谈程序。

（二）从23日起，在毛主席指导下，便先谈条约及各项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第一次电告即为该草案。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除文字修改外，较重要的是第二条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和约，第三条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原第五、第六条合为一条。故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定案，已见第二次电告。

（三）关于中长路及旅大协定，我们在第二次会谈时三个新的重要意见：第一个是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中苏两国的团结会更加有利。斯大林同志对此意见，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第二个是如果对日和约三年尚不能缔结，应规定届时将旅顺口及中长路归还中国，斯表示同意。第三个是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也表示同意。谈后，即由我们担任起草协定。

毛主席在第一次谈话时即已说定中长、旅、大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我们原提案乃在第一条将苏联表示放弃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的权利及对于大连和中长路的权益并交还中国写成协定主文。后来苏方修改文如2月5日电告者，将远东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的事实及从新处理中长路旅大诸问题的可能性写上，然后分条规定对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中长路是说至迟三年无偿移交权利财产，对旅顺口说是至迟三年苏军自该地区撤退，并有偿移交上述地区设备，对大连港则俟和约缔结后处理，而大连产业今年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在协定外并有议定书，第一项原为无时间条件苏军得在绥满间运兵及运军需品，后改为如在远东发生战争威胁时始得实行，其他两项是有时间性的。我方对苏联修正案及其议定书已表示同意，国内在同意后亦应本条约原文解释和宣传。

（四）关于贷款协定，草案为苏方提出，我无原则修改，只在解释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时，苏方坚持用2月5日电告的文句，使新民主国家认识苏联何以减少一倍的利息优待中国。贷款协定的议定书，苏方原提出中国将战略原料四种（钨、锡、锑、铅）的剩余，只卖给苏联。后我提除铅外凡剩余均由苏联收买，苏联乃改为规定十四年中卖给苏联的数目，最后苏联同意我们的提案，将铅去掉，并减少锡头四年、锑全十四年的供给数字，生产如增加，当可增订出口。因此，北京陈、薄来电修改的数字便未再提出。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已购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

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各种器材共值4000万元美金。

（五）除上述条约协定及议定书外，更考虑到宣布1945年的条约协定失效的办法，乃决定采用两外长换文的办法，亦为我方起草，苏方无修改通过，已见2月5日电告。

（六）关于贸易协定，我们原拟签订商约，后经毛主席考虑商约条件尚未成熟，乃改提贸易协定，由我方起草与目前中苏贸易有关的十项条文并附两附件及五个附表的出入口货单，现方在商谈中。我们力争议好原则，只留审查出入口货单的工作给后走的同志，并由叶季壮留此签约。季壮来此即病痔，且将开刀，现由富春主持贸易谈判。富春走后，将留沈鸿、张化东、吕东等在季壮领导下续谈。我们所提出入口货单均近两亿美元，出口货价，苏方认为较高，特别大豆每吨相差26美元，入口货单恐有许多工业设备今年很难交货，尤其是农业种子工具今年有误季可能。新疆贸易额出口1000万，入口1000余万，均列入总贸易单内，不单独举行贸易谈判。

（七）关于民航协定，苏方曾两次起草，现将其草案电告，我们意见另附。如可能，当由刘亚楼在此签字。

（八）关于经济合作，除民航外，尚拟由赛福鼎、邓力群与苏方先进行初步接触，然后回迪化正式谈判石油及矿产两项合作，谈定后送中央批准并在北京签字。关于地方通商，斯大林同志极力主张由中央过问，故此次并无地方单独协定。经济合作原则大致定为资本各半，双方代表所负职位按期轮换，时间长短

视产业性质分别规定。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大连产业归还后，某些产业如航渡、港口工事仍将实行合作。

（九）第二类个别问题另电续告。

仔细阅读周恩来的这个电报，可以看出耐人寻味的东西。

实际上，中苏之间的谈判并非全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般的歌声与欢笑，也有尖锐的分歧与紧张的对峙。最为集中的表现是在涉及国家利害的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等一些问题的处理上。

中长路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相连的统称。1896年，清朝政府李鸿章在《中俄同盟密约》中把该路的修筑权出卖给俄国，由俄国人修建。

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夺走了“南满铁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的1935年，苏联又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苏联与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协定，规定苏联对中长路享有“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权利。

这本来就是缺乏法律根据的事。那么，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理应将中长路交还给中国。

据此，在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把中长路交回给中国。

但是，苏联方面却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他们认为，中长路是苏联驻军旅顺口的交通线，也是苏联通向海参崴和滨海地区的重要通道。

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不能接受，并强烈要求苏方召开联共

政治局会议讨论解决。这样，苏联方面被迫同意把中长路交还中国，但又提了个条件，说归还时间要等到中苏两国与日本缔结对日和约之后。

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对日和约签订之日很难预计，应该规定一个归还中长路的年限。因此提出：归还日期不能迟于1952年末，归还前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同时，从体现中国对中长路的主权原则考虑，要求中长路在过渡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中方占51%，苏方占49%，中长路局长由中方人士出任，苏方人士出任副局长。

苏联方面找不到推托的理由，被迫同意按中国方面提出的年限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及附属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但又在双方所占股额上讨价还价，说中国方面提出的股额比例不平等，会影响到苏联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因为苏联与这些国家的股额都是各为一半。所以他们提出：中苏双方的股额也应是各占一半，铁路的正副局长应当采取定期轮换制。

中国政府考虑到苏联已答应定期把中长路归还中国，也就同意了苏联方面的要求。

在解决苏联从旅顺口撤出其驻军的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保持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形式而实际撤兵，二是实际上暂时维持现状，而采用一个新的形式。

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是，新中国刚建立，海军还处在初创时期，苏军晚一点撤离对中国有利。但应该在协定上规定苏联撤兵的期限，使中国日后收回旅顺口有法可依。如果维持原来协定形式，苏军虽然撤离，以后随时还可以进驻，这对中国不利。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同意斯大林的第二个方案。剩下的分歧点就在苏联方面在撤军的期限上。

苏联方面提出苏军从旅顺口撤出，要等到在缔结对日和约之后。中国方面坚持要求应规定一个具体年限。后来，经反复磋商，根据中国政府的意见，与交还中长路的期限一样，最迟不能迟于1952年末，苏联将撤回其在旅顺口的驻军，并将该地区设备移交给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偿付苏联政府自1945年起对这些设备的恢复与建设费用。

在解决大连港的问题上，苏联一开始也提出：大连原是与美国、英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定为自由港的，牵涉到与美国、英国的关系，主张大连问题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处理。周恩来等提出：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完全交回给中国政府，并要求苏联将其在大连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交中国政府接收。在得到苏联方面的上述保证后，中国政府照顾了苏联的要求。

对上述几个问题的处理，虽然还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的来说，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努力，结果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

1950年3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中苏谈判期间解决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的决策内因，作过这样的说明：

> 中长路是运输旅大驻兵的工具。由于美帝扶持日本和煽动战争，所以我们不能让苏联立刻撤兵。在中国的海空军没有很强盛地建立起来以前，我们还需要苏联的武装力量帮助我们驻守旅大，保护港口和沿岸，这在目前已使美帝飞机不敢到东北上空。假如美国一直不签订对日和约，到1952年就归还旅顺和中长路。……这一点大家要清楚，是我们要留着苏联驻兵，并不是苏联不肯退兵，事实上，旅大的行政已完

全由我们管理。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在大的问题上拍板的当然还是毛泽东，但具体的操作和实施都是靠周恩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重要文件，都是周恩来亲自执笔、字斟句酌起草的，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当年参加中苏谈判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 他（指周恩来）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地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漏洞。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今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

有了周恩来，毛泽东负担大减。他与斯大林要商谈的许多事情都委托周恩来商谈办理。

一次，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毛泽东，问毛泽东还有些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双方还应该做些什么。谈话由师哲在一旁翻译。

毛泽东回答说："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宫商谈嘛。"

斯大林说："我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

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在与斯大林的接触与会谈中，周恩来当然是紧跟毛泽东的步调。但是，有时为了打破僵局，缓和气氛，周恩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还要想方设法作某种调节。因为苏联毕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老大哥"，中国的建设还需要苏联的某些援助。

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

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责备中国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谰言方面和苏联步调不一致。原来中苏双方商定各自以官方声明驳斥。苏联方面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毛泽东是指示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严厉驳斥艾奇逊的谣言。这是我们党在历史上常用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就是官方声明。

但是，斯大林对此不了解。他说：按照国际惯例，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那是一文不值的。

斯大林还埋怨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

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这些话使毛泽东很不愉快。

毛泽东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周恩来在一旁向斯大林作了一些解释，但依然改变不了这铅一样沉重的气氛。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在他的别墅里设晚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在现场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

> 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们都未参加斯大林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也不敢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及兴味索然的沉闷气氛的缘由和经过。
>
> 为了打破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继而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全都离座起舞，而客人们仅仅观看。后来，主人们硬把恩来和我拖进舞场。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也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我们半夜三更才返回住地。
>
> 宴会上，周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举动，每一步骤总是跟着毛泽东的步伐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

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人愿。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巨人的外交，不仅把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失去的主权拿回来了，而且为新生的共和国站稳脚跟，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国际环境。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尽管中苏两国首脑的初次会见和谈判由于种种因素一度出现这样和那样的曲折，但斯大林对新中国还是怀有友好感情并愿意给予大力帮助的。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谈判，中苏双方终于于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赛福鼎、师哲。

苏联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斯大林、联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和葛罗米柯、罗申、费德林。

这一天，中苏双方都分别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

告》。

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发表演说。他说：

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友谊是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就已建立了的。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政府阻碍了我们之间进一步的合作。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建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也就使我们两国的真诚合作获得了可能。现在经过斯大林元帅与毛泽东主席的会商，这种可能已变成了真实的东西，这种友好同盟互助已在具体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了。中苏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意义，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元帅和苏联政府这种伟大的友谊表示感谢。中苏两国是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所以这种合作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近七万万人口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将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周恩来的这些话，绝不是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毛泽东回国后也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

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

宴会上，中苏两国首脑早把谈判中间的不愉快抛到九霄云外，每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大功告成后的喜悦与激动。

斯大林与毛泽东频频举杯，互相敬酒祝愿。

毛泽东不善饮酒，苏联人一个个都是海量。维辛斯基、米高扬等人在向毛泽东礼节性地敬完酒后，都纷纷转向周恩来。

在近一个月的谈判中，周恩来超群的外交才干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也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坚持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的缘由。

米高扬在向周恩来敬酒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同一天晚上，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成功并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并邀请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参加。

斯大林愉快地破例接受了邀请。他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决定接受。”

晚上9时，斯大林率苏共政治局成员来到大都会饭店。当斯大林与毛泽东握手后步入宴会厅时，掌声、欢呼声爆成一片。

许多参加宴会的来宾为了一睹两位革命领袖的风采，也顾不得礼节了，纷纷前拥，就连参加宴会的各国使节都有点坐不住了，也伸长脖子，踮起脚跟。

眼看就要把隔着里外厅的玻璃门挤坏了。周恩来急中生

智，干脆叫人把玻璃门给拆了。

酒会开始后，周恩来致祝酒辞，由费德林在一旁翻译。

周恩来致辞时没拿讲稿，2000 余字的祝酒辞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而且洋洋洒洒，激动人心，博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斯大林也起立致辞。他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所说的，也说出了我想说的意思。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像周恩来说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

宴会场面热烈非凡，始终洋溢着中苏友谊和团结的气氛。

席间，斯大林数次举杯，向毛泽东、周恩来祝酒。毛泽东、周恩来也举杯祝斯大林身体健康。宴会直至午夜，尽欢而散。

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

归途中，周恩来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把历史上的一些悬案作了一个总的解决，这只有我们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和苏联得到这样的解决。"

的确，毛泽东、周恩来以他们巨人外交的气度与智慧，使他们的这次苏联之行不仅把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失去的主权拿回来了，而且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稳脚跟，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国际环境。

1956 年 9 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曾坦率地说："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是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

这就是巨人的外交。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陈扬勇）

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

——与抗美援朝决策

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周恩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组织东北边防军，部署未雨绸缪的有力措施

由于连绵不断的长期战争的破坏，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国民经济，在新中国诞生之时更是百孔千疮，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贫困，失业众多。尽快地肃清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土匪武装，争取获得一个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来进行国家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正在这个历史转换的节骨眼上，1950 年 6 月 25 日拂晓朝鲜内战爆发。当晚，美国政府从其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立即作出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

6 月 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宣布已命令美国驻远东空军和海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并决定侵占台湾，“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这天，

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给南朝鲜以“必需的援助”。7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给入侵朝鲜的美国军队及其他15个国家的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使朝鲜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所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对于朝鲜人民来说，则成为反对外国干涉者的祖国解放战争。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联合国军”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不能不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援助邻邦朝鲜、反对外来侵略、保卫中国国家安全视为紧迫的重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立即开展坚决的外交斗争。

这时，周恩来不仅担任着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并且还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着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国家管理、外交工作、军事指挥等方面的种种难题，都摆在他的面前。

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讲话，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于远东局势的严正立场，强调：“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

这天，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作关于最近国际形势的报告，严正宣告：美国政府在朝鲜内战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只是美国整套强盗性计划中的一个问题而已”；“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杜鲁门的声明，“再一次让全世界的人民了解谁要发动战争，再一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警惕”。会后，他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以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7月6日，周恩来在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中强调：安理会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显然是非法的”。

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以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内审国情，外度大势，及时地在军事上采取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防范措施。

毛泽东、周恩来清楚地看到：虽然朝鲜人民军敢打敢拼，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汉城、仁川、水原、大田等地，并一直向洛东江三角洲攻击前进，但对方的主力并未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何况，朝鲜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对此，不可一世的美国，是绝不会轻易认输的，因此朝鲜战争很可能有反复。

为了及时掌握朝鲜战场的战况，周恩来每天都要他的军事秘书、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去西花厅汇报，有时一天要汇报三四次。据雷英夫介绍：

> 正是这时（指1950年7月5日），总理在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稿时，郑重其事地询问李克农、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和我，“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8月份能结束吗？”……我说：“总参谋部的看法和外交部一样，但还稍微谨慎一点。认为即使把伪军和登陆美军消灭了或赶下海，也不等于朝鲜战争结束，因为美国还可以用绝对优势的海空军，进行轰炸和封锁，陆军实行登陆。战争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不歼灭敌人的主力，不打得敌人实在招架不住，它是不会罢

休的。”

总理又点了点头说：“是呀，不经过反复多次的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至于持久到什么时候，是1年、2年、3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反正一两个月、一两个战役是不行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还清楚地看到：东北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我国最重要的战略区。但因为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时入关南下，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已成为全国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正规部队只有一个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第四十二军，辽阔的东北地区的全部兵力不足20万。如果不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后果难以想象。

面对极其严峻的战争形势和现状，1950年7月7日，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第一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指示，提出并初步商议了对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的设想。由于这是一项事关国家大局的行动，这次会上周恩来并没有匆忙地作出决定。

经过几天的酝酿考虑后，7月10日，周恩来继续召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最后商定了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立即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屯

兵鸭绿江畔的战略决策，认为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正确决策。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对今后维护国家领土安全与完整起重大作用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确定：

（一）抽调1950年初被定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第十三兵团及其所辖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和1个高射炮团、1个工兵团、1个坦克团、1个骑兵团等，共约26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负责保卫东北边防，并准备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任务。这些部队最迟限于8月上旬在东北地区南部完成集结。

（二）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任命邓华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参谋长曾国华调广东军区分任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7月13日，周恩来嘱军事秘书把修改后定稿的《决定(草案)》立即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核批准。当天，毛泽东批示："照此执行"。9月上旬，中央军委又将第五十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7月23日，因粟裕身患重病，萧劲光、萧华在原有工作岗位上不能脱身，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把东北边防军划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东北边防军后勤保障由东北军区统一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

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开抵东北边境，以临战态势，布防在辑安（今集安）、通化、本溪、柳河、开原、铁岭、辽阳、海城、凤城和安东（今丹东）等地，开始进行以美国军

队为假想敌的突击训练。

这时，朝鲜人民军已经从三八线向前推进了200公里至450公里，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赶到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狭长地带，解放了南朝鲜90%左右的国土。但从8月中旬起，双方军事力量在洛东江沿岸形成相持状态。美国正抓住这一时机调兵遣将，积极布置反攻，扩大侵朝战争。

8月23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听取雷英夫汇报总参谋部作战局和有关部门研究朝鲜战场情况、战争局势走向问题的汇报。雷英夫介绍，参与研究的同志经过各抒己见的争论后，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六点意见，进而得出一致判断：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下一步一定会搞登陆作战，可能性、威胁性最大的当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这是美国企图扭转朝鲜战局的一着很厉害的棋。

周恩来认为，总参谋部作战局提出的意见，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他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周恩来带雷英夫到他的住处菊香书屋再作一次汇报。

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听好汇报，叮嘱雷英夫说：“你慢慢讲，不要慌。”

在雷英夫打开朝鲜作战地图，进行详尽的汇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一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为了以防万一，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分析，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供他们参考。同时，他俩还责令总参谋部和外交部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

8月26日，根据在毛泽东处商定的计划，周恩来再次召

开有各方面领导人参加的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会上，周恩来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形势。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朝鲜问题就成了目前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的作战，证明友方原来设想“一鼓而下”，把李承晚军队和美国军队赶下海，很快解放全朝鲜，已经不可能了。友方“过去多为击溃战，歼灭战很少”。进而，他指出：根据现在情况看来，战争将趋于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消灭敌人。“将美军各个歼灭，这个任务落在我们肩上。”“这就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的准备，一出手就胜。因此，在我们未准备好之时，不要过早地惊动敌人，使敌人警觉。”他分析道：根据美国自身存在的重要弱点，它要在“目前发动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企图是不断由一个一个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在我们方面，就要将其发动的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使其不能发展为大规模战争。这样对我们有利，对世界和平阵营有利。”

周恩来强调：我们必须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否则，万一形势恶化，就会措手不及，陷于被动。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各军兵种都要有一个三年建设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也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

8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东北边防建设计划会议。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36个师），共70万人作三线配置，第十三兵团、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为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从第四野战军中抽调10万老兵，准备在参战后补充到第一线部队。

以上措施，为以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证明是富有远见的，并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联合国军”大举北犯。周恩来发出不能置之不理的严正警告。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却置若罔闻。毛泽东当机立断，发布出兵抗美援朝的命令

9月15日凌晨6时，毛泽东、周恩来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7万余美国军队，在近500架飞机、260余艘舰艇的配合下，实施仁川港登陆计划。

9月27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指令，授权他在朝鲜“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摧毁北朝鲜军队，占领整个朝鲜。28日“联合国军”攻占汉城，30日推进到“三八线”附近。

这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经明显地感觉到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侵袭中国的企图。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

> 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是坚决而勇敢的。他们在金日成首相领导之下抵抗美国侵略者，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今后朝鲜人民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下，必能克服许多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

周恩来向美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但10月1日，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的麦克阿瑟，指挥打头阵的南朝鲜军队还是越过了"三八线"。这一天和10月3日，金日成首相两次请求中国人民给朝鲜人民以特别的援助，即在对方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

朝鲜危在旦夕，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时此刻，中共中央面临着出不出兵的重大战略抉择。

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①]中表明了中国的鲜明立场，指出：中国"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大使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他指出：

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

① 这个电报后来因故未发出。

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

……

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

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很快就经印度新德里传到美国华盛顿白宫。但是，美国却一意孤行，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力量放在眼里，认为新中国建国刚刚一年，各方面困难重重，军队装备差，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而已，结果导致了美国军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是美国建国160多年来在对外战争中的第一次败仗。

的确，这时新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弱，要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较量，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举足轻重的事情。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下，中国到底出不出兵、何时出兵、出多少兵、出兵后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等等，这都是不能不反复斟酌、权衡得失利弊后才能下定决心的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10月5日，毛泽东在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抗美援朝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中央委员有邓小平、林彪、罗荣桓、饶

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要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力主出兵援朝，但也有一部分人不主张甚至反对出兵援朝，林彪就是其中的一个。30 多年后，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 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毛泽东最初决定林彪担任志愿军统帅呢？

一是这次所抽调的部队都是原东北野战军的，林彪对这些部队的情况很熟悉，便于指挥。

二是林彪在东北工作时，经常和苏联、朝鲜方面人士打交道，这对战时协调三方关系十分有利。

三是在 4 个野战军领导人中，他年纪最轻，只有 44 岁，而且以多谋善断、能打恶仗和硬仗闻名于世，在党内军内都有很大的威望，最受毛泽东的喜欢。毛泽东曾经称赞说：林彪打仗又狠又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不同意出兵的意见，毛泽东发言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危难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无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成为一个拍板的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正式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在林彪拒绝挂帅出征后，从德、威、才、资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选定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

10月6日，周恩来主持最高军事会议，同陈云和中央军委其他负责人彭德怀、林彪、高岗、罗荣桓、聂荣臻等进一步商量入朝作战的诸项重大事宜。

会上，林彪仍然不赞成出兵。他说：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却很难说。美国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美国军队逼急了，它扔两颗原子弹或用飞机对我军大规模狂轰滥炸，将够我们受的。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他还说：如果一定要出兵，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周恩来接过话题，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心已定。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以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最后，会议议定由周恩来、林彪赴莫斯科商洽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援助中国武器装备问题。

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这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面对进一步恶化的朝鲜形势，8日，毛泽东当机立断，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命令。在命令中，毛泽东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随后，毛泽东又致电金日成，将以上决定告诉他，并请“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提出希望苏联在中国出兵援朝时提供空中掩护，同时要求援助中国所需的军事装备

在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的同时，彭德怀赴沈阳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一职，并在当天下午同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人高岗、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开会，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问题。

如何做到师出有名？这是毛泽东、周恩来颇费踌躇的事情。他们认为，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这就表明我们同美国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宣战，而是人民自愿帮助朝鲜人民的，这纯属民间的事情。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先例，3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对此，美国政府抓不住任何把柄，只能哑巴吃黄连。

也正是在10月8日这一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偕林彪、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前往苏联，同斯大林等党政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

1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

11日上午，周恩来、林彪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的陪同下，飞抵克里米亚，同在这里休养

的斯大林和赶来此地的其他苏联党政领导人会谈。

在整整一天的会谈中，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说明中国出兵后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提出希望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强调只要苏联提供空中掩护，中国就一定出兵援朝。

莫洛托夫表示，苏联可以出动空军支援。

斯大林则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随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情况。

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到朝鲜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既使周恩来感到意外，也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料未及的。

收到斯大林、周恩来的联名电后，10月12日晚8时，毛泽东立即去电召回彭德怀、高岗。

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最新情况，对出兵不出兵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认真讨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掩护，在“联合国军”大举北进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也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出兵援朝。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的来电。毛泽东要他将电文内容转告苏联领导人。电文指出：

“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

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对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能否采用租借办法和两个半月内苏联能否出动志愿空军没有把握，但这两件事又至关紧要。因而，他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继续“留在莫斯科几天”，同斯大林商议并确定：（一）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究竟“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使中国政府明年能够“保持20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二）“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空袭，只是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受一些损失。”

这天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的来电内容，要他立即转告斯大林。

10月14日，在得到苏联政府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和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进入朝鲜境内掩护志愿军的肯定答复后，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8个问题请求给予明确答复。其中有：

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

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作战？

苏联政府派志愿空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中国近海各大城市？

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周恩来还随电附去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附属器材的订货单。

这一天，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本日3时和21时半的两份来电。前电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双方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计划，指出：志愿军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的到来，然后再打”。后电通报了志愿军的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情况，指出“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告以彭德怀将于“15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后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

周恩来迅速将两电内容通知了斯大林。

鉴于“联合国军”北进甚速，平壤危在旦夕，15日15时，毛泽东随机应变，改变了本日1时作出的“志愿军决于10月18日至迟19日渡江”的命令，致电彭德怀、高岗：“我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18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

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出兵的坚定立场和一定要苏联出动空军的坚决态度，在极为关键的时刻，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战略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马上改变主意，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

联现决定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斯大林自食其言，推翻了自己所作的承诺。直到中朝两国军队把“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后，斯大林才于1951年3月3日致电毛泽东，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得到斯大林改变原有主意的消息后，毛泽东眉头紧蹙，陷入久久的沉思中：友好的兄弟国家之间，怎能出尔反尔，怎能置在严肃场合下达成的协议于不顾呢？然而事已至此，毛泽东又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

10月17日17时，毛泽东再次急电原拟18日赶赴朝鲜的彭德怀和高岗，告以志愿军先头两个军的出动时间由17日、18日推迟“于19日出动”，彭德怀、高岗请于18日火速返京。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会上，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的情况。考虑到斯大林最后虽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入朝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入朝作战。

在以后的20多年间，周恩来曾多次谈到这次会谈的有关情况。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会见金日成首相时有一段对话：

> 毛泽东：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

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持，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1971年12月30日，周恩来同在京爱国高层人士谈话时回忆说：

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不派飞机，我们还是出兵。

10月19日黄昏，在朦胧夜色的掩护下，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等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揭开了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熊华源）

为新中国绘制经济发展蓝图

——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周恩来和陈云领导勾画中国有史以来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建设蓝图，并致信毛泽东等："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

5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在重重困难中正朝着预期目标迅速地恢复着。为了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强调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间，从当时算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个方面加紧进行工作，同时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了编制好"一五"计划，周恩来提议并在这年2月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成员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和宋劭文。

鉴于1951年7月以来朝鲜战场战争形势出现新的转机，

战争一时不可能结束但也不可能逆转。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52年5月作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决策。

这样，周恩来、陈云领导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方案。到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为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勾画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宏伟的建设蓝图——《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据参加“一五”计划编制的宋劭文介绍：

>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由于我国还没有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的经验，有必要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还需要同苏联政府商定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7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从朝鲜前线回国治病并已痊愈的彭德怀留下来接替自

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7月10日，他又就自己近期的工作安排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信中写道：

对朝鲜停战谈判及反细菌斗争，除过问日常工作外，当令章汉夫接替这两项工作……

外交使节会议已开过一月，现他们在各地参观，待他们在月中回来，我当参加总结，并向中央汇报。

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即使周、陈不在，仍能按期开会。

……

维汉同志已商好自7月12日起休假，政务院日常工作只能由齐燕铭处理。这是有若干困难的。如能于7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商好，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8月份来京主持一个时期（政务院工作），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三反、五反已过，未了事项请子文、一波同志分别主持。量刑之事，将由景范同志主办。

中央一级总党委第一书记，我可不再挂名，提议即以安（子文）为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萧华为第三书记。

上述事项请主席批准，并予传阅。

当天，毛泽东批示同意。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可以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在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了。

正在节骨眼上，负责全盘经济工作的陈云却病倒了。为了使陈云能按原定计划一同出访，7月19日，周恩来批准陈云到北戴河休息两个星期，出国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由他自己负责。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终于完稿。同时，他还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个文件分析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情况，提出了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指导方针和主要经济指标。

《任务（草案）》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8月13日下午，周恩来同匆忙从重庆赶到北京就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谈话，向他交待了政务院的工作。随后，他在第148次政务会议上郑重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斯大林高兴地说：中国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但"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计划公布与否，"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

"一五"计划基本框架出来后，8月15日，周恩来率领

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三架中苏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北京，途经苏联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前往莫斯科。

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目的地。代表团阵营庞大，共65人，包括了各部门、各行业主要负责人。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

这次出访活动，是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的一次最重要谈判，为新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机场，周恩来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的热烈欢迎，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兴奋地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到莫斯科后，周恩来把代表团成员集中起来，将准备提交

苏联政府讨论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又逐段逐句地重新讨论修改了一遍。宋劭文在《周总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章中谈到上述情况时，感慨地说：

> 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开始进入鼎盛时期。中国坚决地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并取得辉煌胜利，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走所谓"民族主义道路"的最后疑虑，他对中国代表团的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三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会谈。

8月2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简述了中国代表团将同苏联商谈的有关问题，接着介绍了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静静地听着周恩来的介绍，并不时地投以信任的目光。

随后，斯大林发表意见，表示同意毛泽东对朝鲜战局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在停战谈判中所应采取的方针；还表示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最后，斯大林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8月23日、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

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经双方约定，9月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与“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军队整编等情况。接着，他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设想。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他面带微笑地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接着，他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意见，指出：“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

到15%”，“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斯大林在问明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的情况后，说：“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

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同时，他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斯大林的以上表示，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周恩来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伟大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说：你们的革命成功后，我们援助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根据同斯大林会谈所获得的实际进展，9月6日，周恩来两次致信莫洛托夫。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中国在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从苏联进口装备、普通货物和非贸易支出所要支付的外汇，同中国对苏联出口和非贸易收入二者之间，将出现46亿多卢布的逆差，因而需要请苏联政府给予中国贷款。

在第二封信中，他提请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技术资料，以帮助中国提高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准。

同时，周恩来还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订货单、委托苏联帮助设计的建设项目名单、聘请各类苏联专家名单等文件资料送交苏联方面。

接着，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面对面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他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可以有更多时间考虑并同代表团各组分别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

9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斯大林格勒参观。

为什么去这里参观呢？据担任此次出访的首席翻译师哲介绍，此行目的是：

> 一是慰问这个英雄城市的居民，他们在卫国战争中蒙受的损失和灾难也较大，但是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对扭转整个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史诗般的壮丽；二是为了了解当年在这个地区所进行的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最猛烈而具有关键性的战役的实际情况；三是就地实际调查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在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师哲深怀钦佩之情地说：

>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周恩来同志虚心好学的精神和善于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情况的好作风。他把参观访问当成一个学习和钻研问题的机会，把游艇变成

学习的场所。周总理向陪同参观的当地州、市委负责人详细询问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详细经过、战后城市恢复工作的进展情况，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在参观拖拉机厂时，周总理对这个厂的重建、扩建和生产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

9月15日，周恩来出席《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议》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在会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致词：

30多年前，中国人民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启发，认识了民族革命的真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经过3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全国解放的胜利。反动统治阶级被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被赶走了，中国人民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3年中国人民对外抵抗了美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对内实行了土地改革，恢复并发展了工农业生产，镇压了反革命，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的这些胜利，这些成就，是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政府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亲切关怀和伟大援助分不开的，也是与世界进步人类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深切的友谊和援助。这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和指导之下，使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成就。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周恩来面带微笑，注视着斯大林，激动地说：

我现在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获得新成就庆贺，请大家为中国人民最好的导师和朋友，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

面带喜悦神情的斯大林，在周恩来话音一停就站了起来，向周恩来点头致意。

这之前，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说：你们的革命成功后，我们援助你们是我们的责任。只能说你们的运气好，假使你们的革命先成功，我们也会向你们求援的。我应当感谢你们在朝鲜作战和提供橡胶两件事情上对苏联的援助。

9月19日，周恩来第三次同斯大林会谈，双方就朝鲜停战谈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苏友好交往、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在中国代表团各组的工作大致走上正轨后，周恩来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进行谈判。9月24日晚6时，周恩来、陈云、粟裕一行17人返回北京。随后，他和陈云赶往中南海颐年堂，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这次苏联之行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周恩来回国后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并参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改与最后审定

回国后，周恩来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每当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打电报向国内请

示时，周恩来总是及时审阅这些电报，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定后，及时地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随后，周恩来准备了《中共代表团赴苏提纲》，说明："代表团的任务——专诚吊唁，表达中国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深切悲痛"；同时和苏共领导人讨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

3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当晚8时，他在沉重的哀乐声中，率领中国代表团和大使馆工作人员步入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瞻仰遗容，在灵前献花圈，并带领大家列队向斯大林遗体鞠躬再鞠躬……

3月9日中午，周恩来率领中国吊唁代表团参加在红场上举行的追悼大会和葬礼。

在斯大林治丧期间，周恩来用一天多时间听取李富春等关于同苏方就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商谈情况的汇报；接着，同苏联新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抗美援朝、国防建设等问题交换意见；还出席了《关于苏联帮助中国扩大现有电力站和建设新电力站》等文件的签字仪式。从苏联回国时，他带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农业生产、交通、劳动力安排等问题和李富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报告等四个文件。回国后，他又将4个文件整理后，分送有关领导人征求意见。

4月8日，周恩来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的宋劭文，详细询问了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周恩来颇为不解地问："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宋劭文回答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

听了宋劭文的解释，周恩来明白了原由，赞同地说："是啊！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使周恩来对整体情况有更清楚的了解，宋劭文还将中国代表团绘制的七八张中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周恩来。从曲线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受援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情况。周恩来饶有兴味地仔细审看了这些曲线图，感到很满意。

4月30日，周恩来起草复李富春电：

> 我们同意你在来电(指李富春25日的来电)和来信中所提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议定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议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8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即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

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再次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15个项目。这样，“一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总共156个重点项目，简称为156项。

自此，历时8个多月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援助新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会谈，获得圆满成功。

这以后，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国家计委继续进行着“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并在1954年9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这样，“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尾期。

1954年1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来到虽是初冬时节但却温暖如春的广州。在这里，他们审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同时，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7月6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精心绘制的第一幅建设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全国人大会议正式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制定过程中的几个草案相比较，有一些重要的修改，主要有：根据国力的实际可能，将原来确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修改为

“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在实际上是适当放慢了工业化的进程，防止了急于求成思想倾向的发生，有效地保证了国家建设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由此对若干重大指标进行了调整，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由20.4%、7%调整为14.7%、4.3%，五年基本建设投资由500亿元削减为427亿元；同时，对全国工业布局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克服了工业建设过分偏重沿海而忽视内地的倾向，从而促进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相互推动和协调发展。

11月9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命令，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随令下达，指示各地“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一五”计划的规模是空前的，这期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总支出为766.4亿元，相当于7亿两黄金，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实施，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崭新篇章。

由于“一五”计划是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和速度的基础上的，因此，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一五”时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些成就，为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的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却是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用事实证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宣传的“中国一五计划一定要失败”的预言的破产。

（熊华源）

建国后第一次党内重大斗争

——与高饶事件

由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产生贪多冒进的偏向，财政出现赤字。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

从1953年1月1日开始，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

这天，《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宣布："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社论还强调：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侵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

在这一年到来的前夜，即在1952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

卫生工作会议和几个专业会议上作报告时，冷静地分析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他说：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的恢复工作完成了。不论从经济工作或从其他方面看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恢复工作，不论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的生产和业务所达到的水平，一般都超过了抗战以前最高年份的水平，只有极少数的还需要继续努力。这种恢复，就给了我们一种条件，使我们可以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又进行国家的建设。但是，我们祖国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我们的工业技术很低，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

根据这些分析，周恩来对怎样进行建设工作提出了既“要注重重点”、又“要注意质量”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强调：目前国家建设不是百废俱兴。我们要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树立整体、重点、先后和全面的观念。

但由于经验不足，1953 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产生贪多冒进的偏向，财政出现了 21.5 万亿元（指旧人民币）的赤字。

为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 6 月召开一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

因为陈云正在病中，6 月 9 日，周恩来同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商议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

《请示报告》中规定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应贯彻批评自我批评和积极建设的精神，充分听取各地同志对过去工作的批评，并要求他们对今后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同时应向到会人

员着重讲清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及目前财政的全貌，促之能够对全局有所了解，便于考虑各项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请示报告》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五”计划、财政和资产阶级等三个问题；“总的会期争取半个月结束”；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邓小平。

6月12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的预备会议上又说明了会议的方针：

> 此次会议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意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条条块块的讨论，吸取大家积极性、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

周恩来还说：“大家觉得这一次召开这样大的会议，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因此，这个会议的时间应该开得长一点；大家来的时候都作了交代，准备过了党的生日再回去。我们接受大家的意见，准备把会开得长一点。但是必须说清楚，在这个会上，经过讨论，把成熟的问题肯定下来，不成熟的问题继续加以研究，我们不能希望经过一次会议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从周恩来讲话的语气中不难看出，他所说的“开得长一点”，只是指不能像《请示报告》中所说“争取半个月结束”，而要“准备过了党的生日（7月1日）再回去”。

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和“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提法。高岗借机大肆从事阴谋活动，掀起一股气势汹汹的“倒刘、倒周”的地下暗流

但是出人意料，会议到8月13日才结束，足足开了两个月。原因是高岗在这次全国财经会议上大肆从事阴谋活动，掀起了一股气势汹汹的“倒刘、倒周”的地下暗流。

高岗急于发难，原因何在？这是同毛泽东在1953年1月和6月批评政务院颁布的“新税制”和刘少奇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提法后，他对党内政治生活局势作出错误判断有直接关系。

“新税制”是怎么一回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务院在1950年初曾颁布《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当时的税收制度是在旧税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难免残留旧税制对经济的某些消极作用，主要是各税重复，零星分散，手续繁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组，这种消极作用日益显露出来。因此，修正税制提到了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上。

1952年12月31日，中财委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即“新税制”），于1953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新税制”规定：“应税货物，一律按国营公司批发牌价核税；加工、订货、包销者同。”这就是说，不分公营、私营，一律平

等纳税。

“新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波动，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预料到的物价上涨和思想混乱。1月15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给自己和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的信。毛泽东在信中严厉批评道：“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地而已，究竟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激烈反对是事出有因的。当时毛泽东正在关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准备尽快从制度上、阶级上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他看来，实行“新税制”的举动同他的考虑是完全不一致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财政问题的会上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还说：“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显然过重了，而且很多是出于误会。这是他几个月后就认识到的："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毛泽东当时对财政部的批评和对新税制的指责态度，却被高岗充分利用了。

各大区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新税制"也颇为不满。

根据毛泽东的批评意见，3月10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今后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同时，《决定（草案）》规定：把国务院20个工业部中的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实际与政务院平行的国家计委（人称"经济内阁"）领导，而高岗是国家计委主席，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

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又是怎么一回事？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批评道：有人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一）"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是不妥当的。（三）"确保私有财产"，是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个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高岗断定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已经不信任了。在饶漱石的配合下，指桑骂槐，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刘少奇被批评过的观点，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

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评“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

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利令智昏的高岗联系到毛泽东对“新税制”和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提法的批评，联系到毛泽东在1952年底提出关于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联系到党中央正在考虑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的领导岗位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错误估计自己的力量，断定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已经不信任了，由他取而代之，是呼之欲出的事情，使其进京后便已生成的野心更加膨胀。于是，他乘机火上浇油，鼓动与会者“放炮”，上纲说“新税制”是“路线错误”，是“两条路线斗争”。

7月13日，在扩大的第十五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由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与会者甚众，有131人。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开了已整整一个月，重点是财政问题。”“过去财经会议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自下而上地集中在方针、政策、制度上，在思想、组织、作风上进行全面的检查。缺点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对人是要治病救人，对事是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

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是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

会上，薄一波作了检查。他说：“过去财经工作中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的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1952 年 12 月公布的修正税制，由于从单纯财政观点（保税）出发，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也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分散主义的错误。”

这样从 7 月 14 日到 25 日，在全国财经会议连续召开八次扩大领导小组会议上，各方面的批评都集中在中财委和薄一波身上，使薄一波成为“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愈发紧张。

据陶铸后来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同志没有答应。

不仅如此，高岗还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特别是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时鼓吹他自己。

据杨尚昆 1997 年回忆：

> 高岗利用各地区一些同志对新税制的不满和中央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的机会，在饶漱石配合下，“指桑骂槐”，气焰嚣张。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少奇同志的前述观点，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他还在会内会外

散布有所谓“圈圈”、“摊摊”，制造混乱。批判中他无限上纲，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给薄一波大扣帽子，什么“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还煽动别人跟着批，逼迫薄一波一再作检讨，把财经会开成斗争会，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

7月25日，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扩大的第二十四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言，把修订税制的错误承担起来。接着，薄一波在8月1日会上继续作检讨。但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薄一波仍然没能过关。

这时，薄一波已经意识到高岗、饶漱石的这一险恶企图：“高、饶绝不仅仅是攻击我本人，而是进而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薄一波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句话。当会议要薄一波作第三次检讨时，遭到他的拒绝。

周恩来把薄一波的态度报告了毛泽东。对会议出现的异常情况已有觉察的毛泽东回答道：“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周恩来向北戴河“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京参加会议。他们指出：一波同志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这样会议气氛缓和下来。周恩来作总结报告，宣告会议结束

为了扭转会上这种很不正常的状况，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打

电话到北戴河“搬兵”的指示，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参加会议。

从外地赶回北京的陈云、邓小平，在会上都作了正面的引导性发言。8月6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中心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邓小平也讲了公道话，指出：一波同志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这样会议气氛缓和下来，为会议的结束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当时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更谈不上被揭露。

8月11日晚，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报告。这个报告是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过的。结论报告阐释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原因，指出：“目前我们经济的发展，也正是循着党的总路线的轨道前进的。就在财政、金融、贸易系统方面，从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总的方面来看，现在基本上也是执行着党的总路线的。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某些主要工作中的某些部分，或某些工作，或某些地方的工作，就没有离开过党的总路线而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税收、商业等工作中这半年多所犯的某些错误，就是严重地违反了二中全会在这些方

面所规定的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强调：但是“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宣告结束。

几个月后的1954年3月，周恩来回忆说：

那时财经会议的领导是中央，发动这个斗争是毛主席点的头，因为认为应该检讨资产阶级思想，要宣传总路线。可是在高岗那里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另外有一个司令部，是高岗建立的，登门朝拜的也不少，他的影响超过了中央的影响。当然，大家也认为他是领导工作，要跟他谈谈嘛，他也招揽。从那时起，他的野心一天天地暴露，最后爆发了。

90年代后期，高饶事件的亲历者杨尚昆也回忆说：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找邓小平、陈云。在邓面前，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小平同志看穿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向高指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能轻易更动。”

“高岗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主席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提出‘你一个，我一个’。”

邓小平、陈云关于高岗、饶漱石秘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汇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高岗自杀未遂，周恩来提出紧急处置办法

1953年九十月间，高岗、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开展了对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的批判。

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上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的事态，暴露出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岗、饶漱石正在党内秘密进行分裂活动。

高岗、饶漱石这些秘密的分裂党的活动，由陈云、邓小平发现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此之前，党中央虽然发现了他们的一些不正当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重，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他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

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这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站出来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

这样一试，果然使高岗的阴谋露了底。于是，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他们提出了严重警告和批评，强调他们是在“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

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他还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这以后，党中央坚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问题。

1954年1月25日和2月5日，周恩来会同刘少奇、邓小平两次找高岗谈话，对其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2月3日，周恩来会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同饶漱石谈话，点出他同高岗的问题。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上，周恩来发言说：

> 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指刘少奇和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面对全党高级干部，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了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

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威信的意见的酝酿和交换。”“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今后，“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周恩来在会上还告诫犯错误的同志说：为了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党“不仅能够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学习，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第三，应该努力反省。”“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七届四中全会没有匆忙对高岗和饶漱石作组织结论。此后，全党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篡权的斗争还在继续。党中央为了查证高岗、饶漱石种种反党活动的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

育和挽救，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

2月15至25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岗、饶漱石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他们自己的申辩和检讨。

16日，周恩来受刘少奇委托，在会上转告刘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揭露了高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有关事实。

17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当晚，周恩来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25日，周恩来综合43人的发言和他们揭发的材料说："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

接着，周恩来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归纳为：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

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

周恩来在发言中还分析了高岗走上反党道路的根源，总结了全党同志应该吸取的严重教训。

3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决定下发《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领导干部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周恩来亲赴沈阳作传达报告。不思悔改的高岗再次自杀，服用安眠药身亡。周恩来带病出席全国党代表会议主席团会议，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的罪行

两个座谈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写书面检查；在三四月间分别召开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高级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

3月26日、27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亲赴沈阳，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

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8月17日，不思悔改的高岗再次自杀，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身亡。8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和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情况，向中共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进行传达，对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作适当的通知。

在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的基础上，1955年初党中央决定在3月下旬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从这以后，周恩来开始准备将以他的名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3月5日，他还同有关人员讨论修改了这个报告的第三次修正稿。一周后，他因做阑尾炎手术，中共中央决定改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这个报告。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30日，周恩来带病出席主席团会议，听取会议各小组正副组长的汇报。31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从事反党分裂活动的罪行，指出：在全国革命胜利后，高岗、饶漱石“不敢公开地进行反中央、分裂党的活动，而是采取阴谋的方法结成秘密的宗派”，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次会议是一次最好的整风会议，“我们应该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贯彻到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所在，是要反对骄傲和自满。“这一点，对于一个胜利了的党、执政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更应当引起警惕。”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全党与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熊华源）

风云叱咤日内瓦

——与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提出《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

1954年初，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德国西柏林和东柏林交替举行会议。经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艰辛努力，终于达成一致协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除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五大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分别参加会议讨论。

为什么要召开这么一次会议呢？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主动行动陆续从朝鲜撤退军队，然而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继续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法国军队也还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战争。这两个地区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焦点之一。

由于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上的坚决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的进一步开展和世界范围内准

备战争的力量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正处在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上，迫于国家的自身利益，法、美两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这两个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没有中国的参加，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正如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在一项声明中所宣告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这次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一起讨论解决亚洲最迫切的两个问题的会议，实质上是一次五大国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清楚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从2月底到3月，周恩来挤出相当多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

在2月27日的筹备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前景作出明确判断，并且强调：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拉法打美”。宣传中，我们批评的目标应对准美国，而给法国以希望。周恩来一席话，给准备工作指明了方向，也解除了部分人心中的困惑和疑虑。

有趣的是，也是在这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专门讨论美国政府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事宜。当然，他参加会议的目的，却是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议。

3月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出了精心准备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提出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强调：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

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同时，周恩来在《初步意见》中还提出了“相机提出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的设想。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这个《初步意见》。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往返苏联、中国之间，同兄弟国家领导人多方协商出席日内瓦会议大政方针问题

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为了使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四个兄弟国家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3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同朝鲜南日外相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取得一致意见。随即，周恩来致电胡志明主席和越劳中央，告诉日内瓦会议的开会日期。

周恩来比胡志明小8岁，他俩在32年前相识于欧洲名城巴黎。那时，周恩来是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胡志明作

为法国共产党的一员，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有着广泛的联系。周恩来在革命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干、非凡气度和高尚品格，引起了胡志明的注意。1921 年的一天，经胡志明主动邀请，他俩在塞纳河畔的巴黎地铁入口处相识了，从此结下互以兄弟相称的深厚情谊。

鉴于和谈对于越南今后的局势发展关系很大，周恩来在电文中也邀请胡志明 3 月底或 4 月初来北京一谈，并一同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3 月底，胡志明抵达北京。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4 月 1 日，周恩来偕少数工作人员启程飞莫斯科。随即，他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在四国范围内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

周恩来打招呼：尽管我们过去“跟美国人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现在，我们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

4 月 19 日，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三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整个代表团由中央党政军机关 45 个单位的 180 余名工作人员组成。周恩来还特意指示成立了代表团党支部。

4 月 20 日清晨 5 时，周恩来率领人数众多的中国代表团，乘坐苏联专机，取道苏联飞往日内瓦。行前，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国

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打招呼”会议。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

“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人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的，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只有“我们自己一个板眼，愿意高也可以，愿意低也可以”，“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在朝鲜停战谈判时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到日内瓦参加的“就是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又是一个大国，你总要要唱一点文戏吧，文中也有武戏，但总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好几个兄弟国家，都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这回是有板眼的正规戏，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4月21日下午，周恩来飞抵莫斯科。4月23日，周恩来偕王稼祥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胡志明商谈越南问题。

4月24日，周恩来一行飞抵日内瓦宽特兰机场。周恩来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黑色长大衣。当他健步走下飞机时，人们的注意力立即聚焦到这位传奇式人物身上。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抢拍照片。

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的着装差不多一个样，队伍整齐威武，以致外国新闻媒介形容为“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亮相国际舞台。

相继到达日内瓦的，还有这时在国际舞台上风云一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

从此，周恩来成为西方新闻报道的一位中心人物。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复杂的心情，拭目以待，冷眼旁观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在世界舞台上如何表现。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和秘书长王炳南等人，也都成为西方记者争相追逐、获取新闻的风云人物。

日内瓦不但是享有“旅游者的圣地”之美称的世界名城，它还是一座享有“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医院”、“世界会议之都”美誉的国际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国际联盟在这里成立，并建造了著名的“万国宫”——国联大厦。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就将在国联大厦举行。

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面对久经磨练、身手不凡的各国记者，显示出了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风度。他向人们挥手致意，并镇定沉着地在机场散发了热切期望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声明。

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随即广为散发了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简历有1800字左右，从一开始便称：

> 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个简历，是新中国在对外宣传中，第一次公开的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简历。它是由李克农主持起草的，是在没经过周恩来之手的情况下，径直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

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乘坐苏联方面准备的几辆黑色“吉斯”车，到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万花岭别墅”住地。中国代表团多数工作人员则住在城内玻利瓦什旅馆和瑞希蒙特旅馆。

“万花岭别墅”是一栋乳白色的多角形欧式三层楼房，房子不大，房间不多。一楼正屋为会客室、办公室、会议室和几间卧室，餐厅在一楼的一侧；二楼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等代表团领导人的住房；三楼住的是机要人员。别墅的四周是繁花似锦的花园、郁郁葱葱的葡萄园和绿草茵茵的大草坪，还有枝叶茂盛的各种树木，显得恬静宜人。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拉马丁曾经在此居住过。由于别墅门前的一条小路叫“花山”，人们因此也常把它叫做“花山别墅”。在别墅大楼的上空，高高地飘扬着鲜艳夺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使这秀丽无比的风景更增添了绚丽光彩。

当周恩来第一次走向国际讲坛时，犹如千斤重担压在身上，他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声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万国宫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除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大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外，还有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

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总共19个国家。

会前，有许多与会代表十分担心，如果这次会议仍然像柏林会议那样由五大国轮流担任主席，那么就会在中国担任主席的问题上形成僵局。经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会前的充分协商，大家达成一项协议：在讨论恢复朝鲜统一问题时，会议主席由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莫洛托夫和艾登依次轮流担任；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时，会议主席由莫洛托夫和艾登担任。

4月27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这是缓和远东乃至国际紧张局势的热点问题。南日外务相在发言中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

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伙同南朝鲜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采取了想方设法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

4月28日，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首次发言。他神情庄重，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台，但心里并不轻松。正如70天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时所说："到一个新的场合"，"我也很紧张"，"我的心也在跳"；"跟多少国家在一起，我没有搞过"，"万一说错一句话就不好办"。

周恩来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来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的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中国代表团"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们都为着实现这一任务做出真诚的努力"。

他义正词严地驳斥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无理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三项建议，郑重地指出：

>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于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的和平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关心维护远东和平的相应的国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证不妨碍朝鲜的和平发展，不容许外国干涉朝鲜的内政。
>
> 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
> 刚才杜勒斯先生在这里的发言，是同这些要求相反的，他的主张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周恩来的发言小试锋芒，言简意赅，表达了新中国政府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令西方16国代表刮目相看。会场不时传来阵阵窃窃私语声。

这些话击中了杜勒斯的要害。部分西方国家的代表，也觉得周恩来是带着真心诚意来解决亚洲的迫切问题的，关注本次会议的西方新闻媒体也给予了普遍好评。

杜勒斯大概是觉得他碰到了周恩来，是碰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同时也根本不想通过这次会议解决问题，所以，他在5月3日就离开日内瓦回美国去了。但是，他却给美国代表团留下了一道禁令：不准和中国代表握手，不准和中国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

杜勒斯的这一做法，在美国的外交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笑柄，以致若干年后许多美国政界和外交界人士还引以为憾、引以为戒。1971 年 7 月，美国总统特别代表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还对“杜勒斯禁令”记忆犹新，特别注意到握手的礼节。

尼克松也是如此。1972 年 2 月，当尼克松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后，他特意吩咐包括基辛格在内的所有随行人员均留在飞机上，以便让他和前来迎接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握手。这样，就可避免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在电视镜头中突出他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感叹道：“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他们的握手，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周恩来提出一个“两句话的协议”，在人们心中掀起一阵波澜。朋友和敌人都交口称赞：周恩来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为推动会议的新进展，5 月 22 日，周恩来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言。6 月 5 日，南日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 4 月 27 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 5 月 22 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发言。

紧接南日的发言，周恩来指出：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

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

周恩来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达成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莫洛托夫不遗余力，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与五点建议。

但由于美国和南朝鲜代表设置重重障碍，拒绝了朝鲜、中国和苏联为达成一致协议而做的一切努力，致使本次会议仍未取得进展。尽管如此，由于周恩来同南日和莫洛托夫的默契配合，还是使论战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陷于被动、尴尬的处境之中。

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在会上的不凡表现，赢得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和新闻舆论的好评与称赞。

6月5日以后，美国代表加快了使朝鲜问题会议无结果而散的步伐。据艾登在回忆录中透露：“比德耳·史密斯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来电拿给我看，其中指示他尽一切力量，使会议尽快结束，理由是共产党人只是故意拖延时间，以符合他们自己的军事目的。”

针对以上情况，为争取会议达成某种协议而做最后努力，6月14日，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一致认为：我方“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应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

6月15日下午，南日、周恩来、莫洛托夫相继在全体会

议上发言，发起了又一场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攻势。南日在强调如果“不能在举行选举以统一朝鲜的问题上取得谅解”，也应“首先在维护朝鲜和平问题上取得谅解”，并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关于保卫朝鲜的和平状态》的6项新建议。

周恩来立即附议，强调这6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与会各国没有理由不在“6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他明确指出：“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阻挠政策，是本会议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基本原因”。

会上，“令人望而生畏”的莫洛托夫提议与会19国共同发表《关于朝鲜的宣言》，以此保证“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

三国代表所提的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部署，引起了美国等国代表的一阵恐慌。会场出现短暂的奇异的沉寂。在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的授意下，菲律宾代表提议休息，并得到会议主席艾登的批准。

在长达40分钟的休息中，以美国为首的16国召开了紧张的对策会议。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统一口径后，美国代表史密斯抢先发言，带头反对南日、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的三个建议。紧随其后，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南朝鲜代表发言附和。

在一阵开台锣鼓之后，由泰国代表开始宣读《16国共同宣言》。《宣言》声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企图强行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代表的发言，两道浓眉下闪闪发光的一对智慧的大眼在不停地转动着，留意着每个发言人的神态和语气。

会场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

这时，场外的警卫部队指挥车扩音器响了：“注意！注意！

马上散会了，把车开过来。”

在会议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莫洛托夫、周恩来和南日轮番发言，揭露对方不可告人的企图。

莫洛托夫首先发言说：“16个在朝鲜进行了三年战争的国家没有能够对我们已经提出的建议提出反建议”。“《十六国宣言》不是有助于朝鲜的统一的，也不是有助于加强朝鲜的和平发展的。”对方应负使会议破裂的责任。我们相信，朝、中、苏三国代表的建议，“将使朝鲜人民感到巨大的兴趣”。“我们将继续为朝鲜人民的利益”，“为全世界和平的利益而努力”。

周恩来则以斩钉截铁的语调说：中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经过泰国代表所宣读的《十六国宣言》的态度和立场”。“《十六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接着，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和智慧，一鼓作气地提出中国代表团建议通过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这就是：“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周恩来大声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了，那么我们不能不对这一事实表示最大的遗憾。”

周恩来善辩而不失分寸的话语，在人们心中掀起一阵波澜，又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人们的心。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

实在令人陶醉。

顷刻之间，会场泛起短暂的骚动和小小的说话声，迅即恢复肃静。会场气氛发生陡然变化。美国代表史密斯犹如五雷轰顶，惶恐不安。

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幡然改变自己的主意，起而响应，解释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的其他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听到斯巴克的这番出自内心的自我表白，周恩来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既定方针，接过话题，以尊重和协商的口吻说："如果《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末，《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19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我必须说，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的"。

有尊重便有回报。这时，斯巴克也坦诚地以更加确定的简洁语言说："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面对斯巴克"胳膊肘向外拐"的发言，内外交困的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又不便在会上发作，只好干瞪着眼看着斯巴克。

这时，南朝鲜代表卞荣泰也坐不住了。他一边举手一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比利时不能代表16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

对周恩来的建议频频点头默认的艾登，这时拉长声调，振振有词地宣布道：

据我了解，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所普遍接受？

艾登的话音打住后，西方国家代表居然都装聋作哑，面面相觑，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艾登的意见。场内寂静无声的时间持续了十多分钟。

这时，史密斯站起来，招手示意反对。他此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表示反对，将违反国务卿杜勒斯使会议破裂的指令；如果表示反对，无疑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眼看周恩来的建议就要通过了，然后，他干咳了一声，身不由己地仓皇发言："我不懂得中国建议的范围与实质。因此，在请示我的政府之前，我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说完，史密斯陷入手足无措的窘态之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豁达大度的气质、平缓有力的语气，对眼前所发生的情况作出十分得体的总结：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我要求把我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会议已经进行5个半小时，当然不能再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了。最后，艾登只得一板一眼地裁决把所有建议和发言都载入

会议记录，并宣布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闭幕。这时，时钟已经指向晚上8时30分。

6月15日，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天啊！由于美国代表横蛮无理的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以没有通过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但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朝鲜、中国和苏联三国代表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无可非议的正义立场，并将美国代表破坏朝鲜和平统一的顽固立场暴露无遗。

周恩来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征服了与会代表，获得了超常的效果。

散会后，莫洛托夫急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朝鲜代表则感慨道："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比周恩来年长一岁、有30多年外交工作经验的艾登，也情不自禁地称赞："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一个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外交家。"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被称为"冷战斗士"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称周恩来为"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我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

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是会议第二项议程要解决的问

题。这是缓和远东乃至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三成员国——越南国、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参加，由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日内瓦会议所要讨论的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更为复杂棘手。这因为，涉及的国家不仅有越南，而且有老挝和柬埔寨，同时在每一个国家中还存在敌对的两个政权或者武装力量，加上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和存心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使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此时，持强硬冷战政策的杜勒斯，预感到将在会上处于被动孤立地位，已于5月3日悄悄离开日内瓦回国，改由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代理团长。

5月7日，即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从越南战场传来奠边府大捷的喜讯。1953年12月，越南人民军包围了奠边府。3月13日他们发起攻击，经过55昼夜激战，歼灭1.6万余名法国侵略军精锐部队，驻守奠边府的法军指挥官、3个主力团指挥官和空军、炮兵指挥官无一漏网，都成了俘虏或者被击毙，越南人民军拔除了法国侵略军在越南西北部的最后一个坚固堡垒。

世界舆论为之哗然，主战的法国拉尼埃内阁在国内也遭到强烈谴责，陷于孤立境地；在体面的条件下获得印度支那的停战，很快成为左右法国政治局势的呼声。因此，周恩来说："法国在奠边府打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大败仗。"

奠边府大捷，有力地配合了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斗争，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取得重大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8日，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法国代表团一反

过去趾高气扬的派头，全都戴着黑纱，系着黑色领带，垂头丧气地走进会场，以此吊唁法国殖民军阵亡将士。这天，法国外长乔·皮杜尔首先发言。他仍以好战姿态出现，竭力歪曲印度支那的历史和根本否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并提出开价很高却又避而不谈撤退法国侵略军和政治解决的停战建议。

在进行九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会议虽无明显进展但已蕴含着转机的情况下，5月27日，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仍然平心静气地说：从各国代表目前对莫洛托夫和皮杜尔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军事停战的各项建议的发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同时还有许多差异点。我希望本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以便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差异点也应当寻找方法加以解决”。接着，周恩来提出了《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6点建议。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可行的照顾到敌对双方利益，并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吸收了对方方案的建议。在逐项解释建议的内容后，周恩来强调：“目前在印度支那应该不分哪一个国家，不分正规军和非正规军，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

周恩来的6点建议，宛如强劲的东风，推动了会议的进程。经过会外的秘密会谈和九国代表团的准备会议，5月29日，即在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第三周的日子里，九国代表团通过了关于越法双方军事代表立即在日内瓦会晤的协议。这是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所取得的第一个实质性的成就。这项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支那三国都存在着停火问题，停火必须在三国同时实现，给印度支那实现最终

停火带来希望。

从5月31日开始，会议双方进入以划区、监察和国际保证为中心问题的实质性讨论。由于法国约瑟夫·拉尼埃政府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谈判在半个月中未能获得重大进展。但此时，法国已被持续多年的殖民主义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国内要求结束战争的呼声此起彼伏。6月13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在国民议会议员们的谴责声中倒台。

周恩来适时推动形势向前发展，同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积极开展会外活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成为促使会议再次取得进展并最终达成协定的关键人物。

6月16日，周恩来以5月2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6点建议和5月29日会议的协议为基础，提出了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6点建议。这个新的6点建议更富有建设性和协商精神，受到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赞扬。

云集日内瓦的各国记者也争相报道：会议已经取得足够的进展，可以继续开下去了！

经过周恩来、莫洛托夫同法国、英国等国代表的广泛而深入的接触，6月19日，会议顺利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我方代表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至此，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会议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美国的报刊评论却发出一片哀叹，声称："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为美国代表所不能理解的法、英、俄、华（指中国）协议。"

善于给人面子的周恩来主动提出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对方在会晤中被周恩来坦荡的君子风度所感动，再次表示："我决心以一个月为期实现停火"

从6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全力以赴为解决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而忙碌和奔波。

6月22日，周恩来接见法国驻瑞典大使让·肖维尔，就同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晤的安排问题交换意见。他对肖维尔说：中国代表现已介绍老挝、柬埔寨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接触。"我们希望(印度支那)三国能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支持双方能够光荣停战，我们是推动、促成，而不是阻碍。"

这次会晤，是善于给人面子的周恩来采取主动行动提出来的。国力衰落但仍要摆架子的孟戴斯－弗朗斯立即领会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起而响应。

孟戴斯－弗朗斯要求周恩来到巴黎去秘密会谈。周恩来既注意灵活性，但在大问题又不丧失立场。他明确回答："你承认国民党的中国，现在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跑到巴黎去秘密会见不好，在瑞士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最后，双方商定两国总理的会谈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公开进行。6月23日，周恩来和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开始了。

在开场白中，周恩来说："我在法国住过，对法国人民很有感情，愿意看到法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对周恩来的友好表示，孟戴斯－弗朗斯欣慰地点了点头，

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随后，周恩来询问了法国政府关于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新方案，同时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申明：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的干涉，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条件。如果美国阻挠达成协议的企图得以实现，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艾登同意我的意见。

周恩来的谈话，高屋建瓴，着眼于和平，既照顾到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充分考虑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切身利益，以情动人、以诚感人，给孟戴斯－弗朗斯留下深刻印象，赢得了他的好感。

孟戴斯－弗朗斯指出“老、柬问题上的进展是经过中国代表的努力得到的”，表示“要集中精力解决停火问题，并提出了双方军队应有两个大集结区的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应根据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情况调整区域，要照顾到双方的利益”。在划线上，“只是越盟（指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所要求划的线比实际情况过于向南”了。他再次表示：“我决心以一个月为期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这意味着法国准备从包括河内在内的红河三角洲全部退出。果真这样，这将是法国政府在划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会谈后，周恩来和孟戴斯－弗朗斯发表了对会议的成功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报。

在将对方最重要国家——法国的工作做得差不多，并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工作已有良好开端以后，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前往印度、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接着，他赶到广西柳州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他又到北京、莫斯科同毛泽

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三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

经过周恩来远距离的奔波和卓有成效的协调，中、越、苏三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协议，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7月12日下午，风尘仆仆地远行几千公里的周恩来返抵日内瓦。7月20日，在祥和的气氛中，日内瓦会议双方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各自都做出必要的让步，终于获得构成停战协议基本框架的七点共识。

7月21日凌晨3时30分，交战双方代表分别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了字。中午11时，交战双方代表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了字。

随即，法国政府发表关于从印度支那撤出自己的军队、尊重三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分别发表关于使全体人民参加共同生活以及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的声明。

周恩来的风度翩翩、豁达通融和杜勒斯的冷面严酷、僵硬顽固，像不朽的历史巨片中的一组镜头，永远定格在世人的脑海中。人们由此而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这天下午3时，周恩来同与会国绝大多数代表一样，怀着

欢快愉悦的心情，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

在蓝天、白云和耀眼的阳光的映衬下，随着微风飘扬在国联大厦前的与会各国国旗，好像也是在迎接已经到来的丰硕成果似的，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会场上，当天的会议主席艾登提醒与会代表说："现在对若干文件已达成协议，经建议，本会议应注意到这些协议。"他环顾与会国所有代表说："最后，还有本会议注意到所有这些文件的宣言草案。"现在，"所有各代表团面前都有该宣言草案的副本。请各国代表一一表示对该宣言的意见"。

随即，法国、老挝、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英国、苏联、柬埔寨等国代表都表示了赞同意见。

眼睁睁地看着会议马上就要通过宣言而无可奈何，但又顽固到底的史密斯，再也按捺不住他急切的情绪，表态要发表一个单独声明。

他宣布：我代表我的政府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字。但是，他又虚伪地声称"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这些协定和条款"，把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地位。在美国代表不参加签字的情况下，会议仍然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随后，艾登说道：我要感谢"所有代表团给予你们的两位主席的合作，使得我们能够克服很多程序上的困难，没有这种合作，我们的任务是不能成功的"。"为了促成停火，我们已拟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它们是我们所能策划出的最好的协议，现在一切将有赖于遵守和执行这些协议的精神。"

接着，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老挝、柬埔寨和法国代表相继发言，对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

最受全体与会代表注目的周恩来，以充满激情的语言讲道："日内瓦会议九个代表团经过75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致了协议。"经本会议的一再努力，我们使印度支那的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得到解决。"我们现在获致的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同时也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毫无疑义，我们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这次会议中，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都表现了很好的和解精神"。本次会议两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对于推进双方为本会议达成协议的努力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在总共举行8次全体会议、23次限制性会议和1次审查提案代表会议以后，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下午5时20分，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在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共赞会议获得成功的喜庆声中胜利闭幕。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出乎人们意料，为会议成功起了特殊作用的竟然是初出茅庐、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周恩来。他首战就大获全胜，狠狠地挫败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转折点。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成功地运用到国际事务中，并推动国际形势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的范例。

周恩来的风度翩翩、豁达通融和杜勒斯的冷面严酷、僵硬顽固，像不朽的历史巨片中的一组镜头，永远定格在世人的脑海中。难怪人们由此而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印度支那和平恢复后，周恩来没有忘记酬谢那些为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做出重要贡献和特殊贡献的各国代表。

7月21日，周恩来在花山别墅热情友好地接待了匆忙前来辞行的艾登，盛宴款待了孟戴斯－弗朗斯和苏联、中国、越南3国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7月22日，他又在花山别墅设宴隆重招待了对立的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与会代表。席间，他频频高举斟满茅台国酒的酒杯，同来宾共祝："为印度支那和平而干杯！""为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的友好关系而干杯！""为出席宴会的各位的身体健康而干杯！"

7月2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他在回国途中应邀顺道先后访问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于8月1日返抵北京。

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关系，展现在新中国人民面前。

（熊华源）

求同存异万隆城

——与万隆会议

毛泽东面授机宜：周恩来可以而且应该对会议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最早是在1954年初由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这年12月，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正式提出召开亚非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周恩来极其敏感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在复电中，他高兴地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

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做出贡献”。中国政府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

但是，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最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美国扩张侵略、称霸全球的对外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它必然站在敌对立场上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圣路易邮报》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同时，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国初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会议的29国中，只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同中国有外交关系，锡兰同中国只有贸易关系；其余22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

在阻止亚非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美国便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的谎言，极力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使这次会议失败。到亚非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竟然公开要求会议“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其国家野心的做法”的共产党政权。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置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美国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为此，从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他主

持研究与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文件。《方案（草案）》指出：

> “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

4月5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会议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计划》等有关文件。同时，毛泽东面授机宜：周恩来可以而且应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和代表团成员名单。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为顾问，王倬如为秘书长。

这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

印尼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临危不惧：在险象环生的严峻形势下，出现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4月7日，周恩来拖着刚动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乘坐中国民航的苏式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抵达昆明。

对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卓越表现大感紧张的蒋介石，在1955年初向国民党高层人士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之说明》。在这篇讲话中，他悲叹道：1955年4月至6月乃是“我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在2月10日周恩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尼总理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筹划谋害周恩来的罪恶计划。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放置了定时炸弹。

这天，当飞机飞离香港约5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东经107°59′38″、北纬3°53′12″）上空爆炸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由于周恩来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埃及等国领导人会晤，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

在这以前，周恩来以他对敌情的特殊敏感，曾指示有关方面

加强对敌情报工作。从3月开始，我方陆续侦察到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对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采取破坏行动。

4月7日，周恩来在即将登机时，得到了赶来机场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呈交的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准备借“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短暂停留、为飞机加油之机，进行破坏。周恩来当即指示：请转告有关部门领导办理。9日，周恩来再次指示外交部立即将有关情报通知英国方面。很快，香港政府在机场采取了防范措施，但因忽视了对飞机的安全检查，致使国民党特务周驹有隙可乘，在飞机右翼轮舱内安放了破坏力很大的小型定时炸弹。

面对险象环生的局势，周恩来面无惧色，处之泰然。在他的经历中，身处危局险境的事何止一次！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一行驱车由延安南下西安途中，在劳山附近遭土匪袭击，同行30余人仅幸存7人。但是，就在第二天，他又赶到西安同国民党谈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4月12日，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表郑重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和香港政府对这一不幸事件负有严重责任。同时，声明要求英国方面彻底查处罪犯，将特务逮捕法办。

这一天，周恩来正好收到邓颖超关心他和全体同志安全问题的来信。当天，他在复信中深情地写道：

> “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

你放心。再见。”

一封短信，寥寥数语，把周恩来一生都在忠实实践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盘托出，这就是他经常说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关心着破案与善后工作。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处理完现场的善后工作赶往万隆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沉痛地说，历史将永远记住，烈士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他要申健把烈士的骨灰盒留给他，由他带回北京。

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墓，至今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它的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此后，周恩来以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开展了多方面的各种形式的积极活动，终于促使香港政府在进行大量侦破工作之后，于1956年1月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对犯有谋杀罪的国民党特务周驹已经发出逮捕状，要台湾当局将逃到台湾的这名罪犯送交香港政府处置。

1994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华裔学者曾锐生在《中国季刊》首次披露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始末。1995年春，台湾《中时周刊》予以转载。据《中时周刊》介绍：

当时这次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早年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情治人员。

……

此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个关键人物。问题的难点自然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察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币60万的重赏下，小郑接下了暗杀周恩来的这一事件的主角。

计划大致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

……

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时，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

事”地通过对工作人员的例行检查。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按规定，简易的漱洗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混入机场。

4月11日早晨，小郑负责三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为加油而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小郑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的。

4月14日，周恩来飞抵仰光。15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国领导人在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亚非国家中引起思想混乱：有的国家领导人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在会上，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建议在座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没有结果。与会其他国家领导人

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4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

飞机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忽遇雷雨。万米的高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这时，机械师向周恩来报告："前方雷雨层更厚，飞机无法穿越，机长的意见是只能迫降。"周恩来点了点头，果断地决定："按机长的意见办。"

这样，周恩来的专机，被迫暂时降落到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的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的机场上。

专机降落后，周恩来意外地得到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的邀请，要他到机场贵宾候机室稍事休息。他俩虽然久闻周恩来大名但始终无缘见上一面，这天赐良机当然是不会放过的。

为了保证周恩来的绝对安全，随行的陈毅、廖承志等代表团的同志力加劝阻。周恩来却自有一番理由："这位麦克唐纳是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也是能够对马来西亚政局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这送上门来的外交工作不去做岂不可惜?"

廖承志不甘心，说："总理呀，实在太危险啦!"

周恩来笑言道："同志们啊，我们是要提高警惕，可也不能草木皆兵嘛！你们想想，人家也是一国大官，到机场来会见客人，能不加强警卫工作吗？从另一方面讲，在外交上要想做出一点成绩来，完全不敢冒风险也不行嘛!"

下午2点多钟，满脸春风的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送到"空中霸王号"专机前，彼此依依惜别。

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以及使馆工作人员，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下午6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群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印尼外长苏纳约陪周恩来乘车驶离机场。

一路上，街道两旁、楼台房顶，到处挤满了欢呼致意的人群。从此以后，凡是中国代表团经过的地方，“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的欢呼声此伏彼起，掌声震耳欲聋。

4月17日，周恩来飞抵这次历史盛会的所在地——万隆。

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同时，他预见性地指出:“我们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随后，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坐车来到达曼·沙里10号住地。这是一栋华侨别墅。这家华侨克服困难，腾出这座房子专供中国代表团使用。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则住进市中心的豪曼饭店。

周恩来一平风波：在会议面临分裂的情况下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开幕。

印尼苏加诺总统，在5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独立大厦会场，然后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

的开幕词。他说：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激动的感情。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的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的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接着，苏加诺总统进一步强调：

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我们的种族是不同的。甚至我们的肤色也是不同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而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而联合起来的。

苏加诺总统的开幕词，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共鸣。各国代表相继发言，认为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会场上充满着友好与和睦的气氛。

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的发言或因偏见，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了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

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并提出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恩来。周恩来镇定自若、不急不躁，静静地听着、思考着。他审时度势，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亲自动笔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

下午4时45分，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

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转瞬间，水银灯一齐亮起来，照相机一齐动起来。没有人不意识到这一刻的重要。

周恩来在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会场一片肃静，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全场屏息倾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

>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在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接着，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所谓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说法，是不存在的。他侃侃而谈。这是因为：

第一，“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第二，“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宗教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

第三，中国人民“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所受苦难“数也数不尽”的中国人民，“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得以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华侨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在会上不提“解放自己的领土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

讲话结束时，周恩来诚恳而亲切地说：“我们是容许不知

真相的人怀疑的。”但是，“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据周恩来当时的翻译浦寿昌回忆说：“周总理讲话的整个过程，大厅里鸦雀无声，楼上是记者席，挤满了人，可是没有一点声音。后来他们描述说，如果当时掉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非常安静地听总理讲话。”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引人入胜的发言，只有18分钟，却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使与会各国代表认识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看清了新中国确实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人们心中的担忧被驱散了，对会议的成功又充满了希望。

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国代表纷纷离座，去同周恩来握手。甚至连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十分和解，表现了民主精神”。

周恩来再平风波：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

4月20日，亚非会议转入实质性讨论，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同已经于19日开会的经济委员会和文

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议。政治委员会讨论以下3项议程：人权和自决问题；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和平和合作问题。经济和文化两个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和文化合作问题的结果也将由政治委员会批准。政治委员会是3个小组委员会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权的委员会。

但是，在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要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20日傍晚开始，会议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殖民主义”。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要求所谓“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凭借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会场气氛异常紧张。许多代表目睹这一僵局，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这时，在万隆的一些自封的美国“观察家”幸灾乐祸地声称：会议有“破裂的倾向”。

4月23日上午，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上再次发表了后来被某些代表称作“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与会29个亚非国家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这就“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机”。

周恩来又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现在，赞成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最关键的几句话。

接下来，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承认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同时，他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1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发言完毕，在他的四周已经围上了一大群人，纷纷同他握手并致祝贺。

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在内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

尼赫鲁总理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话是权威的。有人为此感慨地称许道：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

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40年来，这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广交朋友：频频接触与赤诚交往，结识了各国代表团团长，同他们“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代表团团长包括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起了友谊。

一天，各国代表团都在会场外排队等候入场。突然，周恩来问同行工作人员，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代表是谁？当这位工作人员打听到他就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时，周恩来随即过去同他攀谈起来。他俩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认识并交上朋友的。

当年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卡洛斯·罗慕洛，在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中，有两件是在会外取得

的。

第一，经过平等协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共14条，其中规定：凡属同时具有缔约国双方国籍的人，“都应该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一种国籍”；在条约生效时，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成年人，“应在本条约生效后两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人，条约生效时尚未成年，“应在他们成年后一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

周恩来在《条约》签字仪式上说，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我希望，由于过去的历史所造成的持有双重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们，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了他们的国籍之后，将严格遵守这个条约的内容和精神，并加重他们对其所选择的国家的责任感”，并将为促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共同努力”。

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旧时代遗留给新中国的繁难问题的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新中国同其他国家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树立了典范。

会后，缅甸总理吴努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地说，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的颠覆之害。

第二，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

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他毫不隐讳地同关心这个问题的有关国家代表团深入交换了意见。他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

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二是，“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性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明要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的话，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问道，和平解放台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笑答：“完全可以。”

4月23日，周恩来发表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

很快，周恩来的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并波及到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

4月24日，获得巨大成功的亚非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胜利闭幕。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说：“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从17日抵达万隆到24日会议闭幕，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事务工作，已经耗去了周恩来相当多的时间，再加上频频的会外接触、交往，使他的睡眠时间少得可怜。据当年跟随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

会议期间，周总理7天总共只睡了13个多小时觉。回到昆明后，一天在院里散步时，总理对我说：这次出去紧张些，睡觉少些，回来多睡点就补上了。大姐身体不好，回去后不要对她说，免得她担心。这件事一直到总理逝世后的1977年冬天，我才向大姐作了汇报。

周恩来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随行的陈毅。他深情而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我对你非常佩服，我不但工作不如你，我熬夜也不如你！"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虽然会议从始至终仅有短短的一周时间，但是局面却一下子打开了，新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形象突出了。各种舆论纷纷认为，会议获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周恩来这个中国革命神话般的领袖人物，作为新中国优秀代表的参与分不开的。

5月7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满载着向全国人民汇报的累累果实，在和煦的阳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李济深、郭沫若、贺龙、李先念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熊华源）

三篇代表作

——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周恩来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62年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这三篇重要历史文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理论和政策的代表作。这三篇代表作的基本思想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它们是在不尽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具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和意义。

第一篇代表作现身说法、以情感人地谈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周恩来同我国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十分熟悉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重要作用。1951年8月10日，他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说："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工作一开展，知识分子就更不够。"8月23日，他向全国18个专业会议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时恳切地提出：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

改造是不可避免的”。“进行学习，改造我们的思想，是很值得的。”

报告后，北京大学汤用彤等12位教授发起组织“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校长邀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去作报告。周恩来高兴地接受邀请，认真地进行准备。9月3日，周恩来约请马寅初介绍北大教师政治学习的情况，商谈作报告的事情。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报告马寅初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前去北大作报告，以推动教师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11日，毛泽东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为使这个学习运动扩展到更大范围，周恩来向教育部建议，报告会“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教育部及时作出了安排。报告前，周恩来特地邀请彭真、胡乔木、阳翰笙、齐燕铭、蒋南翔等同志，座谈京津地区大学教师如何开展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强调学习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怀仁堂向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1700多位教师和学生代表，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在持续5个小时的讲话中，他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以自己思想改造的切身经历，围绕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详细地论述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思想改造，以及如何进行思想改造。

周恩来不是一般地论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是现身说法，“先从自己讲起”。他说：“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谈吧！”接着，他

坦诚地讲述了自己思想改造的经历：

> 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30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30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跟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

周恩来说明讲这些话的用意："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在讲到"立场问题"时，周恩来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谈了他的体会：

>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

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周恩来在讲到“态度问题”时指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的觉悟。”“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

在讲到“为谁服务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既然立场问题、态度问题都弄清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自然就得到了结论，这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

在讲到“思想改造问题”时，周恩来指出：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资产阶级教育总给我们一些知识，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组织能力，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当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但因此产生悲观情绪，觉得自己很难改造，这就不对了。有些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参加戊戌变法，现在还要求进步。所以，我们对思想改造要有信心。”

周恩来的这篇讲话现身说法，以情感人，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热烈反响，引起了轰动效应。正像著名学者龚育之在《周

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中所评论的："它的特点，不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而在周恩来以知识分子一员的身分，向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现身说法，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正因为如此，听过这篇讲话的教师都深受教育和感动。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写道："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说："周恩来的那些讲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现身说法，从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谈到新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等，内容感人肺腑。"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在《前期领导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来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第二篇代表作明确地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和国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投身国家建设事业，成为日益紧迫和突出的问题。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一些干部中对知识分子存在着“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少数人甚至把他们视为“异己分子”，加以排挤、打击。根据这种情况，1955 年初，周恩来就想要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着手解决这个问题。1955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通过民主党派调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发现在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存在“六不”现象：一是估计不足，即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11 月 9 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章伯钧也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都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周恩来采纳章伯钧的建议，把知识分子问题列为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政治报告的一个重点，希望政协委员也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视察工作的一个重点，细心了解这方面的问题。

11 月 22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对此感到忧虑。周恩来提出，准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定在 1956 年 1 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筹备

工作。十人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其他成员是：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

为筹备好会议，周恩来着重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向各地、各部门进行部署，要求配合做好会议筹备工作。11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知识分子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我们要处理的日程上来了”。他要求各地也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并在12月下半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当天，他还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部署了这项工作。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国务院各办、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都指定专人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并由他在下周召集这些同志漫谈。他在会上指出：在政治思想方面，“对于知识分子衡量的标准，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其次才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标准至关重要，因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是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现状的关键。

二是，深入调查了解知识分子的状况。11月24日，周恩来邀请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中知识分子的现状。他还分别同各学科的科学家交谈。11月25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上，周恩来要求各民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他说：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已经谈了几次，围绕这个问题有许多材料可以搜集，民主党派可能掌握不少材料。他指出：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是完全合适的，很值得我们研究，并给予全面解决。周恩来还要求各地、各部门报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调查研究的材料，要有好、中、差三种典型。同时，还要有几年来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的情

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变化的基本估计，以及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

三是，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审定《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要求十人小组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对目前知识分子的政治估计和业务估计等12个方面，更加系统和全面地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还要求有关部门搜集苏联、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材料，同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进行比较，研究改变我国科技落后面貌的方针和政策。

四是，主持起草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12月16日，他主持起草并改定《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指示（草案）》明确指出：

> “目前，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隔阂。”“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

12月17日和19日，周恩来两次约请胡乔木商议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就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等提出构思意见。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写成后，1956年1月6日，他召集十人小组会议讨论报告初稿。接着，他对报告稿反复推敲、修改，并增写了一些重要内容。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重要论断，就是他亲笔加写的。他加写的一些重要内容有：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中已经有相当多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积极拥护社会主义。”

“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

“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我们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文化

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周恩来在主持起草和修改报告的同时，还指导十人小组下设的各个专题组起草了11个专题报告。其中有：《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议筹备完全就绪。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隆重开幕，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对知识分子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作了精辟阐述：

>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

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报告在考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后，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了明确的判断：

> 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亲笔加写到报告中去的这个论断，明确地确定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就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周恩来能够作出这个“定性”的科学论断，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思想渊源的。1949 年 4 月 22 日，他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过“劳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他说：“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1949 年 7 月 6 日，他《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是工人阶级的一员。”1950 年 8 月 20 日，他签署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决定》中，规定“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这就是说，高级职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报告在讲到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应该防止和纠正的错误倾向时，尖锐地指出：

> “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为了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作用，报告提出了三条指导原则：“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为了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报告提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个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

用最为广泛和直接。”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包括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两大部分内容。他在作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个重要论断的基础上，报告着重阐明“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的政策和措施。他在作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个重要论断的基础上，用相当多的篇幅阐明“向现代科学进军”，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构想和规划。报告把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鲜明地、尖锐地向全党全国郑重地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956 年 1 月 20 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会后，周恩来为贯彻会议精神，抓紧修改定稿有关文件，下发组织实施，并督促检查落实。但是，由于中共内部包括一些高层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的认识仍不一致，因而会后不久很快就出现了重大的反复。这是周恩来始料不及的。在 2 月 24 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没有沿用周恩来报告中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而是说“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了这年的 9 月，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虽然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却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而没有重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957 年反右运动以后，知识分子一般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而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是开始滋长的“左”的指导思想在知

识分子问题上的反映。

第三篇代表作重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以解除他们的精神枷锁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重新戴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沉重地压抑着知识分子。“大跃进”以来日益泛滥的“左”倾错误，对知识分子集中的科技、教育、文艺、卫生等领域冲击很大。在政治上，搞所谓“拔白旗运动”，许多教授、专家、学者受到错误批判；在业务上，搞所谓“放卫星”，违反精神产品的客观规律。因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伤害。当时，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党支部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等等。当时，教育部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晋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晋升，有一半不可以晋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晋升；已划为右派的更不能晋升。

这种宁“左”勿右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注。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研机关的党委、总支、支部阅读并讨论，以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2 月 28 日晚，周恩来召集宣传、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负责人陆定一、康生、杨秀峰、周扬、胡乔木、夏衍等开会，严肃地批评各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他批评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他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是错误的。他提出要尊重和保护老专家。他要求与会人员“要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但是，1959 年庐山会议后，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又有新的发展。

1961 年，中共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以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调整时期，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也开始纠正“左”的偏向，着手制定相关的工作条例。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认为，要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1961 年是大兴调查研究之年。周恩来决定从文艺界入手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要真正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关键是要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

1962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检查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提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七千人大会为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文化部和全国剧协也在广州

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通称广州会议。纠正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错误，成为广州会议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一大主题。

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主持会议的聂荣臻同一些科学家谈心，有人问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怎样理解？声学专家马大猷在会上提出：为什么现在还把我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会的许多人反映，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有听到有人提到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先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听了聂荣臻反映的情况，周恩来决定和陈毅一道去广州参加会议，解决知识分子工作上存在的问题。1962 年 1 月 25 日，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意见。”

1 月 26 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起飞抵广州。他们看望了出席广州会议的代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与会代表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存在种种疑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政治帽子严重妨碍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他们强烈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约请出席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聂荣臻、陶铸、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杜润生等座谈，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说，他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已经讲了，今后一般地不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粮票”。最后，周恩来作结论说：从总体上讲，不再一般地说知

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羊城宾馆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了“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四个问题。报告的中心问题是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人民联盟的范围。报告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报告引用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

>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

周恩来认为：“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这是讲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

要以列宁的这个论断为纲，就是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来制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方针和政策。

周恩来充分肯定知识分子队伍发生的变化，重申1956年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报告指出：

“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1956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从1957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最近两年。”“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周恩来以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信任他们。”“第二，帮助他们。”“第三，改善关系。过去关系不好的，应该改善，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第四，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第六，承认错误还要改。只承认错误，不去改正，还是空话。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

在讲到知识分子自我改造问题时，针对当时存在简单粗暴的错误做法，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六点意见：

“（一）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三）改造靠自

觉。”“（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

听了周恩来的这篇讲话，与会代表衷心拥护反应热烈，但仍感到意犹未尽、话没说透。讲完话后，周恩来要赶回北京准备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同他商量，决定由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3月4日，陈毅在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心直口快地说：

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12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

说罢，陈毅向全场与会代表深深地一鞠躬。会上掌声雷动，笑声满堂。紧接着，陈毅动情地说：

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陈毅对于当时某些党政领导人缺乏民主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感到危害很大。他忧心如焚地说：

“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垂涕而道”，这些发人深省的肺腑之言，真是字字珠玑，掷地有声。陈毅在这篇3万余言的讲话中，博得会场60多次掌声和笑声。

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的讲话，震撼人心，反响强烈。《聂荣臻回忆录》写道：“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大地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说：‘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做客人了。”“总而言之，科学家们的主人翁感大大

提高。我目睹这一情景，心情也很激动。”

广州会议的热烈反响，使周恩来决心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到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去，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报告形式进一步把它确定下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是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正式恢复了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出的正确论断。这说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拨乱反正，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和全国人大通过了的正式结论。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分歧仍然存在，如同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后的情况那样，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再次出现了大反复。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加写的一段话指出：

> 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没有说话。这种情况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有人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说明，毛泽东是不同意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8月13日，有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说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毛泽东插话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9月11日，陈毅讲到他在广州会议上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倾向时，邓小平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毛泽东却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光，没有利益他不干。”由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存在不同意见，在“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只是说：“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加“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戴“资产阶级”之“帽”。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分歧，在10月到11月中央召开的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也有反映。10月22日，陆定一在会上的讲话认为：

> 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延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

11月26日，陆定一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文教书记处会议上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

> 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说：

“恩来在广州的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

尽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正式决定，但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不仅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又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且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直至“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许多人遭受迫害、打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清算“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郑重地重申：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此，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且势必是永恒的春天。周恩来终于实现了生前未了的一桩心愿。

（刘武生）

为祖国统一开路播种

——与台湾问题

美丽而富饶的台湾岛，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统一，是历史的主流，从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中共领袖们就开始为和平统一祖国而探索，一直做着不懈的努力。周恩来曾经说："我们这一代是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1949年，在新中国解放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当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海上作战经验不足，第一次武装登金门岛的战斗遭到严重挫折，解放台湾的问题拖了下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力量进驻中国领土台湾。这就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

由于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不可能以更多力量

来解决台湾问题。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特别是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台湾问题才被中共中央郑重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美国加紧对台湾的控制。它一方面策划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积极拼凑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极大威胁。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中央认为，如果美蒋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因此，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从政治上揭露美国的企图。

这时，沉浸在日内瓦会议胜利喜悦中的周恩来尚在国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信中写道：“在朝鲜停战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中央请周恩来考虑回国后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一个声明。

8月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声明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会议上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立场。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然而，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2月2日同台湾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面对美国政府的猖狂挑衅，中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2月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战争。”这

是外交上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军事上做解放台湾的准备。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主张和缓紧张局势的呼声甚高。中共中央决定加紧开展外交活动，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当时，面临的外交局势十分复杂，虽然许多国家都主张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不同的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在同各国朋友的接触中提出：谈和缓远东局势，首先要研究紧张局势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是非问题。美国同蒋介石策划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是要霸占台湾和沿海岛屿，第二步就要发动新的战争。因此，台湾问题的中心是要美国放弃侵略。对苏联、印度、缅甸等国提出召开国际性会议的主张，周恩来表示需要确定两项原则：一、蒋介石集团不能参加；二、联合国无权过问。

周恩来还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坐下来谈，我们也是不会拒绝的。这些都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在同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周恩来批评了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周恩来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打破了美国的舆论封锁，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也增进了中立国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

1955年2月，印度提出在召开国际性会议之前进行一些外交试探，可由苏联、英国、印度来进行，目的是在中美之间寻找一些初步的共同点。周恩来接受印度的建议，同意在会前进行不公开的外交接触。

这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锡兰七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纷纷找周恩来，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4月23日，周恩来同七国代表团团长进行会谈，全面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根据与会国的要求和在国内已经确定的“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的精神，周恩来临时决定发表一个声明。

声明提出：

>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的这份影响世界的声明，使中国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

万隆会议后，苏联、英国、印度等国加紧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

为巩固胜利成果，周恩来回国后加紧了外交活动。从5月13日至20日短短的几天中，他仅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就进行了六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告诉梅农：“谈判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谈判的原则是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性质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国际性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中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台湾问题可以用武力解决，也可以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周恩来的谈话对澄清一些人的错误认识很有帮助。

这时，国际和平舆论使美国国内舆论发生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对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采取现实的做法。

7月，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政府转交了美国关于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晤的建议。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中美之间终于踏上漫长而艰巨的谈判道路。虽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中美谈判几经波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中美两国毕竟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中美会谈开始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开展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

实际上，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这项工作就在周恩来的筹划下有步骤地开始了。当时，工作的中心放在政治宣传上。

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他说：“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济上要加强建设，从而加强解放台湾的物质力量。”8月15日，他在宴请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强调了这一精神：“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他们“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9月25日，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方针明确提出：任何人都允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来与家属团聚。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缅甸。在与吴努总理

会谈中，吴努表示想调解中共与蒋介石的关系。吴努的兴趣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和平解放台湾，特别是怎样对待蒋介石；二是和平解放台湾后，中国是否愿意同美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接受美援。

周恩来回答说："台湾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这是国内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问题，二者不应混淆起来。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容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但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

后来，周恩来在外交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继续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决的方法，作为中国政府不仅不拒绝而毋宁是提议同蒋介石集团进行谈判。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明确了这一方针。他说：

>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

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

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相应地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到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的方针和政策。他强调：

> "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将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解决。中共八大肯定了这一方针。

为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他捎话给海峡对岸的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

“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到了6月，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对台政策。周恩来最后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他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人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对国共和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办法。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有关人士，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

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为达到继续占有台湾的目的，美国政府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反对。国共两党在台湾问题上一致坚持的民族大义，成为周恩来对蒋介石集团的上层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政治基础。

周恩来争取过来的第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曾经是有名的“剿共”司令，也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

1955年，因躲避蒋介石的迫害而出走香港的卫立煌收到一封奇特的信，这封信是他妻姐的女儿韩德庄写来的。信中说：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请姨父姨母回来。

“太原的朋友?”

卫立煌愣了一下，旋即，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激动。

这位“太原的朋友”就是周恩来。

1937年秋，经历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在山西战场开始了最初的、也是最好的一段军事合作。当时，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和卫立煌见面了。

周恩来的任务是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合作抗日事宜，卫立煌的任务是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带领部队开赴前线迎击日军。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太原阎锡山官邸。当时正是忻口战役前夕。

能见到北伐时期就十分仰慕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卫立煌自然感到非常高兴。

双方谈话的主题很快就归于前线的战事。周恩来听说卫立煌决定去忻口迎敌，很钦佩。他告诉卫立煌，近两个月在庐山、南京两地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弱点。他说："目前全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各界朋友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这是最严重的情形，直接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挽救危机的惟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

卫立煌提出希望中共调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共同保卫太原。

周恩来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现日军向太原方面进攻，我们不能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应该给第一二九师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使它能迂回日军后方，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敌人。

卫立煌一时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周恩来所讲的道理。

1937 年 10 月 5 日，忻口战役迫在眉睫。周恩来同阎锡山、卫立煌等共同商讨忻口战役作战计划。周恩来提出应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诱敌深入，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处于左右两翼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同时向宁武南北、代县以东侧击敌人，协同友军作战，力争在忻口以北取得胜利。

忻口战役打响后，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八路军第一一

五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略取浑源、应县；令第一二〇师主力位于岱县（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三五八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一二九师以一部进至正太路之寿阳等地，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八路军的有力援助深深感动了卫立煌。

11月初，忻口最终失守。卫立煌败退太原。

周恩来十分体谅卫立煌此时的心境，他安慰卫立煌说："胜败不在一城一池之得失，只要我们继续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最后定能改变不利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

经历失败后的卫立煌这时才真正感受到忻口战役前，周恩来提出的种种意见是正确的。

太原时期的短暂交往，使周恩来和卫立煌结下深厚的友情。难怪这位"太原朋友"的来信会激起卫立煌珍藏心中的感情。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卫立煌曾经为蒋家王朝屡建战功。由于他不是蒋的嫡系和亲信，所以，尽管他战功赫赫，仍然受到蒋的排挤和猜疑。这使卫立煌深感苦恼和愤懑。

解放战争末期，卫立煌终于下定决心脱离蒋的阵营，出走香港。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曾通过"民革"的关系争取卫立煌回国，卫立煌曾郑重回答："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新中国诞生的第三天，卫立煌起草了一份致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

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

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

1955年1月24日，周恩来发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引起卫立煌的共鸣。他向友人表示：解放台湾、统一中国大业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态度和愿望。卫立煌的政治态度受到周恩来的重视。他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欢迎他回来的时候，将会对海外国民党人士起一个榜样作用。因此，他请韩德庄发出那封令卫立煌激动不已的信。

这封祖国来信，坚定了卫立煌投向新中国怀抱的决心。

3月15日，卫立煌从香港抵达广州。在这里，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庄严的一个文件《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台湾袍泽们、朋友们：

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由无而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工业之大量开发与建设，治淮、荆江分洪以及各地水利之兴修，康藏、青藏两公路及成渝铁路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道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

视同仁（如程颂云、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经济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献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他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拒抗，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

……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

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掏诚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

看到卫立煌的返国宣言，毛泽东十分高兴，一封洋溢着欢迎之情的电报从北京发往广州：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宴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他特意邀请卫立煌作陪。伏罗希洛夫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无敌的。"周恩来说："对。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句话

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卫立煌回国的全部含义。

卫立煌的行动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和鼓励，他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只是由于无情的疾病突然袭来，使卫立煌没有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在他住院治疗期间，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多次前去探望。到了卫立煌病势沉重，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同疾病作斗争，使他感动得流下热泪。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逝世，终年64岁。周恩来亲往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为他主持公祭。

张治中在悼词中说："卫立煌不愧为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这是人民对他的最高评价。

一位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士说："从卫立煌的转变，再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伟大、正确，它吸引了千千万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连原先蒋介石的重要台柱、得力的左右臂、反共最有名、和红军打仗打得最厉害的剽悍先锋也成了共产党的好朋友，末后也自己跑到人民这一边来了。"

以民族利益为重，继续发展海峡两岸关系，把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诚意传递到台湾

1960年初，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变化，它一方面继续从政

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力图借此打开缺口，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寻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国的做法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这种局面十分有利于中共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讨。中共中央坚持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中央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为把中共的诚意传递到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工作。

他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台湾当权派深有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台湾第二号人物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和政策，在60年代初，张治中等人在信中向台湾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更为宽松的四点意见：

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

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旦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

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这些信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阔胸怀。

抓住机会做国民党元老的工作是争取台湾人士的一条重要渠道。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最近给香港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胡子”就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周恩来建立了比较深的关系。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接到信后，立即通知于右任的女婿中共党员屈武，要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80大寿，周恩来自己也准备了一些礼物。当时，于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陕西的风俗可以补寿。周恩来听说后马上指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于夫人补寿，还让人转达他的话：“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

屈武后来回忆说：事后，我决定写封信，把这件事辗转告诉于先生。在准备写这封信的时候，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使他知道周总理对他和他留在大陆上家庭的关怀。这就必须在信里写上周总理的名字。那么这封信到台湾，如果被特务们发现，对于先生将产生什么后果呢？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我就到邵力子先生家里向邵老请教。邵先生和于先生有几十年的深厚友情，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周总理对于先生的关怀，也是邵老先生所了解的。我把问题向邵先生提出后，邵先生非常机智地想出了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他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京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

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总理，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我就照邵的说法把信写好，连同祝寿时的照片等物清点后转交于先生。后来吴先生给我来信说，于先生收到我的信、照片等，高兴到了极点，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他非常地感动。他要吴先生告诉我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忱。他对总理的称呼也用濂溪先生。足见邵力子先生的设计和判断是很高明的。就在我接到这封信的第二天的一个晚会上，我把吴先生来信的内容报告了总理。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于右任逝世前写了一首诗：“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反映了他盼望祖国统一的浓烈情感。屈武说：“这固然与于先生一贯的为人和思想有关，也是周总理长期工作的结果。”

周恩来还嘱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这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 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决定以促进他们

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章士钊曾经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用张治中等的话来说，“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

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月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惟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负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

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道：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廖心文）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与国民经济调整

“大跃进”带来严重后果，周恩来和李富春共同提出“八字方针”。他指出：做计划，搞建设，必须“按比例地发展”。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1958年发动起来的“大跃进”运动，在运行两年多以后便带来了严重后果。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已经陷入重工业畸形发展、农轻重比例失衡、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严重、商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困境之中。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不仅干部和群众焦虑不安，处于第一线的经济综合部门更是紧张”。越来越严重的经济情况，使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二五”计划后三年（1960年到1962年）的补充计划。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所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赞扬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他说：这个计划的“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

余地，多么好啊！”

7月5日到8月10日，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分析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研究如何扭转工业生产被动局面，如何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同时初步议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整顿的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根据这两次中央会议的精神，从8月中旬起，国家计委开始讨论重新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这时，即将出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在谈对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时强调：“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应着重进行整顿、巩固、提高。”接着，国家计委在关于请各大区计委主任来京开会的电报中也指出：“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

8月29日至9月5日，国家计委顾卓新等几位副主任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在第一天汇报时，周恩来明确地说：应该在“整顿”之后增加“充实”两个字，从而补充发展成为“整顿、充实、巩固、提高”八个字。

第一天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又开始考虑这么一个大问题：究竟用“整顿”还是用“调整”更符合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

半个月前，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作形势报告，传达北

戴河会议的基本精神时，就明确提出了应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他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业生产“基本上还依靠人力、畜力”。“为了摆脱落后，必须使农业这个基础过关”。但是，“两年来城市人口增加3000万，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还未很好扭转过来”，“这不利于农业生产”。现在“劳动力不仅要停止向城市流，而且要向城市要。城市的劳动力有一部分要坚决回农村去。工业支援农业，首先要在劳动力上支援”。

周恩来还说：

> “由于大跃进，各方面都想搞些建设，使我们各方面都得到发展。这个愿望是好的，但不论计划内的或计划外的，却常常突破原来的指标，影响设备、器材等不够分配，工作上显得百废俱兴，人力物力分散了，搞得很紧张，使我们不能很好地集中力量。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计划上加以调整，所以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战线太长，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们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能分散力量，这会使我们的建设更快。”

经过认真考虑和比较，周恩来认为：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调整”虽然与“整顿”只是一字之差，但这两个字的含义却有很大的质的区别。还是用“调整”好，因为它更符合扭转宏观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的紧迫需要。因此，在汇报即将结束时，他又提出将“整顿”二字改为“调整”。

9月6日，顾卓新在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周恩来听取

汇报时的指示说："在总理处谈了三个半天，总理意见，礼拜六政治局谈一次"，1961 年计划的"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这个时候起，八字方针开始以更为完整、准确的形式出现。

9 月 30 日，周恩来签发国家计委党组上报的《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审阅这个报告时指示：即送李富春交龚子荣办。"此件已经书记处原则通过，并商定先行批发，以使各地各部据此进行编制计划草案的工作。另将计委党组口头汇报要点送中央常委审阅"。《报告》以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首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1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发出呼吁：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要积极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11 月 16 日，在听取国务院有关副总理汇报 1961 年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主题为"摸清情况，总结经验"的讲话。

他说："从总的方面看，国内形势大好，但有暂时困难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接着，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了困难的严重性：虽然是暂时困难，但"暂时困难是全面的，不仅农业有困难，工业也有困难"，"两年农业歉收，底子亏了。今年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 300 亿斤，其他经济作物，如棉花、烤烟、糖、油、麻等，底子也亏了"。进而，"农业影响工业，影响城市"，"工业反过来又影响农业"。据此，他作出结论：这些情况证明，"做计划，搞建设，必须有大跃进的速度，又要按比例地发展"。"只有大跃进的速度与按比例地发展相结合"，"才能波浪式地

有节奏地持续跃进”。“否则，就会违反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周恩来勇挑重担，部署和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全部工作。他强调：“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调整是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

会议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1961年全国必须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会议还把“八字方针”写入会议的公报中。这标志着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对于后来大规模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作用。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协助周恩来、陈云等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10人小组。成员是：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赵尔陆、彭涛、陈正人、孙志远、吕正操和刘澜波。

1961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全国粮食库存不到100亿斤，这是从来没

有过的”。“目前的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农村到底能供应城市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和工业原料，解决多大的市场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城市能搞多大的工业。”

从这一认识出发，周恩来提出了要坚决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的主张。他指出：“城市人口太多，对供应工作压力很大，对发展工农业生产不利。”“我们现在的工业水平，根本不需要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因此，“在不妨碍生产，而且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前提下，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我们希望从今年麦收开始，到明年，争取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压缩1000万以上的人口回乡。”

4月初，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对“八字方针”的含义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

> “调整，就是调整我们各部门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就是要把现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充实，就是现在我们的各种生产事业中有很多缺门、薄弱环节，要把它配套成龙，填平补齐，充实起来；提高，包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

这个政策性极强的解释，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吃透八个字方针的精神实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到这年夏天，党的领导层内对形势的认识仍不统一，有人继续坚持“左”的设想，致使北戴河会议后对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还没有退够，工业生产无法完成较高的计划指标，调整收效不大。党内有人认为，工业生产任务完不成，是松劲造成的，因此要反对人们的松劲情绪。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他说："我了解到不是干部、职工松劲的问题，而是许多问题没有能够解决。"因此，应该大抓调整。他以强有力的事实说明："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因此"好转先于城市"。看来经济建设还要全面调整，"工农业的关系和城乡关系都要调整"，而且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调整计划。

9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进一步强调："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八字方针是有机联系的"，但"调整是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

周恩来进一步说明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

> "第一，坚决退够，留有余地。农业、工业、教育、财贸等等，都是如此。凡不合理的指标，一定退够，退够再不退了，然后留有余地，好调整。"
>
> "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调整要有次序、要排队。首先抓农业，因为农业是基础。经过三年灾荒，要把它恢复起来，增加供应城市的粮食、劳动力、运输、原料。其次是市场。再次是采伐业。"
>
> "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一定要在新的比例关系上进行新的平衡。"

本月，周恩来还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提出："要将重点调整煤炭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

由于周恩来等的大力提倡，这以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进行全面调整、综合平衡的问题。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每当有人感到不可理解时，他总是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1961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反映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正确意见，并得到毛泽东赞同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在今后三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具体安排，这就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

据谷牧在文章中回忆说：

> 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大会上已经安排的日程外，他还经常在午间召开有关会议，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我的笔记记载，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日这半个月里，他就

找我和10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及有关综合部门的同志，开会研究煤炭生产、矿山机械问题达6次之多。写到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在那段岁月里，10人小组在总理的具体领导下辛勤工作的幕幕情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难题，大家忘我地工作，多方了解情况，充分估计各种实际困难，深入研究各种办法和措施，简直绞尽了脑汁。在讨论问题时，大家有时也会因认识角度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最后总能够从大局出发，把意见集中统一起来，拿出办法，报总理裁定。

1961年1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明年是“关键年”：

“关键在于调整，关键在于集中统一，关键在于领导，关键在于从全面出发，综合平衡。”“对困难应有足够的认识，并应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在工作方法上要抓重点，以问题为中心抓，要抓煤、木材、有色金属及其他，基建要认真排队，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不能分散。”

12月15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继续强调：我们有些搞急了，搞多了，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调整期间今明两年是关键，今后一定要有重点，所有各部门对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都要下马。归根到底是要集中统一，要听中央、国务院的决定。

1962年一二月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

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这两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对严重形势和艰巨任务的认识，加强团结，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并进入到全面调整的决定性阶段。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问题作了诚恳的检讨，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心情沉重地说：

> 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
>
>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
>
> 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50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有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
>
> 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

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

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财，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每当有人这样提问时，周恩来总是真诚而坦然地回答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这样做，既是他真实想法的流露，同时也有他深层的考虑。因为，国难当头，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允许出现推诿过错、互相指责的情况，必须同舟共济，共挽危局。其次，上级领导理所当然地应当主动为下级干部承担责任，使他们轻装上阵，做好调整工作。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这以后，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等不同场合仍然多次进行检讨。他说：“要说责任，还在我身上，你们是负次要的责任。”“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责任在中央、国务院，还有国务院的各部。你们回去，可以向下面传达这一点，减轻大家的负担。”

2

这两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

周恩来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他提醒大家：做好调整工作的关键，是把情况"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力量"

1962年3月上旬，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说：

"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来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多说一点困难，也没有多大害处。要鼓励各种不同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作决定。个人还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必须一致。""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

当陈云在会上发言提出经济调整“不要拒绝‘伤筋动骨’”时，感触颇多的周恩来立即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究竟怎样转弯呢？周恩来提出了八条办法，其中有“经济计划工作要从以工业、交通为重点，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按照当前最急需的安排生产”，“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和“基本建设规模还要缩，投资还要削”。

西楼会议后，繁重的经济工作使身体一向不好的陈云病倒了，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的重担实际上又落到周恩来肩上。

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从缺点和错误中取得经验教训。”“这些反面的经验就能够同正面的经验一样，成为对我们极为有用的财富。从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比较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事情应该怎样做，就应该怎样做，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

周恩来有着高超的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才干，具有开拓进取和实事求是精神，尤其善于在危难险恶的局势面前，审时度势，提出转危为安的正确措施和办法。因此，他在《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中，以“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为标题，娓娓道出了自己的全盘意见和主张：

> “我们在今后几年中，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然而，“在1962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

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具体任务是：“第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增产。”“第二，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第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第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第五，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实资金。”“第六，改善市场供应状况。”“第七，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第八，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第九，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

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得到与会者的首肯和赞同。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周恩来同志在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下发《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使广大干部都能清楚了解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克服困难，更好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斗争”。

可以说，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动员全国人民实行“伤筋动骨”的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4月2日，为了引起有关财经部门领导人对于城市调整工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召集的财经各部党组负责人会议上说：“各个部都要按行业提出企业排队的计划”，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过去是在高指标下被迫进行调整，现在是主动进行调整。他提醒大家：做

好调整工作的关键，是把情况“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力量”。

5月7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在内的105名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由在中央第一线负总责的刘少奇主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

5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向全党高级干部发出呼吁：“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他解释说：“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周恩来告诫与会者：

>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周恩来说明“现在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精简职工超过1000万，城市人口争取超过2000万。“这个决心，就比今年2月中央发布的那个精简城市人口的指示进一大步了。”

为了使与会者感受更为深刻一些，会后领导调整的自觉性

更强一些，周恩来十分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没有的。""下这个决心，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

这天，刘少奇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说："我同意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讲话。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我看是好的，要修改一下发出去。"

接着，刘少奇极其严肃地指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应该跟干部讲清楚。""'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进而，他告诫与会高级干部们："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各省市都要有指挥部，经常通消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立即处理，这样很有必要。""我觉得减少两千万人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

这次工作会议对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的认识，比本年初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会议根据周恩来、刘少奇等的意见，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

鉴于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对于调整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会议上还决定，将讲话要点发给与会者带回各地，作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依据。

会后，周恩来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

划的报告》和《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报送在上海的毛泽东审阅。5月24日，毛泽东指示："退周总理，照办。"26日，中共中央将《指示》和《报告》下发全国。

从此，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有声有色、大刀阔斧地展开。到1962年底，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走出低谷，出现了从两年连续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主要农产品产量开始增长，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长8.5%，刹住了连续三年下跌的势头，生猪存栏数达近1亿头，比上年增长32.3%；基本建设规模受到有效抑制和压缩，重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比上年降低16.6%，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42.5%提高到47.2%；财政收支实现平衡，并略有结余，扭转了连续四年的赤字。

这段时间，是周恩来在建国后领导经济工作最繁重、最活跃，发挥其经济思想和卓越才干的又一个比较充分的时期。

（熊华源）

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

——与中缅边界问题

秋天，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

1956年的秋天，周恩来在北京迎来了中国西南邻邦的友好使者、缅甸联邦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吴努这一次访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和中国领导人商谈，如何尽快解决中缅两国的边界问题。周恩来的答复也很坦率。他对这位老朋友说："愿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作为典范。"

这掷地有声的许诺，扫除了吴努心中的疑虑。

"什么人只要见了周总理，谈了问题就放心，愿意和他做朋友，他从来是说话算数的"

吴努在以往和周恩来的接触中得出印象："什么人只要见了周总理，谈了问题就放心，愿意和他做朋友，他从来是说话算数的。"

吴努的印象一点不错。

1954年夏季，日内瓦会议终于结束了，和平的曙光驱散

了战争的阴云。几个月来，周恩来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为实现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奔走。回国前，他先到了缅甸。

周恩来一直十分重视同缅甸的交往，也一直向往到这个美丽的邻国做客。

在中缅两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边界问题。这个问题是1885年英帝国主义侵占缅甸后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究竟会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受到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关注。

因此，周恩来这次访缅受到缅甸方面隆重的欢迎，他们希望在谈论边界问题时能有所收获。

会谈中，吴努直截了当地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够早些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

从周恩来本意讲，他也希望早些解决这个问题，这对稳定周边国家，促进亚洲和平，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可是开国以来短短的几年中，国内外发生了那么多急迫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时顾不上。更何况，边界问题又是那么复杂，总要有一段时间了解情况。

因此，他也直截了当地对吴努说："希望缅甸能够给我们一点时间，把情况弄清后再正式商谈。"周恩来还说："我们两国要以友好的精神，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好吗?"

翻译的话音刚落，吴努立即点头表示赞成。

这年12月，吴努应邀访问北京。他与周恩来谈话的主题还是中缅边界问题。双方会谈的结果以公报形式正式公布出来。公报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承诺，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缅甸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正当中缅两国领导人为解决边界问题进行积极努力的时

候，1955 年底，中缅边境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响起了枪声。

那天清晨，边界线上雾气浓浓，几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像往常一样，中国军队开始了一天的巡逻。他们没有想到会在黄果园附近与缅甸军队相遇。由于雾太大，辨不清情况，双方开了枪。

一时间，帝国主义大做文章，缅甸国内也出现了不利于中缅友好的言论。边境局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起来，原本复杂的边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缅甸领导人对此焦虑不安，中国会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

正像吴努所说的，周恩来“说话是算数的”。他没有因为黄果园发生的冲突而动摇公报的精神。相反，他适应形势，把中缅边界问题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 1956 年春天开始，周恩来主动同缅甸领导人进行频繁的接触，拨开了蒙在两国之间的那朵阴云。

1956年周恩来依据和平睦邻政策和对中缅边界问题调研的结果，向缅甸提出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大国，它的四至边界从来不那么明确，呈现“出出入入，犬牙交错，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状况。这种奇特的状况，直到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后才有所改变。为达到对亚洲国家分而治之的目的，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同它所殖民的国家划界，并签订了一些对中国很不平等的边界条

约。

中缅边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缅甸同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接壤，蜿蜒曲折的边界线呈南北走向，有2700多公里长。边界两边常常可以看到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边民，从祖辈即开始的密切交往，奠定了两国之间深厚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的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三段存在着未决的问题。

第一段是南段，即佧佤山区的一段。这里一直居住着勤劳的佤族人，他们长期过着部落生活。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后，也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英国军队没有到达这个地方。那时候，中国曾经到达这个地区的两个地方，一个叫班洪部落，一个叫班老部落。在班老那个地方还有一点银矿，中国政府曾动员民工去开过矿。1894年和1897年中英两国先后签订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中，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但是，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934年初，英国派军队进攻班洪和班老部落所辖地区，但是没有得逞，他们遭到当地佤族人民的英勇抗击。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机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强迫中国政府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区划定了一条对英国片面有利的边界线，这条线包含着中国人民的屈辱，被称作“1941年线”。由于不久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因此，双方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桩界。

第二段是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人们又称它为南畹三角地。这片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第一个中缅边界条约前，英国不经中国

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了一条从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1897年中英两国再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

第三段是北段，即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是1911年，英国武装侵占片马。“片马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其强烈的民族义愤，中国大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1911年4月10日，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然而，事实上，英国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着这个地方。

对中缅边界的现状，缅甸政府却不是这么认识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北段存在未定界问题，而南段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与中国在认识上有很大的距离。

究竟怎样缩短两国在认识上的差距呢？

周恩来提出，可以暂时避开具体问题，从确立原则谈起。

为了寻找一条公平合理地解决中缅边界的途径，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对中缅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在那些日子里，西花厅的灯光常常是笑迎启明星。后来，毛泽东告诉吴努：

> 周总理读了几本书，我们把过去的文件和书都研究了又研究，也把地方干部调到北京研究了一下，又派了一个将军去查了一下，又和法律专家研究了一下，于是才定出一个方案，一个包括南线和北线的统一方案。

这年秋天，吴努到达北京。10月25日下午，他应邀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陈毅副总理、章汉夫副部长、章文晋司长、姚仲明大使以及缅甸朋友吴敏登、吴拉茂大使等。

会谈的主题十分明确——中缅边界问题。

周恩来直入主题，说："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严重，因为这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两国是倡导五项原则的国家，应该根据这些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短短的两句话，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周恩来高兴地告诉吴努，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是："中国政府愿意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政府也保证缅军不进入中国军队曾经驻扎的地区。中国政府仍可以对1941年线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缅甸政府取消了对1941年线的要求。同时，在北段，缅甸政府为了友好起见，也同意把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中国政府也保证中国军队将不进入这些地区，以待最后的划界。中国政府认为，这可以作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一个公正的途径。"

谈话中，周恩来进一步向吴努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几个原则，形成了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

周恩来在建议中除了重申上述处理南、北段的原则意见外，对勐卯三角地的问题，提出："中国人民认为，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应该如何收回。"他强调："以上三点联系起来解决，才能改变我在前边所说的情况，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便于我们进行解释。"

周恩来入情入理的一番话，深深感动了吴努。他体会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缅甸人民的朋友，周恩来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是充满诚意的。

吴努这次北京之行是同周恩来谈话最多，谈的问题也最多的一次。当时，中缅之间一个较大的分歧是怎样认识1941年线的问题，这条线是缅甸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他们坚持认为以这条线划界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这条线又是英国在中国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中国人民不愿意接受这条线也是在情理中的。

周恩来认为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要照顾到，偏到任何一方都会伤害对方人民的感情。因此，他在第二次会谈中对吴努说："不按1941年线定下来，缅甸就没有其他办法，这种困难，我们是了解的，所以我们并不要求修改这条线，也不反对缅甸坚持这条线的立场。我们的要求只是缅甸军队不忙进去，等到这条线最后确定和要下桩时为止。"他还说："如果你们在解释的时候，一方面说这段边界应该是1941年线，另一方面也承认1941年线是英国乘中国之危强加于中国，现在既已成为事实，就应该维持下来，那么你们既向人民作了交代，又向中国表示了友好。"

这的确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用吴努的话来评价："中国的建议是公平的。"这个建议被写入1956年11月5日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

经过这次接触，中缅两国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的意见。在友好气氛中，周恩来表示："愿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作为典范。"很明显，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中缅边界问题的思考，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希望通过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来推动解决我们同整个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

使中国获得一个广泛的和平建设的良好环境。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吴努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郑重宣布：中缅两国取得谅解，从1956年11月底到1956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

1956年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撤军工作，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中缅边界问题究竟怎样解决还要听听中国人民的意见。能够尽量的多讨论、多商榷总是对事情有好处的

中缅边界问题提出后，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1956年11月5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报告了与吴努会谈的情况。会议批准了他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

但是，对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理解和接受的。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都有人提出了意见。一些代表写信给周恩来，坦率地说明自己的意见，总的意见是认为“失地太多”、“吃亏太大”，希望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现状。这些意见启发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思考。1957年2月，周恩来访问亚欧11国归来后，立即抓紧时间研究边界问题。他听说云南代表尹明德对中缅边界问题很有研究，并在20年代就化装到北段江心坡一带调查的情况后，立即请他到北京当面讨教。尹明德给周恩来带来许多书籍和地

图，这对周恩来研究边界问题很有帮助。

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周恩来除了同北京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座谈讨论外，还特别邀请了云南省负责人及各界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群众的思想情绪和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而与会代表对周恩来“为人民利益而博访周咨搜集资料和周到深刻慎重考虑问题的服务精神”也是十分敬佩的。

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后，3 月 16 日，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举行全体大会，周恩来就中缅边界问题做了专题性报告，正面回答了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

周恩来首先从地图讲起。他为什么以此为讲话的源头呢？原来，会议的前一天，碰见一位代表时，那位代表第一句话就说：“我根据地图，我感觉很大的不安。”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我一下就听懂了，所以我今天从他那里学来，头一个也讲地图。”

周恩来依据讲台前挂的示意图详细分析了清末以来各个时期绘制的几幅比较像样的地图上所发生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情况又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不吻合，因为交涉还没有达到。制图时要把实际情况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一百年来从刚才说的 1849—1948 年没有交代，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建国以后，中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出版一本正式地图。人们通常使用的是 1953 年由地图出版社委托私人出版的一本地图，这本地图没有经过政府审定。这本地图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建国前申报馆出版的一本地图发展来的。周恩来在会上说：“今天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个工作

还是需要很认真的，又很慎重的，又要站稳民族立场，又要照顾到友好关系，又要划得合乎实际，又要能够不损失我们主权，这的确是一件艰难的工作。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明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地图办事。可是人民不懂，所以这个问题用一个什么办法向人民去解释比较恰当，解释得不恰当，人民了解了，可是又引起了友邦觉得我们是不是还要向外要的太多，还要局势不定。要说得很定了呢？那又等于默认现状，也不完全好，所以这个地图问题，倒是一个难题。”

那么，对未定界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采用“争”的态度呢？这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认为，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在力争未定界，大家“印象极深，难以忘怀”。因此新中国仍旧应该采取这个态度。针对这种思想，周恩来说：“当时与帝国主义争地方，就是说参加到中国大家庭里来总是比被帝国主义压迫要好。所以争地方多一些这样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对的，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那时没有争到，而现在那块地方已不属于中国，而是独立后的缅甸。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变成了民族主义国家，一个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彼此的关系是友好关系。”他还说：“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与历史上解决问题不能相同，当然不是毫无联系，虽然历史不能割断，但也不能完全相同。”听了这段讲话，使许多人纠正了过去只从历史上地图上空谈领土版图，要求愈多愈好的错误看法，明确了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原则和和平外交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道理。

对具体方案，人们十分关心 1941 年线的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承认这条不公平界线。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把它否定了，重新定一个新的，当然是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

个条约，重订，这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绝不是这一个条约为止，那的确四邻不安。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慎重考虑。1941 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已经是签订的边界条约，而这个地方（佧佤）两边都不是直接统治的，划得不很公正。但是，我们如果照这样解决比否定了然后重新划问题要好得多。两个利弊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 1941 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他来一个否定。”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明确指出了我国同缅甸的谈判原则是同我们的国策紧密相联的。我们的国策首先是要争取世界局势的缓和，好进行我们的和平建设；第二，是要争取亚非国家，要跟它们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时常警惕，预防大国主义情绪，不使人家感觉我们要向外收复多少东西，但应该得到的我们要争取。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有很强的说服力，许多人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由于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关系到云南地方的利益，因此，3 月底，周恩来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昆明，同云南省各界和各少数民族代表座谈，耐心地做解释工作。这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曾经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同认识的尹明德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 4 月 18 日给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信中写道：“我两次听了周总理对于中缅界务的报告，分析得极其详细，很全面，很具体，对听众很有说服力。我过去对于边界很重视历史事实，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使我进一步有所认识、了解，对于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尹明德的切身体会代表

了许多人的心声。

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基本的统一。

7月9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向人大代表正式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在报告中，周恩来进一步重申：

> 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像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7月15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批准了周

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意见。

此后，中缅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进入具体协商阶段。

协商中，周恩来始终平静自若，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疏导，耐心协调双方思路，从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具体协商阶段，是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最艰难的一个阶段。

1957年2月4日，周恩来还在锡兰访问的时候，缅甸一位负责人写给他的一封信已经寄到了北京。

这封信，实际上是这位负责人对1956年10月周恩来吴努会谈时周恩来所提出的建议的理解，也是他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具体设想。

这位负责人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1948年缅甸独立时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边界线。这就是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在中段把勐卯三角地无条件给缅甸；仅有的修正是在北段，把包括片马、古浪、岗房在内的50平方英里土地交还中国。这个“希望”，中国人民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回到北京。中国国内开始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舆论普遍要求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边界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缅方2月4日来信没有马上给予答复。

3月底，周恩来到昆明时，同正在那里访问的吴努会晤，对2月4日来信中的划界建议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对案：

在北段，根据地形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并且根据过去英国在致清政府的正式文件中承认中国在小江流域的管辖范围，要求把归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地的面积划得比缅方所建议的要大；在中段，中国政府不准备收回勐卯三角地，但要求在1941年线上作调整，即换回该线以西的班洪、班老等地区。

这个方案，缅甸方面也是不能接受的。吴努说："既然双方意见有出入，就以不发表公报为好。"

虽然这次会谈后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公报，但是彼此认为两国在总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周恩来和吴努都希望，在两国边界问题取得最后解决的同时，将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双方互相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集团。

6月7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要求会见周恩来。他给周恩来带来一封吴努的来信。在这封信中，吴努催促周恩来尽快对缅方2月4日的信做出正式答复。

周恩来对吴拉茂说："中国政府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是不会变的。"他还说："关于中国方面的正式复信，那需要在人大开了会批准了政府的方针后才能回。因为如果不经过人大的手续，人大代表可提出责问，政府就不主动了。根据宪法，也必须报告人大，这样的边境的大变动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了解这仅仅是地图上的变动，但是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了解。在人大批准了政府的方针后，我们就可以在报上宣传，人大代表回到各省后，也可以向人民解释，配合报上的宣传。"

不久后，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这样，周恩来立即

致信吴努，郑重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项具体建议。这封信实际上也是对缅方2月4日来信的正式答复。

信中重申：

一、关于尖高山以北地区：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北直到底富山口的一段，可以按照双方共同谈定的习惯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向南至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界。至于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的面积，中国政府根据历史上可以依据的事实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等因素，提出具体建议，希望缅政府能够予以同情和考虑接受。

二、关于佧佤地区和勐卯三角地区：1941年6月18日由当时中英两国政府经过换文在佧佤地区划定的界限，是英国强加于中国而为中国人民所不满的，但是考虑到中缅两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除要求对这条线作某些调整以外，同意在佧佤地区基本上按照这条线定界。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整是把一直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如果缅甸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调整建议，中国政府愿意把属于中国而在1897年永租给英国管辖的勐卯三角地永久地移交给缅甸。

三、中缅边界公平合理解决后，建议两国签订一个新的边界条约，以代替一切旧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

一方要求维持边界现状，一方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双方思想上的差距一时难于接近，但是，周恩来一点不灰心，在后来的日子里，缅甸朋友多次到北京来协商，协商中有时难免出现争论，周恩来始终平静自若，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疏导，耐心协调双方思路，促使

对方进一步考虑，从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因此，边界问题虽然一时达不成一致意见，但缅甸朋友对周恩来始终充满敬意。正如一位缅甸朋友所说："同周总理共事是最愉快的，尽管他的意见总是占了上风，但使人心悦诚服。"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把两国友好关系推向一个高峰

由于种种原因，中缅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已经到了1960年。

这时，中印边界发生第一次冲突。为了树立一个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中缅双方加快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步伐。

1960年初，年轻的奈温将军来到北京。1月28日，周恩来和奈温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中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上签字。

接下来，双方加紧对边界的勘察工作。周恩来指示，要同缅方勘界人员友好协作，互相传播技术，共同总结经验，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要通过联合勘察搞联欢、搞友好。领导中方边界委员会工作的姚仲明后来回忆："由于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双方勘界人员始终在和谐的气氛中互相帮助、合作，勘界、划界、树桩等任务都完成得很圆满。"

在勘界过程中，周恩来十分注意教育参与工作的同志要尊重边境居民的民族感情。

由于中缅边界是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双方的部落关系、家庭关系、亲戚关系，盘根错节，所以，周恩来一再要求

他们处理好这个问题。周恩来指出，有的民族被边界线多年分割，这是历史所造成的，想加以改变是十分困难的，但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照顾其合理的愿望，设法做一定的调整，也是必要的。如佤族班洪、班老辖区的收回就是一例。

在“1941 年线”上，还有不少骑线寨。所谓骑线寨即是指一个村寨同一家族的人，由于住宅的位置不同，被划属两个国家，不仅日常生活不方便，也给双方的行政管理造成了不少困难，这是帝国主义埋下的纠纷祸根。1960 年，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开会前，周恩来对姚仲明说：对骑线寨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保持每个村寨的完整，分别划归给中方或缅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搞友谊。8 月 7 日，他在北戴河又向姚仲明提出：可采取交换或补贴的办法，注意切不可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关系。

由于双方的努力，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1960 年 10 月 1 日，喜气洋洋的北京又添一喜，周恩来同前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吴努总理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上签字，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61 年 1 月 4 日，是缅甸独立节。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赴缅甸参加庆祝活动，随同周恩来一起出访的还有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同时中国政府还派出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中缅边界委员会中方代表团、中国云南省代表团、中国佛教代表团，中国电影、新闻和体育代表团参加缅甸独立节的活动。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陈毅即兴赋诗一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表达了中国人民同缅甸人民之间深厚的“胞波”情谊。这次活动把两国友好关系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在缅甸期间，周恩来出席了中缅互换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缅甸总统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以表彰他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做出的杰出贡献。

伴随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国又分别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老挝等国经过和平谈判顺利解决边界问题，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

（廖心文）

宏伟的蓝图

——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

周恩来的经济论著，内容广泛而丰富，几乎论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54年9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这个概念，到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20多年间，在他所作的重要报告、讲话和文章中，对于四个现代化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问题，作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一次比一次内容更完整、更准确。尽管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经历过曲折和坎坷，但是，周恩来在组织领导国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以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却是一以贯之、锲而不舍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等，就对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家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问题，作过思考和论述。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提出过“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主张。他说：

>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还多次谈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1949 年 3 月 5 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 6 月 30 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工业化的问题。”

1949 年 9 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就是当时代行国家宪法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 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提法，仍然是建立

“工业国”或“实现国家工业化”。1952 年 8 月 11 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指出：

>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完成。”“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五年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

这个草案说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恢复，朝鲜停战已经在望，准备制定第一个经济建设计划。这个草案提到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1954 年 9 月 23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

> 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在这里，周恩来虽然已经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但对四个现代化的表述还不够完整、准确，更重要的是当时还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提出来的，而奋斗

目标仍然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1956年9月，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这个提法，被写进了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但是，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仍然是："实现工业化"。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工业化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什么是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解释说："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把四个现代化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

在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苏联为鉴戒，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自然包括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问题。1958年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从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角度，提出三个现代化："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把单一地提"现代化的工业国"，扩展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三者并提，标志着中共中央对确定国家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思路的转变。对于这个问题，1963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论述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目标时，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

> 国民经济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

显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提法前进了一步，但是还不够完整、准确，一是没有提出"国防现代化"，二是把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同工业、农业、科学并列。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确定，仍在继续探索中。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并且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在这里，毛泽东把周恩来在 1954 年 9 月提出的"现代化的国防"，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奋斗目标重新提了出来。至此，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已经形成。

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在讲到目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四项任务时提出：

> 我们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在组织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深切感受到科学技术的重大意义。1956年1月14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报告时，明确地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他一方面考虑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考虑到"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于是，他便把"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提法的改动，使得四个现代化的表述和内涵更加完整、更加科学。1960年2月，周恩来在边读边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这时，他已没有把"科学"与"文化"并提。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对四个现代化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他是这样说的：

> "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的重大意义。”“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表述，逐渐在全党全国达成共识，并且就此定型，沿用至今。随后，周恩来在两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四个现代化这个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1964 年 12 月 21 日和 22 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提议，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宣布：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时隔两年多之后，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四个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达 10 年之久。但是，在动乱的岁月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心

系“四化”大业。1974 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75 年 1 月 13 日，周恩来不顾重病缠身，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庄严重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号召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对于这次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叶剑英在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

> 1964 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 年，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重申了这个宏伟任务。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百折不挠地加以实现的奋斗目标。

叶剑英的这句话，表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周恩来在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四个现代化创造性地提出过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

周恩来在组织领导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吸取集体智慧，对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工业、农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作过一系列论述，创造性地提出过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现将其中的一些基本点概括论列如下。

关于工业现代化，周恩来曾经提出：（一）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二）“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农业和现代国防的发展，并且归根到底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三）“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四）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进而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建设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更符合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周恩来的这些理论观点，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所获得的认识成果。

关于农业现代化，早在1949年12月，周恩来就明确提出“农业为基础”的论断。他说：“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因为，“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围绕“农业为基础”这个论断，周恩来提出：（一）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二）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三）要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四）要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

来”。这些思想主张，是周恩来总结我国农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的理论概括。

关于国防现代化，周恩来从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国际和平与国内稳定的环境出发，十分重视现代化国防的社会保障功能。为此，他提出：（一）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是，“保卫和平，保卫建设，保卫祖国边防的和平环境”。（二）要“在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三）“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战用在战争上，不作战就可用在和平建设上，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四）“军民结合”和“平战结合”。军事工业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民用工业战时为战争服务。实践证明，用这些理论观点指导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卓有成效的。

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不仅对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有深切的认识，而且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作过精心构想，创造性地提出过一些独特的真知灼见。（一）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展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二）现代科学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我们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必须在这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三）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作斗争。”（四）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五）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通力合作，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周恩来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论述和他对科学技术所做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新时期，四个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展现出新的宏伟蓝图

明确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有过这样的先例。

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1978 年 11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战略决策，重申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 3 年、8 年规划和 23 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新时期，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高度，反复论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指出：

>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此后，邓小平还多次精辟论述过四个现代化问题。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1979年10月30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1980年1月16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强调："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同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邓小平这些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话，全面而深刻地

阐明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在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只限于四个现代化，而是一个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同步向前推进的历史过程。通常说的四个现代化，主要属于经济现代化的范畴。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四个现代化，而且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这个问题，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就作过论述。他是这样说的：

> “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十三大在制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时，对于奋斗目标是这样规定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把“富强、民主、文明”三者并提，并以“富强”为首，既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富

裕；又表明了要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之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更宽泛、更丰富，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四个现代化，也包括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因此，这条基本路线确定的奋斗目标，更加完整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周恩来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回顾他为确定四个现代化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为组织领导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敬仰之情，历久弥深。值得告慰于周恩来英灵的是：您为之奋斗终身的“四化”大业，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人民正在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再接再厉，努力奋斗！

总理回眸堪笑慰，“四化”已展新宏图。

（刘武生）

循循善诱，出以公心

——在“红卫兵运动”中

1966年夏秋，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爆发了一场“红卫兵运动”。这场运动，是在这一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全国的开端。

在“破四旧”的风潮里，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让周恩来意想不到的事情。身为几亿人口的一国总理，周恩来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红卫兵方面

8月18日，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国、震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的几万名“红卫兵”，并与首都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他不久前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进一步明确表示他对红卫兵的支持。8月18日这天，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端。

北京“八一八”大会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组织几乎一夜之间就遍布了城镇乡村。这些以“红五

类”出身为主体的青少年们，抱着“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使命和真诚愿望，不再停留在学校里搞运动，而是冲出校园，走上街头，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入社会，推向全国。

从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都出现了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他们先从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继而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在北京，红卫兵倡议把东西长安街改名“东方红大道”，并砸烂“全聚德”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在上海，红卫兵冲上南京路，拉倒“大世界”；在天津，红卫兵“革新”滨江道，更名“劝业场”……。由于舆论宣传的鼓动，短短几天内，“破四旧”的风潮便席卷中国大地。

然而，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却与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相伴而来：多处名胜古迹被捣毁、破坏，祖国千百年的文化遗产被洗劫废弃；肆意冲、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住宅，没收、毁坏私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乃至基层领导干部、普通教师实行人格侮辱、打骂、关押的行为更随处可见。更严重的是，一些红卫兵还把“破四旧”的目标对准宋庆龄、郭沫若等国内外享有名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舍、傅雷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了绝路，许多“黑五类”人员或被打致死，或强迫遣送回乡。……

周恩来极为关注北京和各地“红卫兵运动”的进展情况。对红卫兵“破旧立新”的一些举动和倡议，他并没有表现出由衷的热情。一次，当他得知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被改名“革命村”时，不以为然地说：“还是先叫中关村好，不然会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地方，我就不知道‘革命村’是哪里嘛！”而对

于举世闻名的国家重点文物古迹，他则尽力去设法保护。就在“八一八”接见大会后的当晚，他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立即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部署北京卫戍部队前往守护，使得这座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宫殿在“红卫兵运动”中得以保存。类似的情况，还有杭州灵隐寺等处。后来，周恩来告诉红卫兵：“破四旧”是个长期任务，中国的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传统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子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名目繁多的改名、命名活动直到国庆节前还不断出现。9月下旬，周恩来接到北京市委办公厅报告：北京34所中学红卫兵和外地学生组织起一个“东方红筹委会”，拟将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9月27日召开命名大会；同时把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搬走，另树立毛泽东铜像和英雄人物塑像等。周恩来26日在报告上批示：“请以电话告市委办公厅和周（荣鑫）秘书长，通过联络总站，告以这是国家大事，国际观瞻所系，他们可以关心，可以倡议，但不能由他们决定、命名。否则命名无效，岂不损失信誉?”

这一时期，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让周恩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尤其是“破四旧”当中出现的那些影响面大、涉及党和国家政策、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为此，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就这些问题当面向红卫兵加以劝说和引导。

鉴于红卫兵活动大都具有自发性、随意性的特点，周恩来首先考虑应把各种红卫兵组织起来，以便创造给他们做工作的机会和条件。

8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北京新市委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地点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由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在联络总站设有

办公室，周恩来委派周荣鑫总负责，以了解、沟通情况，及时发现各种问题。

两天之后，周恩来通过联络渠道得知，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倡议，把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并于29日召开20万人命名大会，会后还将举行大规模庆祝游行。为避免发生涉外纠纷，周恩来在28日夜里召集紧急会议，他向红卫兵说明：我们进行反修斗争，是靠文斗不是武斗。如果按你们的精神，把反修的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去，就要闯进大使馆，就有可能把文斗变成武斗。我们今天和苏联还有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关系，我们应该遵守这个关系，就如同他们在莫斯科尊重我们的大使馆一样。因此，你们可以在他们的门口搞示威，但要有个界限，不能闯入大使馆里去。经过反复做工作，大会组织者终于表示同意按周恩来提出的意见办。从29日起，群众游行持续了两天，共达40万人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最使周恩来感到不安的，还是“破四旧”中发生的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各类知名人士进行的侮辱、打骂、抄家等行为。他多次向红卫兵强调要学好用好《十六条》，其用意之一就是希望他们有所遵循，有所节制，严格遵守“要文斗，不要武斗”这起码的一条规定。但是，涉世不深、缺乏政策法律观念的青少年们已为狂热的“革命”激情所支配，“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几乎成了他们高于一切的信条和准则。

8月29日夜，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群红卫兵闯入了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肆意进行查抄。事后，章士钊立即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的无理行径，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次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接到批件，马上采取措施，对章宅实行保护，并将章本人秘密转移到301医院。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亲自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十几位高级民主人士，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人。这份名单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却包含了几百名保护对象。可以说，周恩来几乎对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费了一番心思，以寻求最稳妥的保护方法。

名单中的第一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宋庆龄。她不仅是国内外享有名望的民主人士，还是几十年来同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的挚友。建国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感到宋长住上海不安全，便劝说她来京定居，并指示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破四旧”当中，果然如周恩来所料，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受到冲击，就连万安公墓内宋父母的墓地也遭到红卫兵的破坏。此外，在南京，有人提出要推倒孙中山的铜像；在北京街头，则出现了攻击宋庆龄的大字报，还有人扬言要冲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的住地。为了阻止事态的继续发展，周恩来亲自出面教育对于历史知之甚少的红卫兵。在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下，宋庆龄及其住宅免遭厄运，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得以修复。

这一时期，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还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等民族宗教界人士和一些著名学者、艺术家、知名人士及其家属。

周恩来不仅向红卫兵讲述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有时还

要给红卫兵介绍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以劝说他们收回或改变违反科学认识和正常行为规范的主张和“倡议”。例如，为了向坚持要把交通信号改作“绿灯停、红灯行”的红卫兵解释清楚此举行不通的道理，周恩来先从专业人员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再做说服工作。他由光线的透射力谈起，进而说到国际间的通行惯例，等于给学生们补上了一堂光学物理课。再如，为了纠正某些学生组织提出的“消灭伊斯兰教”这种极端错误的口号，周恩来在调查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全中国有几千万、全世界有几亿伊斯兰教徒的基本事实为出发点，耐心向红卫兵讲述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等等，说明现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必要性、长期性。……

就这样，身为几亿人口的一国总理，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卫兵打交道、做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讲，从这时起，他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红卫兵方面。

在震动全国的“大串连”的狂澜中，各路红卫兵纷纷“南下”、“北上”、“东进”、“西征”。周恩来不分昼夜地向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们耐心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政策和国家法律

自8月下旬开始，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先后离京“南下”、“北上”、“东进”、“西征”，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与此同时，各地的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

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取首都红卫兵“造反”之“经”。至28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在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出入北京的学生人数更逐日递增。在这之后，每天来往北京的红卫兵成倍增加，已难以数计。为安排好来京红卫兵的吃住问题，周恩来想方设法，费尽了心思，最后就连中南海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住进了几千名红卫兵。到这一年11月下旬止，毛泽东共计8次接见来京串连的全国1100多万红卫兵。

在千方百计安排好来京红卫兵的日常生活、组织好毛泽东一次次接见活动的同时，周恩来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北京、向全国的红卫兵进一步讲解党的各项政策。

鉴于北京红卫兵“破四旧”中发生的种种情况，周恩来不难想象全国各地已经和即将要发生的各类问题。他这时的想法是，由党中央下达一份有关红卫兵的文件，以便对全国红卫兵的行动加以指导、约束。

8月底9月初，周恩来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共包括十条内容。《意见》强调：“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组织起来，学习和掌握政策”，“不能各自为战，违反纪律”。针对已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大串连风潮，周恩来这样写道：

> “我们提醒你们，实行革命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机密不致外泄，档案不致遗失，财产不受损失。要保证国家的专政工具正常行使职能。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扰。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我们还要提醒你们，同厂矿、科研机关和服务性行业实行革命

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

《意见》还就红卫兵的组织形式、斗争方法和策略等作出一些具体规定。

9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从8月下旬起，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该碰头会），讨论《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会上，陶铸、陈毅、王任重等都明确表示赞同向红卫兵讲政策。而康生却唱反调说：“十个问题，需不需要讲？我看有代替的危险。”姚文元也话中有话地提出：“应该用阶级分析讲政策。”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反对，这个《意见》稿最终还是夭折了。

尽管如此，周恩来仍没有放弃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教育、劝导的责任。就在《意见》稿被否定后不久，他连续出席离京、在京和来京的三种类型的红卫兵会议，针对实际情况和问题，耐心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政策和国家法律。

9月10日，他向离京奔赴各地的首都红卫兵提出：红卫兵应是一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战斗”指的是进行文斗而不是武斗；“学习”就是要做调查研究，要进行科学分析，要有冷静的头脑；“宣传”就是讲政策、讲实际、讲界限，不盲目行动，不强加于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机关，而工厂、农村、服务性的行业应由那里的干部群众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去进行必要的革命串连，但不能像在学校里一样，冲进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的秩序、建设的秩序。”“边疆的省

份，靠边境的城市、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很多政策，如对外的政策、民族的政策等。那里宗教信仰常常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人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即使改变也需要时间。”“总之，你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爱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他人士，甚至剥削阶级分子本身。”

同一天，周恩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党的干部问题时，他指出：

> “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里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中有正确的、积极的因素，不能说一切都是坏的。也不能说所有党政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都是，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在这些地方落空了吗？”“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画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也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更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即使不看作一切，而看作是绝大多数，也不合适，因为不合乎事实嘛。”

9月13日，周恩来更明确提出：“黑帮”这个名称不能乱用。“犯路线错误的是否就是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这么说，没有这个定义。”“去上海的同学问我，是否给上海市委去过电话，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我确实这样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是不革命

的。”

9月下旬，周恩来接见来京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三个红卫兵组织代表时，再次批驳了“黑帮”、“黑线”的说法，指出：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

这样，仅在9月份里，周恩来接见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就达20多（场）次，所谈内容涉及党的干部、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宗教、华侨、外事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性问题。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宣传场地，北京的一些大小礼堂和体育场馆里，都留下周恩来那不知疲倦的身影。

对于各地频繁发生的各种涉及政策法律的事情，周恩来更是不推不拖，亲自解决处理。9月19日，他对中央给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被批判、斗争对象工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稿作了修改，并将报告中“凡属定性的，暂时只发给其本人及需要由他供养的家属生活费”一句，改作：“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将报告中“凡未定性的，工资可暂发给”一句，改为：“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9月下旬，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反映一些地区连续发生的红卫兵违反政策的情况。关于上海问题，24日的信中告：“最严重和急迫的就是他们要在明（25）日举行带一二百资本家游街示众，市委劝阻无效。”为此，中央决定给上海市委和北京赴沪红卫兵发一紧急指示制止。26日的信中提出：“鉴于各地医院领导不少瘫痪，院中红卫兵对专家医生打击面过大，大家一致主张支持华东局的意见，并且认为医院红卫兵要做到自动取消为好。”

尽管青少年无知、狂热的行动使得周恩来负担加重，日夜操劳，他仍丝毫不减对后代的极端负责和真诚爱护的情感。9月9日，他直接与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绝食学生代表通电话：

> 我一直在等待你们！你们没吃饭、没治病，我怎么能睡觉啊？你们提出的问题都好商量，你们有权提出要求。有些是马上可以办的，有些要经过中央讨论，我不能马上回答。你们不吃饭，我们心里不安。在毛主席的新中国，怎么能绝食呢？我们不责怪你们，而是劝导你们。光凭这个热情，会得到你们所不希望的后果。你们要求把问题提到毛主席面前，要他考虑。你们从一方面看，他要从全局看；你们是从一个时侯看的，毛主席、党中央是从整个历史看的。很多问题不像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你们的要求，我接过来，但不能马上回答。这24位同学有意见，完全可以派代表来京面谈，我可以派飞机把你们送来。你们赶快治病，再不吃饭，我们心里就不安。

从第二天起的半个月内，周恩来一连4次接见西安绝食学生代表，耐心做他们的劝导工作。

周恩来不仅自己带头做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还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丢掉“怕”字，放下包袱，到群众里面去，亲自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劝阻违背政策和法律的极端行动，以体现党对运动的领导。同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还商定，为抓紧研究有关社会政策问题，先由各有关方面负责人组织收集材料，进行研究，提出问题和初步处理意见，而

后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

周恩来亲自向红卫兵宣讲解释党的政策，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致认为解决了很多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大量传抄、翻印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周恩来的讲话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周恩来的地位、声望，尤其是他入情入理、循循善诱、平等待人的讲话风格和处处体现出来的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胸怀，使许多青少年深受教育，得到启示。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周恩来多次强调：“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就犯过路线错误，但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学习”

面对“红卫兵运动”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周恩来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党内矛盾的性质，进而把握和处理好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问题。

还在8月间，周恩来在谈到工作组问题时，就多次提出，即便是犯了方针、路线的错误，也还要本着毛主席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指出其错误，帮助其改正。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心情一样，我代表他们，也代表我自己，向你们（指工作组所在单位群众）道歉。同时，我应该向你们说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央全会

（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

基于这一认识，周恩来反对在工作组及其他问题上对领导干部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以至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9月初，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议了《关于党政军高级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草案）》的文件稿，实际上是设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高中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在这以后，不论是和群众的谈话，还是主持制定有关文件，周恩来都一直坚持对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由群众组织来定性、“罢官”。

9月下旬，针对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的提问，周恩来强调：

> “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就犯过路线错误，但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学习。”“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时候犯了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和倾向的错误，只要他认识了，而又坚决改正，对这种人，党还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的。这样的人，在各级领导机构中都有。”“现中央、国务院各部正副部长36人停职反省，将来也要一分为二，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使是反党性质的，也还有走得很远的、有愿意革命的。犯了路线错误，主观上还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不能算敌我问题。”

为了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解决党内高、中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

上，陈伯达、林彪作主题发言，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代表人，并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刘、邓二人被迫再次检讨。通过这次会议，把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的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又在更大范围里重新提了出来，并且断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是刘少奇问题正日趋明朗化、公开化。为此，周恩来十分关注社会上对刘少奇和王光美问题的反应。10月11日，他嘱告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和公安部负责人，要他们分别派人察看北京几条主要街道上有关王光美的大字报，并将标题和简要内容抄回。12日，他又在清华红卫兵于当日发出的“彻底批判王光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会“请帖”上作批（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对刘少奇本人，周恩来这段时间内尤其注意和留心他在公开场合的露面问题。在周恩来亲自担任“总指挥”的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份，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各次的接见活动。其中，国庆节那天，经过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仍以国家元首身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

但是，随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断升温，刘少奇的问题终于被“捅”了出来。

10月18日，一些外地红卫兵在天安门前观礼台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标语口号。

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接见在天安门张贴标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回答他们有关刘少奇问题的提问。关于八大党章中未提“毛泽东思想”一事，周恩来说：

“八大党章中没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主席的提议。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次开代表大会都提。”当问及毛主席在党内是否是“少数”和“炮打司令部”问题时，周恩来答道：

> “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时就确立了。现在毛主席的威信是蒸蒸日上，谁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
> “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没有权利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把标语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主席的思想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针。”
> “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

就在周恩来多次劝阻红卫兵不要面对面斗争王光美和扩大刘少奇问题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多次煽惑红卫兵揪斗王光美，并主张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开化。

12月18日，张春桥私下召见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

负责人蒯大富，鼓动他把“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推向社会。几天之后，蒯大富组织清华大学5000多人上街游行，一时间，首都各主要街道到处可看到、听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即使这样，中央文革的几个头面人物仍不满足。27日，江青在对红卫兵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公然引导揭批刘少奇和王光美，称刘曾作过“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并表态“支持”红卫兵揪王光美回清华。

鉴于在北京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周恩来于12月底亲自召见清华“井冈山兵团”的11名代表，再次明确反对张贴“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指出：“这样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学生们问：“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周恩来回答：“那是你们这样认为，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周恩来还表示：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让她书面回答问题，这个事情我可以办。但不能涉及刘少奇的问题。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毕竟是有限的。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大肆鼓动下，整个形势继续朝着与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主观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1967年1月初，中南海周围开始集结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涂写标语，强烈要求“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批斗国务院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一时间，各种批判发言、声讨文章、“勒令书”、“请愿书”伴随着大量歌曲、口号，通过一只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就在中南海的西北角，和人来车往的大街仅一墙之隔。墙外无休止的喧嚣声，已使他连续几天无法正常休息工作了。为此，有人劝他暂时离开中南海，找

一处安静的地方办公、休息。周恩来回答："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1月5日清晨，周恩来来到国务院西门，劝说为"揪"陶铸在这里"蹲守"了一夜的学生们。他说："天气这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连毛主席都没法睡觉了！""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必须向主席请示，并且要经过党中央讨论。"

7日凌晨1时，周恩来中断正在进行的与南京学生的谈话，匆匆赶去接见"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再次阐明对陶铸问题的态度。指出：陶铸同志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还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同志的大会不合适，现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有关陶铸同志的材料，你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它们整理好，上交中央。周恩来的讲话，表明他并不赞成几天前陈伯达等人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做法。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他一贯主张应该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尤其不能背后搞鬼或当面搞侮辱人格的举动。

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严肃批评了清华大学红卫兵骗揪王光美的"一六"行径（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为达到把王光美带到该校批斗目的，编造出刘少奇女儿因车祸在医院手术的谎言，将刘少奇夫妇骗至医院，并带走王光美。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打电话给该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蒯大富，下令立即放人，并亲派秘书到清华催促放回王光美。），说：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我是不赞成这种作风的。这种坏作风不能提倡，这是背后搞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现在，

必须肃清这个坏作风。又指出：斗争王光美，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不要再扩大这个问题。这也是毛主席、政治局的意见。

……

在1966年秋冬的整整4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力挽狂澜，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无政府主义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破坏；同时，他的关心爱护与言传身教，也深深地启发、教育了广大青少年，促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思考、觉醒，并最终奋起向邪恶势力进行英勇战斗。

（安建设）

“于无声处”

——与1967年“二月抗争”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时刻，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给予愤怒斥责。老一辈革命家的壮举，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和人民向“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较量、大搏斗。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争”。

1967年“全面夺权”以后，全国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不能容忍党、国家和军队继续遭受破坏。一场正义的抗争已在酝酿之中

1967年1月的北京，隆冬时节，天寒地冻。

正当首都北京发生包围中南海、掀起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风潮的同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作为这场风暴开端的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首先爆发了一系列震撼全国的大事：1月初，《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强行夺取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

对“一月夺权”的首要目标中共上海市委，周恩来一直是信任和肯定的。“红卫兵运动”中，他曾几次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安亭事件”后，他仍设法维护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权威。但是，由于上海“一月夺权”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接着，各地纷纷仿效，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继“夺权”。《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等社论。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纷纷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被剥夺全部权力，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

周恩来从来不赞成把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领导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他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建国17年来党领导下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是主流，反对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他说：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他始终主张各地区、各部门所“夺”的只能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权，而不是党、政、财、文等业务之权。他明确反对夺中央要害部门的领导权，强调国防、外交、公安、财政的大权属于中央，群众组织不能夺。他还宣布：我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

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承认。

尽管如此，周恩来这一时期并没有也不可能发表反对上海“一月夺权”或否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指导思想的言论，甚至在口头上还表示过支持，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但随着“全面夺权”的迅速蔓延，它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纷纷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乃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量流血事件；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5个月前开始的“红卫兵运动”，难以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理解和接受；那么，这时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更不能不遇到各种抗争。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下，不赞成“左”的一套做法的抵抗方式不少是悲剧性的。

1966年底，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因为抗议江青一伙的迫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7年1月，在“造反”、“夺权”的狂涛中，竟连续发生党、政、军高层领导人的“非正常死亡”，他们中包括：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8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21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22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29日）等。当周恩来得知张霖之惨死于造反派凌辱和毒打之下时，陷于极度悲愤之

中。他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在场的人们清楚地看到：周总理是"眼含泪水，手持张霖之遍体伤痕的照片"讲这番话的；"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1月下旬，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严厉地批评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指出：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又说：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10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果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1月底，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面临"夺权"威胁时，周恩来明确宣布：华北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他当场质问造反派："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他还批评铁道部的造反派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对老干部不要笼而统之一概打倒。现在你们是大民主与个人独断结合在一起，这样脱离群众会走向反面的。

以上所述，不仅是当时周恩来个人处境和心境的真实反映，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在同一时期内的思想轨迹和心态。正是在这种共同的背景下，加上随后而来的全面"夺权"导致的空前混乱，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1967年2月党内健康力量的不屈抗争。

在中南海怀仁堂，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一边是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几位老帅，另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关于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由此爆发了

在全面“夺权”中发生的一个新情况是，由于军队介入地方运动，使各级军事机关也受到了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严重的冲击。尽管中央明令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但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被认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满。在军队内部，也开始产生派性，并出现分化。

1月19日、20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内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运动。他们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会后，叶剑英向周恩来汇报了有关情况。在他们的努力下，产生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注：这个文件是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与周恩来商讨、修改后，由毛泽东批准下达的。其中最主要内容是：军队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得随意抓人、抄家、搞武斗；一切外出串连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单位；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等。）等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

28日，中央军委颁发了这个命令。31日，周恩来向军队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八条命令》，指出：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闹革命，不能擅离职守；对军事机关和战备系统不能冲击；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

“大闹京西宾馆”，成为“一月夺权”以来在党内高层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抗争的序幕。

2月2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周恩来所以要提出第二项提议（即召开怀仁堂碰头会），是因为在1月中旬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他力图在这种非常状态下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决定党和国家经常工作中的大事。而中央文革小组的钓鱼台碰头会，主要是商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这时仍然想把“文化大革命”和党政的经常工作分开，以免各项业务工作受到干扰。

然而，在全面“夺权”的形势下，各项业务工作已不可能再正常地进行下去。许多被“夺权”的地区和部门出现的空前混乱的局面，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怀仁堂碰头会上发生的对立双方的直接冲突已不可避免。

从2月7日（星期二）起，由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

按计划隔日举行一次。在会议上，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强烈地抨击“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主要成员提出责问。

11日会上，叶剑英站起来大声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聂荣臻还针对江青一伙的做法提出抗议：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怀仁堂会上的这些责问，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

就在这时，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两次致信周恩来，建议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一方面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实际上是设法保护这些在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老同志。周恩来立刻表示赞同，并报毛泽东批准。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达到高潮。这一天碰头会的原定议程是：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提）；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性规定等共六件）。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正为陈丕显不能如期来京“休息”而怒气未消的谭震林便向张春桥等人质问：不要党的领

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声明：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接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先后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中任意批斗、迫害老干部的极端行为表示强烈愤慨。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制止他们言词激烈的发言。历时3个多小时的会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当然，从周恩来所处地位来说，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那些老同志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事实上，就在“大闹怀仁堂”前后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在许多别的场合也接连发表了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论，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有所区别。

关于党的领导，他反复强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他提出：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要恢复，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

关于对待干部，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

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他愤怒地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关于稳定军队，他指出：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大闹怀仁堂”的当天晚上，余怒未消的陈毅又在外交部的一个群众场合发表长达七个小时的演讲，继续猛烈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卑劣行径。他极其尖锐地提出：

>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指在座造反派代表）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的这段讲话，代表了参与和支持“二月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声，凝聚了他们对眼前危难时局的痛苦而深刻的思考。

第二天，谭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其“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并表示：要“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面对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义之举，中央文革小组的

几个头面人物无言以对，惊恐异常。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并由张、姚二人当面向毛泽东汇报。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并就怀仁堂碰头会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谭、徐等。

周恩来又一次面临困境：一边是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并在盛怒中的毛泽东，另一边是在思想感情上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周恩来已没有回旋余地。他深深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已经把话说绝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只剩下这一种选择，并且，他还必须说服其他人作出同样的选择。几天里，周恩来连续约几位老同志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准备检讨错误，接受批评。2月下旬至3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检讨，为其他人承担责任。而康生、谢富治等对谭震林等横加指责，无限上纲，把他们的正义抗争诬为“二月逆流”。

“政治生活批评会”后，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被剥夺出席会议的资格。周恩来的处境愈加困难了。

作为集战友、上级、师长于一身的周恩来，在竭力劝说参与“两个大闹”的老同志们偃旗息鼓的同时，又处处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设法保护这些老同志

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失利后，处境困难而地位特殊的周恩来，发挥了他人所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周恩来利用自己并未因所谓“二月逆流”失去发言权的条件，在某些重要场合继续就“抗争三原则”坚持其一贯观点。2月20日下午，就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受到指责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当着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康生等人的面阐明对地方夺权问题的看法，指出：自从1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十七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夺权问题，他强调：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他提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他重申：前一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这股风是错误的，要赶快扭

转过来；军队内部搞造反、夺权，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会上，周恩来还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提出异议，他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人人搞过关，人人是“顽固”，所以不增加质量，增加了数量，成为另外一个标准。

在这前后，周恩来还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阻止已经泛滥成灾的“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和口号：2月18日，他将《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该社论强调指出：把当权派一概打倒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送审稿报送毛泽东，提出：“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3月1日，该社论经毛泽东批准发表。2月19日，周恩来又对某材料中提出的旨在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上揪下扫”的口号提出质疑，并为此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作为集战友、上级、师长于一身的周恩来，在竭力劝说参与“两个大闹”的老同志们偃旗息鼓的同时，却又处处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设法保护这些老同志。

一是周恩来从不否认自己同几位犯“错误”的老同志的密切关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对此，周恩来并不介意，批示同意将其在会上印发。之后，在几次谈到“保”这些老同志时，周恩来更是一次次“联系”到自己：对陈毅、谭震林我“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就在社会上已有人提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的同时，他甚至当着造

反派的面，公开讲：批判“二月逆流”，“也联系到我”；承认他自己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也是不理解的，没有料到这种局面。周恩来的这些举动，再明显不过地表示出他内心的“意向”。

二是周恩来尽可能地将几位老同志的“错误”“淡化”。就在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毛泽东指责“二月逆流”之机对老同志们无限上纲、横加罪名的时候，周恩来却每每把“错误”往“思想认识”、“对群众态度”等方面引导，意在犯“错”难免，大事化小。一次，他曾亲笔改“二月逆流”提法为“二月的乱子”，凡提及几位老同志时均加上“同志”二字。1967 年 4 月，在“政治生活批评会”后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几位老同志对二月之事所作的自我批评逐一表示认可，认为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有些虽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有所进步，应进一步创造机会，给以帮助，先行改正，以观后效。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强行对“二月逆流”定性以后，他还多次讲到，不能把这些老同志的所作所为都一概否定，他们有许多话是根据中央政策讲的，对他们还要“一批、二保、三看”。

三是周恩来不忘在关键时候“提醒”老同志们不要在思想上放松戒备，给林彪、江青一伙以可乘之机。1967 年的五一节，是“全面夺权”、“天下大乱”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按当时惯例，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亮相”。能否上天安门，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经周恩来努力，毛泽东批准，所有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在五一那天登上天安门。一时间这种表面上“团结”的气氛掩盖了几个月前党内的激烈较量，有的老同志因心情好转而思想上放松下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 5 月 5 日亲笔致信陈

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信中，周恩来一反过去平等、商量的口吻，语气强硬，措词严厉；然而，他正是想以这种极其罕见的方式，来“警醒”他的战友们切不可大意，以致产生思想错觉，把“二月逆流”一事看得太轻了。果然，后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上，中央文革一伙人重又煽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并借党的合法会议名义对二月抗争作出污蔑性的“定性”。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周恩来预先的判断。九大召开前后，周恩来对老同志们的情况尤为关注。1968 年底，当获悉一位老帅遭到批判后，他即批示有关单位进行劝阻，强调“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党的九大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指责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对此，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1971 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不久，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这时，在二月抗争中与老同志们“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江青一伙人仍在台上。尽管条件有限，周恩来却利用一切场合，不失时机地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

同年 10 月初，经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建议、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等均担起重任。之后，周恩来又委托李富春等老同志参加和领导有关批判林彪的学习会、座谈会；与此同时，陈毅、聂荣臻等老帅也纷纷起来揭发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

1972 年 1 月，陈毅不幸病逝。经周恩来周密组织安排，

陈毅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影响深远；尤其是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的举动，给包括参加二月抗争者在内的所有老同志以极大慰藉。

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亲笔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后经毛泽东批准，谭震林从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周恩来又一再批嘱外事部门：有关外事活动场合应多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并多次亲笔添加上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为这些老同志的复出广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除陈毅先期病逝外，参加1967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全部被选入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此，所谓“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实上得到平反，从此不再提及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评价，也包括并适用于1967年二月抗争中的周恩来。

（安建设）

大雪青松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1967年春夏，是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寒冷的季节，中国与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5月22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强烈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我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

5月27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蒙古当局制造的反华法西斯暴行；

6月10日，我外交部照会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保加利亚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6月17日，我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袭击我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6月28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使馆等暴行；

7月1日，我外交部又向缅驻华大使转交我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无理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该国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7月1日，我外交部照会肯尼亚驻华大使馆，抗议肯尼亚政府无理宣布我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7月27日，我外交部照会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抗议捷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8月6日，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和暴徒又一次袭击我驻印尼大使馆的暴行；

8月14日、20日，我外交部先后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在一些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香港爱国报纸的停刊令……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件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远的历史

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几年之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在与奈温的谈话中，周恩来提到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

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总理1971年8月间的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中国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

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要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名噪一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公然违抗周恩来关于“外交大权在中央，谁也不能夺”的指示，煽动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周恩来以身作“盾”，屡屡保护外交部长陈毅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〇”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

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做“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

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外交部长）陈毅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来，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7月22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古脑

地和盘托出：

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

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十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注：指此前造反派多次攻击并责难保护陈毅的周恩来的言行），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三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于几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光荣负伤、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陈毅，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对这些，造反派都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午后1时，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阴下还觉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总理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撤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而被“王八七”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

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理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老总临时藏入一盥洗室内，在场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紧急向总理报告情况。傍晚时分，由总理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的战士迅速开来，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总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

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的行径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八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总理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

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至晚间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在会见一批正来访的外宾时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主张对他少“炮轰”，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果断处置了“王、关、戚”，拆去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 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路；并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

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

倒台，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

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插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个“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总理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下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总理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总理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他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28日下午5时，整整36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总理因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30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留在台上。在结束王、关二人政治生命的会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还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9月4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就在这次会上，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毫

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春）。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

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

> 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

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1967年9月30日晚，陈毅出现在周总理主持的国庆18周年招待会上；

10月1日上午，陈毅与其他“二月逆流”的副总理和老帅们一起登上天安门；

11月6日下午，陈毅陪同周总理来到北京东郊机场迎接

归来的我援外专家；

11月30日，陈毅外长又与周总理联名电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独立；

……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元帅于1960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像这不朽的诗句一样，周恩来、陈毅这两位开创新中国外交基业的历史巨人，将永远与人民共和国同在，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同在。

（安建设）

“疾风知劲草”

——从庐山会议到林彪事件

筹备四届人大期间，林彪出人意料地提出让已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与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1970年春，“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3月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政治局还商定近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对此，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准以上中央部署，林彪也表示赞同。

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全都顺利通过。

不久，林彪突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仍然建议由

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林彪还特别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

林彪的“建议”，乍看起来似乎颇有些费解。其实，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还应设国家主席。

如果纯粹是就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发表意见，林彪的“建议”应该说是无可指摘的。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林彪确实另有打算。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建议”之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毛泽东没有考虑让董必武以外的其他人当“国家主席”。

4月12日，就在林彪传来电话记录的第二天，已访朝回京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当中央政治局讨论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于即日批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泽东又多次明确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但林彪仍继续坚持原来的主张。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与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同年五六月间，周恩来一直陷于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之中。直到7月份，四届人大的筹备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

7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并确定了党中央为此进行工作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8月20日，将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有关文件起草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8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国庆节之前，举行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

然而，讨论修改宪法会议上的一场风波，打破了几个月来的“平静”。

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的文字修改问题。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稿中有关提法发生争论。张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据，提议删去原草案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对此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细谈了争吵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随即，吴又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

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作最后定稿。会前，在北戴河的叶群曾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天才”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上同张春桥等作“斗争”。周恩来也对会议将发生“激烈争论”有所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未发一言，宪法草案稿被顺利通过。

于是，周恩来开始部署即将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但这时的林彪却暗中吩咐黄永胜、吴法宪：要多小心，这件事（即同张春桥等的争论）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在党内高层发生的这起“文字”争论的背后，正孕育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林彪、江青这两个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宗派势力之间长期掩盖着的矛盾，到这时终于露出端倪，由暗斗转入明争了。

这实际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的前奏。

庐山会议上，长期以来一直勾心斗角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冲突白热化。毛泽东识破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的企图，点名批判了带头发难的陈伯达

1970年秋，江西庐山。群峦叠翠，雾海苍茫。

8月20日前后，位于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格外繁忙，马达昼夜轰鸣，一架架飞机在这里频繁起落，来往如梭。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将于8月下旬在庐山开幕。这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到会共计253人。

8月20日下午，在接待完两批外宾之后，周恩来登上飞机，直飞九江机场。傍晚时分，抵达庐山。周恩来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他住在当年马歇尔下榻的一幢小楼里。第二天，周恩来就全会议程问题书面报告毛泽东和林彪。然后，分别前往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22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他住地牯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会期、日程、分组等事。谈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时，会上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认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陈伯达、林彪也先后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对此，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说：设国家主席，

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这是毛泽东自1970年春以来第四次提出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毛泽东还似乎是有所指地告诫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23日下午4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首先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随即，林彪作长篇讲话。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林彪还喋喋不休地重复了许多他过去称颂毛泽东的那些"名言"。而这些话，正是毛泽东审改文章时多次删去的内容。

为了开幕会上的这个"开场白"，林彪事前做了准备。他的一份讲稿就拿在他手里。而发言的事，林彪一直没打招呼，是到开会前一刻，他才突然提出来的。

在林彪讲完后，康生作了一个表态性发言，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

原定讲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没有在开幕式上发言。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分组讨论宪

法草案和计划问题。这时，吴法宪提出：全会各小组应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先听林的讲话录音。对此，江青、张春桥等都没有表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就在这天夜里，根据会前林彪的布置，陈伯达、吴法宪两人连夜搞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关于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送交会议秘书处打印。这件事毛泽东、周恩来都不知道。

从24日下午起，全会各组开始讨论林彪的讲话。在林彪授意、叶群布置下，陈伯达（华北组）、吴法宪（西南组）、叶群（中南组）、李作鹏（中南组）、邱会作（西北组）等人按照商量好的口径，带头宣讲“天才”问题，吹捧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同时，暗示有人“反对”毛主席。在六个组的讨论当中，尤以华北组最为激烈，陈伯达富有煽动性的发言，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25日，华北组简报印发。整个全会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各组一致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中午时分，已是惊恐万状的张春桥、姚文元由江青带着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

下午3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前，毛泽东先与前来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逐一谈话。随后，毛泽东向到会的其他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还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应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

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毛泽东的指示，给了颇有些得意忘形的林彪一伙当头一棒。林彪在私下里传话说，告诉他们，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再提“天才”了。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法宪等人检讨时，林却向吴打气：“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更直接把话向吴挑明了：“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在小组会休会的几天里，周恩来连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并频繁地找人谈话（包括林彪在内），以敦促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检讨。

29日，尽管极不情愿，林彪还是出面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的检讨。周恩来在会上说：从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毛主席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同志作初步的检讨。他还强调：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先后作了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很不像样子。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点名批判陈伯达，指出：

这份称“天才”的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这篇几百字的檄文，以犀利的笔锋，彻底揭破了陈伯达伪装多年的“政治理论家”的面具，使他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暴露于众。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对林彪一伙宗派活动的沉重打击和严厉警告。出于各种原因，毛泽东在批陈的同时没有涉及林彪，并实际上对林采取了某些保护措施。

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后，各组开始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几天里，周恩来先后参加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小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说：《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虽然陈伯达的问题被揭出来了，但全会已不可能再按计划讨论原定议程了。会议结束前，周恩来继续不分昼夜地工作，找人谈话、修改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以及全会公报等文件。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基本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同时，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毛泽东、周恩来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帮助，不但没有使他们幡然悔过，反而引起林彪一伙的忌恨，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

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开始主动纠正文化宣传领域包括对外工作中某些“左”的倾向。同时，他还对庐山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作了初步调查，批评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9月下旬，周恩来建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想通之后，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出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并说，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10月中旬，对庐山一事抓住不放的毛泽东先后就吴法宪、叶群二人检讨作出批示，严厉批评吴、叶及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在庐山会议上“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毛泽东、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几个成员的批评教育，是认真的、严厉的，同时又是坦诚的、负责任的。在这个时候，林

彪的态度实际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林彪却一直在敷衍毛泽东和周恩来，始终不作自我批评；而黄永胜等人也一字不提林彪的错误和责任。这一年5月间由林立果、周宇驰秘密组建并得到林彪接见的空军司令部“调研小组”，恰在这时被改为“联合舰队”，叶群还亲自为其骨干成员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称呼代号。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正悄悄地朝着更复杂、更严峻的局面发展。

在批评、纠正林彪等人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也还是本着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能够“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为此，党中央先后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党内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毛泽东、周恩来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帮助，不但没有使他们幡然悔过，反而引起林彪一伙的忌恨。那个军委办事组的“后台”、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发难的林彪，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便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作检讨。1971年3月间，在苏州的林彪以南唐李煜亡国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警示林立果等人，不能“束手待毙”，要搞一个武装计划。

根据林彪授意，林立果一伙在上海秘密制定出一份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以“武装起义”方式，一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实施这个《纪要》，林立果等人多次开会研究，暗中进行策划。到3月底，已初步确定出“作战”的指挥系统和具体人员分工。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出笼，标志着林彪这伙党内宗派势力，决心与党和人民为敌，成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结束后，又过了两个多月“平静”的日子。

7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回北戴河。前往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

几乎就在林彪离京的同时，中南海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断。

7月9日中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当晚，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听取周恩来和才调任总参谋部不久的熊向晖关于基辛格访华事的汇报。正式汇报前，毛泽东“顺便”向熊向晖了解到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一些情况，尤其是黄永胜等人严密封锁在庐山会议期间所犯错误真相，并全部扣压了中央下发的他们几个人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拒不向下传达。

毛泽东据此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过了一个月，实际一直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访问，需离京四天时间。行前，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8月12日，从广州返京的周恩来面见毛泽东，请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间。毛提出可在国庆节后开四届人大。当天晚上，周恩来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两天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

经过庐山会议以来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从大量的揭发材料中觉察出，林彪等人的所作所为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一些省走一走，边调查、边“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

三中全会做准备。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讲述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揭露和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背地支持他们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一系列阴谋活动。

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亲自阅改过的他和华国锋追记的毛沿途谈话内容稿各一份专送周恩来。这时，毛泽东已到达杭州。这里是毛泽东建国后最常来的地方。然而，风光依旧的西子湖畔，此时正布满杀机。参与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杭州地区的头目陈励耘，不仅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也担负着毛泽东住地的警卫工作。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危险。

在一路向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吹风”的同时，毛泽东已觉察到林彪一伙的不正常活动情况。他及时给北京的周恩来通报沿途谈话内容，说明他对事情已作了最坏打算。

两天后，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得知毛泽东在这里的谈话内容，李当即形成三点“印象”：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上纲比过去更高了，矛头似乎指向林彪。

一直把自己与林彪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李作鹏、黄永胜，迫不及待地将此情况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进而促使林彪一伙铤而走险。

9月5日、6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终于获悉毛泽东进一步揭露、批评他们宗派活动的谈话要点。被毛泽东识破鬼蜮伎俩的林彪一伙惊恐异常，经过密谋策划，他们作出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

中，继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据此手令，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分别向其"联合舰队"成员下达部署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并指派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为"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及其同伙企图用这样一些手段谋害毛泽东：用火焰喷射器或"四〇"火箭筒烧、打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车处旁的油库；派王维国（在上海指挥政变头目之一）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有关行动方案，林立果曾报告给林彪和叶群。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人还研究了"北线"计划，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对象包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此外，也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这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政变行动计划！自然，这一切都是以极其诡秘的方式进行的。这伙阴谋分子不会、也不敢把他们的计划公之于众。他们是孤立和虚弱的。

林彪一伙政变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折戟沉沙在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周恩来机智果断地组织领导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重大斗争

初秋的古都，气爽宜人。"坐镇"北京的周恩来，仍然如往常那样，有条不紊地领导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9月6

日起，他每天都在人民大会堂里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10日，在对报告稿亲作修改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已写出初稿，拟从11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以10天时间改好送审。信中还就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作了请示。毛泽东阅后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显然，毛泽东对中央的人事调整已有所考虑。

10日中午，对林彪一伙已有警觉的毛泽东下令专列开赴上海。随即，专列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直驶北京。12日午后，专列抵达北京。旅途劳累的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当汪东兴将毛泽东回京的消息报告周恩来时，因事出突然，周恩来不解地问汪："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东兴后来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人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进而打乱了林彪一伙反革命政变的部署。为此，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根据这一计划，他们安排了几架飞往广州的飞机，其中一架256号"三叉戟"，是林彪的专机，于12日傍晚秘密调到山海关机场，供林彪一家使用。

这天晚上，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

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四周玻璃窗都紧闭着，并拉上了深色帷幕。朝东靠广场方向的窗户旁边，放着一排长方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周恩来背朝广场方向，正全神贯注于会场的讨论。这时，天安门广场上为国庆游行进行队列操练的红卫兵仍未散去，高音喇叭播放的乐曲隐约可闻。

22时许，工作人员请周恩来接电话。大约半小时后，周恩来回到会场，讨论继续进行。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出去又接电话，这次，他很久都没有回来。

周恩来接的第一个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汪报告：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获悉林彪等人打算离北戴河出走，去向不明。这是根据林彪之女林立衡汇报得知的。周恩来当即指示警卫部队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从第二个电话里，周恩来了解到有一架专机正停候在山海关机场，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马上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来，要求他立即查明山海关飞机的情况。

在证实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专机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询问飞机的情况，并提出打算亲往北戴河见林彪。这时已是深夜23时30分。

作贼心虚的叶群一面敷衍飞机之事，一面又竭力阻止周恩来前来北戴河。因周恩来通过几条渠道追查停留山海关的飞机，林彪一伙感觉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恐难以实现，便孤注一掷，决计北叛国外。

23时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在慌乱中钻入一辆“红旗”高级防弹轿车，冲过警卫部队阻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驶往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一伙匆忙登机，在副驾驶、领航员、报务员都未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

此时已是9月13日0时32分。

周恩来在“三叉戟”起飞不久便接到了报告。在这之前，他曾以这架飞机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指令，试图阻止该机起飞。但因李作鹏有意篡改命令而未能奏效。

对林彪等人突然乘机离去的意图，暂时还是个未知数。为此，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各方面掌握情况。随后，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要林彪等人飞回来，告以："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林彪座机不予回答。

在空军司令部的李德生通过专线电话，不断将林彪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当飞机飞临中蒙边境时，李德生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周恩来告诉李：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凌晨1时50分，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上空。这伙阴谋家叛党叛国的嘴脸最终暴露无遗。

中共党内惟一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叛逃了！——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它毕竟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眼前。

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毅然担起领导全党全军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重任。

首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各种情况的应变措施。

随即，从13日清晨至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在电话里，他使用的是斟酌过的特别话语，把事情说得既清楚又含蓄："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

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将李先念、华国锋等分别派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以便随时掌握、报告情况。

他特别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应对方案。

周恩来还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一起，与总参谋部负责人共同拟定出下发全军的紧急战备指示，并对北京地区部队部署、京郊各机场军管以及机动兵力安排等进行布置。

13日上午，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北京地区空军将林彪党羽周宇驰、于新野等劫持的一架直升飞机迫降在京郊怀柔县境内，从飞机上缴获了林彪一伙阴谋政变的大量罪证，为后来查清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至9月14日下午，待各项必要的工作部署完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劳作达50多个小时。疲惫至极的周恩来刚休息一会儿，便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特急报告，从中获悉林彪一伙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

异常的兴奋，驱走了周恩来的困乏。他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说罢，亲往毛泽东处报告这一消息。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确实死了。当256号飞机飞临蒙古境内温都尔汗时，因油料不足，飞机进行迫降，随即机身擦地起火，机上人员全部摔出，焚烧致死。

9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宣布将10天来一直拒不坦白交待问题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

果在各地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

不久，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逐级传达到全党全国，正式宣布：“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九一三”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中国，震动了世界。

（安建设）

整顿的先声

——领导批判极左思潮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持续近两年之久。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在可能的条件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阻止和减少它的破坏，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使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困境并有所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斗争的展开：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全面展开。这一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

施、生效。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周恩来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林彪事件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进而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会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的制定，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力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愿望。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1971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1971年12月26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指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周恩来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1972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尖锐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他的指示要求，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改进。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讲话精神，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是对农村长期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纠正。

1971年12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过去党的正确方针，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不肃清这一极左思潮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一大批干部就站不出来，就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刚过不久，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提出批评。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据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还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来也尽一切努力，以挽回损失。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就在这次追悼会上，周恩来暗示陈毅的亲属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以扩大影响，广造舆论。在此之前，周恩来还曾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公开露面。这一年1月下旬，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叶剑英副主席已主持军委工作，对再讲“二月逆流”的话，要进行批驳。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十天内相继去世。这一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党的干部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实。他一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同时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经他修改后发表。这篇社论重申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自1972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站出来，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

不断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加紧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他反复强调：过去，林彪造成了极左思潮、形式主义，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不抓训练；现在是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来尖锐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开展。

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条战线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不能不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极端仇恨。1972年初，张春桥就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百般刁难，阻挠下发。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坚持与否定“左”的错误的斗争也必然更加激烈。

斗争的深入：周恩来力主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并亲自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入手，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此

前，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的顾虑和障碍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讲话贯穿了“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

> “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

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即周恩来多次使用“批透”一语）的意图。为进一步启发人们的认识，他反复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些单位反倾向斗争没有突出批“左”重点，

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动各条战线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亲自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7月14日，根据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拔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3日，周恩来又就周培源反映北大教师思想状况的来信指示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要以该信“作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强调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几天后，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十八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并提醒“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在抓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

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使得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要拔掉钉子，就是拔掉我们。”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其间，《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一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集中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看了这些文章后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更是露骨地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一伙还一再查问文章的“背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这年11月间，《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文章，江青集团借机在人民日报社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这样，在坚持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同年11月底，双方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彼此“摊牌”的程度。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评和肃清，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

革命外交路线。11月30日，周恩来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他一方面诡称“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又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对报告的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由于张春桥、江青的反对，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重新修改起草《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删去了原报告写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语。但仍强调“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的修改报告。

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对外事会议报告所作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批示，表明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成为1972年前后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当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出于对江青集团大反“右倾回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一系列做法的不满，于12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封信在客观上促使毛泽东出面，对激烈交锋的两种不同意见进行最后裁决。

作为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赞同周恩来的意见的。12月17日，他在与张春

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信中的观点不对，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这是毛泽东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是有恃无恐，公开向周恩来发难。1973 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明确提出，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在运动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许涉及其他。这样，就等于给江青集团在批林中免被揭露上了“保险”，为其后的进一步反扑开了“绿灯”。

斗争的继续：毛泽东的“裁定”使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仍在继续进行

尽管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1973 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进行。

1973 年 2 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指出：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1972年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并重申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会上，全国28个省市均对文件表示赞成，惟独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的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遭否定后，江青集团得志猖狂的嚣张气焰。

同时，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外事干部学习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批评“以我为核心”、“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及其给对外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和破坏。这就在实际上支持和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否定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谬论。

3月4日，周恩来在召集一些外事单位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不少单位在对待外国专家方面仍存在的排外主义、民族歧视等错误倾向提出批评，指出“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判后，我们就主动”；“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认错误，不要怕这样

做又要犯右的错误”。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一伙给予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遭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当场率先作出自我批评，使得到场的外国专家深受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当时“大闹怀仁堂”事件“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同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提出让王稼祥“做外事调研工作”的意见，获准。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周恩来先后指示解除对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人的监护，并设法让董必武、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等一批老同志多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此外，周恩来再次提出要改善监狱待遇，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注：此语为毛泽东原话，周恩来在关于改善监狱待遇问题的一封信中加以引用。）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当天，根据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成为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自1971年底以来，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持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斗争，由于符合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得到绝大

多数人的支持、拥护，但同时也遭到江青集团愈来愈凶猛的反扑。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所谓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其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周恩来及其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此，周恩来虽然坚持斗争，但毕竟已力不从心，致使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不得不因连连受阻而开始进入尾声。

在党的十大上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向周恩来进行反扑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迟群一伙在清华大学搞的所谓“三个月运动”。这年10月至12月间，在迟群等人的操纵下，清华园内掀起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的“反回潮”运动。运动中，迟群一伙挥舞“裴多菲俱乐部”、“自由论坛”、“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的棍棒，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这场运动，严重地影响到北京和外省市的许多院校，使周恩来呕心沥血恢复教育系统正常工作的努力遭到破坏。

在此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中，心怀叵测的江青等人蓄意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诬蔑、中伤，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5年，以邓小平为代表

的党内健康力量，在1972年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把握时机，重整旗鼓，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一伙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安建设）

春华秋实

——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

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年代里，使周恩来感到欣慰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局面，特别是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这三件在1971年10月到1972年9月间相继发生的大事，对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在打开外交新格局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毛泽东、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和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杰作

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在70年代初出现重要的转折，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其实，这是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那时候，苏联正在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展势力，中国

又已成为国际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美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增强它同苏联抗衡的力量。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也便于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

1969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筹划新的外交战略、进而逐步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看到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离席，便尾随跟出，试图同中方搭话。不料对方却走出会场，坐进轿车，准备离开。美国大使情急中不顾外交礼仪，一把拉住对方，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中方人员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匆离去。

周恩来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电文，立刻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在这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已敏锐地察觉到尼克松发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号，包括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反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国的建议、下令停止美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为此，周恩来曾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2月4日，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关于释放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的报告，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这也是发出的一个回应信号。几天以后，斯托塞尔应邀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同中国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使馆的美国大使。12月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终于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所在。恰当地处理这个问

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曾明确提出："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1970年，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华访问，并带来尼克松关于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尼克松尽管一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行高级会晤，却对中方表明的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仍避而不谈。为此，周恩来回答叶海亚时又一次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

同年12月，毛泽东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告诉斯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合影的照片，以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赞成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信息。

这样，举行中美高级会晤的条件已渐趋成熟，等待着实现一次重大突破。

1971年2月，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

谈纪要在北京签字。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正式向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名参赛。

同年3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完毕。14日夜，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中国队赴日参赛问题的汇报。针对体委内部又出现去和不去两种不同意见，周恩来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边说边用铅笔当场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写完后，马上要秘书将报告发出。15日一早，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体委："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月28日至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一举荣获四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4月3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4日，周恩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在7日作出邀请美队访华的决定。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当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宣布这一富有象征性含义的消息后，立刻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消息，报道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动地球"的戏剧性效果，加快了实现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尽管美方仍在回避中美会谈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但它明白这个问题在会谈时是无法回避的，并且已在对来华的具体工作做出安排，表现出积极认真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开始就中美会谈的方针进行准备。

5月25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的答复口信。第二天，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2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6月2日，尼克松接到口信后兴高采烈，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7月9日中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有关人员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个小时。在这期间，73岁的周恩来同这位48岁的博士举行了六次总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时间等进行磋商。周恩来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前访华，并确定中美之间今后改用巴黎的秘密联络渠道。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

“中国和美国在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

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11日午后，基辛格一行乘机返回巴基斯坦。两天前还对此行“不摸底、心中惶惶不安”的基辛格，到这时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此次访华成果“超过了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所承担的秘密使命”。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公告。全世界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了。

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新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的祝福，因而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中美公告发表三天后，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外交部就掌握中美关系的方针问题发给各驻外机构的《通报》强调：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国际事务方面，“将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没有障碍的。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又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百般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这一席位长期被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窃据。建国20多年来，周恩来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努力。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第一次获得半数以上国家的赞同，但因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而仍未能通过。在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周恩来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表示：如果联大会议通过赞成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

作为美国方面来说，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它越来越难以操纵联合国。这就迫使它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政策，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甚至表示要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但同时又反对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主张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周恩来十分关注第26届联大的情况。8月21日，他召集党、政、军系统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宣讲外交部批驳美国政府的声明。当他询问与会者，美国为了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曾经同哪些国家开会时，到会的外事干部大多回答不出。周恩来当场举出这二十个国家的名字，并且作了分析，说：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出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

10月20至26日，基辛格“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安排”而第二次访华。才处理完林彪叛逃事件不久的周恩来，顾不上已持续一个多月的紧张和疲惫，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繁重的外交事务当中。

基辛格访华的一星期内，周恩来同他进行了10次会谈，除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和讨论其他国际问题外，双方主要就尼

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事前，美方并没有说要发表联合公报，中方没有预做准备。当周恩来看过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后，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公报草案仍沿袭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掩盖彼此之间的分歧，回避实质性的问题，是一个用漂亮辞藻粉饰起来的貌似观点已取得一致的公报。同时，周恩来也没有否认美方草案中的可取之处。他指示有关人员起草对案，提议：可以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在得到毛泽东认可后，中方起草出一份“各说各的”公报稿，其中将美方意见空出留待美方自己写。起初，基辛格感到中方对案“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觉得难以接受。但冷静下来仔细研究后，发现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经过反复会谈，美方终于同意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提出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26 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遵循周恩来提出的“各说各的”原则创造出来的这种奇特的、“过去没有过的”外交公报草案，使基辛格再次感到“不虚此行”。

当基辛格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一件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1 年 10 月 25 日晚上，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新闻媒介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20 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厦。在

纷纷登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者里，以亚、非、拉地区国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们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真挚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作为大国的中国，处处和他们平等相待，这同一些西方大国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种真诚如朋友的关系，是通过接触周恩来而感受到的。

新中国如此迅速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之外。联大通过表决后不久，周恩来向一位美国友人表示：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第二天，周恩来又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

> 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事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这次表决的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一向追随美国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

新中国在第26届联大上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及其追随者长期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失败。这个事实，又反过来促使更多国家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加速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访问。

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第一次美国总统来华访问，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周恩来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原则同意美方提出的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决定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租给美方使用。周恩来说：

> 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美方原来说他们自己带通讯设备，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买过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外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总能学到一点技术。

针对美方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周恩来坚定地表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2月中旬，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等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美国客人。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把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都讲了"，气氛认真而坦率。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

> 尼克松总统应邀来访，"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

> "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

意，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

尼克松在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五次会谈，主要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尼克松在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逐步实现从台湾撤军等）的同时，又强调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又说：“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直到25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仍没有确定下来。这时，美方已在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告诉美方：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马上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当晚，周恩来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由于公报尚未定稿，不一定能够发表，周恩来在宴会致词中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

2月26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

经过一番文字推敲和修改后，在27日定稿。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公报里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份来之不易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尼克松显得心情格外舒畅。在上海市为他送行的宴会上，他发表即席讲话说，此次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成立只有一个多月的田中内阁，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果决精神。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领导人"言必信，行必果"

中美关系的突破，使得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新的外交局面。

3月13日，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只隔了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并公布。两国之间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相继实现外交关系升格或正式建交。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受"尼克松冲击波"影响最大的，要算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指导对日工作。从50年代初打开中日民间交往大门，“以民促官”，到60年代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开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培育。1971年基辛格两次访华和第26届联大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现实，给予日本各界强烈震撼。日本政界、财界团体和人士接踵来华，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积极活动。长期以来一直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方老朋友们更是不辞辛劳地往来奔波，企盼早日实现共同的夙愿。

周恩来长期处在中日之间这一系列活动的中心地位。1972年上半年，周恩来连续同日本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人士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提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项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当然，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

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当天，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他要求新闻单位积极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在宣传报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出促进中日友好的精神。9日，周恩来在一次公开场合提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对田中对华关系声明的明

确回应。16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客人时进一步提出：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8月11日，在得知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后，周恩来立刻授权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

成立只有一个多月的田中内阁，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果决精神，毅然摒弃前任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把促进日中友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付诸行动。在这个期间，为了准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周恩来这时虽已发现身患癌症，但仍事无巨细，昼夜操劳。

解决中日之间邦交正常化，也存在一个台湾问题。不同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准备一次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日方断绝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官方关系，包括废除所谓“日台条约”。

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问题。周恩来曾同来华的一个日本学生访华团讲述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他说：从1894年起到1945年共51年，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最大的教育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

在对日本侵华战争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的原则是：毫不含糊地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向前看的方针，着眼于解决今后的问题。

1972年9月20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公报，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各项准备已全部就绪。

9月25日上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

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飞抵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当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

晚上，在为田中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祝酒词，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指出：

> “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田中首相就任以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在致词中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第二天，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提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对此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时，也问到“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中日会谈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战争赔款问题。还在

田中访华前，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转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入双方联合声明。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长期以来，日台关系问题一直是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田中来华前，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复交三原则，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终没有对三原则之一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作出承诺。会谈中，日方提出希望对他们国内的处境和困难给予照顾。因此，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在另外场合声明，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宣告结束。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方在什么时候作此声明了。27日，周恩来在同田中、大平会谈时当面问道：从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就建交了，双方互换大使需要多少时间？这句话实际是问日方何时采取废除"日台条约"的具体行动。大平明确回答："我们有决心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周恩来表示满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田中也写下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中日双方表明了相互信任的态度。

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从这一天起，中日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2年内，中国同世界上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安建设）

邓小平“复出”

——在1973年

“文化大革命”中销声匿迹六年多的邓小平再度“复出”，使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而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周恩来来说，这些都不过是意料当中的事情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

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介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宴会上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3月10日，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泽东似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他要讲的话早在半年多以前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

(柏) 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当然，在毛泽东这些决定性的批语之前，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这似乎便是毛作批示后达七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将邓小平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正是周恩来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当场示意陈毅子女把毛泽东的评价“捅”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

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了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10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惟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

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

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被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23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于“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

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潜藏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有关于邓小平的“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

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 年的 7 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 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仇恨。

同年 9 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10 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11 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2 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最后裁定，

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右实质。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在邓小平问题被搁置四个月以后，周恩来不失时机的一封信，终使僵持的局面出现转机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 年 12 月 18 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

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1972.12.18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二百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

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

> “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在将帅云集的会场，毛泽东亲自请出一位“军师”。病势沉重而心情放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亲笔写下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全文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职权。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放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安建设）

“长沙决策”

——在1974年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就在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大批“周公”之际，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加重。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取代自己的位置

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两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他们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谓“走后门”问题，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群众对“走后门”的不满，故意混淆两类不同

性质的矛盾，进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许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最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

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

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扶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

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

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1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取代自己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

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

周恩来清楚，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搞的“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阴谋，周恩来早就深谙其意。2月初，他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不久，毛泽东痛斥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同时，毛还制止下发“四人帮”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阻止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

江青等人在头一回合的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罢休。同年3月，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公开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

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

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表现，甚为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迫使江青收敛气焰。

这样，周恩来又赢得同“四人帮”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它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的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他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

行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民航等有关部门开会，反复研究飞行方案，对许多技术细节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负责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建议，为确保航线畅通，预先可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届时如果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还可以走另一条航线。当机组人员提出过去从未飞过西线，困难较大时，周恩来再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可以找法国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请他们帮助解决。”经联系后，法航很快提供了试飞所需各种资料，并主动派出领航员跟机协助。在周恩来精心指导下，东、西两线均试航成功，邓小平出国的时间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

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

4月6日清晨7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邓小平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赴机场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

此时此刻，只有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少数几位医生知道，一个多月里，周恩来一直是在抱病操劳，以致不得不一再推迟自己住院治疗的日期。3月中旬，当周恩来每日便血达100毫升时，他才接受医生建议，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被确诊是癌症复发。但这时周恩来仍表示还不能马上住院治疗。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工作仍达十几个小时，甚至夜以继日，超负荷运转。

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

> 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八旬高龄的毛泽东识破“四人帮”组阁野心，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不曾想到，他们发难和告状的结果，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终于不胜其劳，心力交瘁，住进离中南海不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这时，江青一伙以为时机又到，不遗余力地重又煽起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一股股恶浪。

6月中旬，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连续接见“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在谈话中，竭力宣扬所谓“现代的儒法斗争”。江青提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现在，即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现在也有，不能说没有。”又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不然，不会搞这么大的运动。”之后，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的论调，极其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就在“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大肆进行“批周公”的阴谋活动之际，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病准备赴外地休养的毛泽东，于7月17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当头棒喝江青一伙：“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

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他还严厉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全体到会的政治局委员郑重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并实际上已点明，这个帮派的头目即江青。

毛泽东此时严厉批评、警告“四人帮”一伙，表明他对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来所作所为的极端不满，亦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慑于毛泽东的警告，从7月中旬至9月底，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稍有收敛，但他们仍在喘息中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在当时条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帮”一伙极不情愿看到的。因为这又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干部要被平反，被“解放”。

9月30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建国25周年盛大招待会，受到在场近5000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所致简短的祝酒词，竟被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好几次。人们对自己总理所表达的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正是对“四人帮”一伙批“周公”、批“大儒”等龌龊行径的有力回击。

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

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见过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事有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

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沙决策”，江青等人策划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与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作了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305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

> 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305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了。

已拖延十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四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

先念等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305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另机前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

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安建设）

“全面整顿”的后盾

——在1975年

1974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病室中的周恩来，将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无形的巨大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斗争，谱写了1975年这艰难而辉煌的一页。

在四届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会后，他把国务院的工作郑重地托付给第一副总理邓小平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总理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这次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1975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1月13日晚8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江浙口音：

>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2800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5000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1月17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

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

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领导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他平均每周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单独面谈

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

“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偏置舆论宣传于不顾，在各种场合里，他大讲特讲的是另一种“大事”，另一个“中心”。

3月5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

>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中首先抓铁路运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铁路系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难”。1966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就因制造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而一举成名。之后，在“全面内

战”的几年里，一些重点铁路枢纽和路段一直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后来虽然采取了军事管制、军队护路等办法，但也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当时派性肆虐，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造反派便在铁路作乱。

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一些造反派重操“旧业”，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铁路交通严重堵塞，直接影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重要干线的畅通。至1975年2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直线下跌，仅达到4.3万车，与实际需要相差1.2万车；而铁路上的各种事故更是惊人，1974年内共发生行车事故755件，是“文革”前1964年的8倍多！

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一语中的，斩钉截铁：“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到会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顾虑，他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听到这些痛快淋漓、坚定有力的话语，到会许多同志不禁想起当年周总理痛斥派性、制止武斗，号召广大铁路职工抓生产、抓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一次次教诲。现在，虽然周总理病重住在医院，而实际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仍在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大家的心里感到有“底”了。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

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1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注。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包括：邓小

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3月1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称这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张还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4月4日，她在接见一批工人代表讲话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5日，她又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

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朝鲜金日成主席。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严批“四人帮”，打掉了江青一伙的气焰。“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

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

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做了一个翻来覆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3月1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应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做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6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6月7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女儿时，兴致勃勃地告诉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

>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

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指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8月18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9月底至10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

“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那“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八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宾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

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评《水浒》使“四人帮”得以向老一辈革命家进行反扑。在生死未卜的关头，周恩来奋起抗争，用极其悲壮的方式表示对老战友邓小平的支持

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过去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仍记忆犹新，并多次向国内外人士谈起。其中，也包括他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

1983年7月，邓小平回忆说：“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邓小平还讲过：当时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1987年10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

“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

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便是邓小平所讲他当时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机反扑的“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向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来发难了。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做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

在“四人帮”操纵下，从8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也亲自出马，在一些

公开场合大谈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她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借以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8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作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忿然提到：

> 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9月20日下午2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30年代初，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件”。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197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出说明，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

数年之后的今天，周恩来在决定其生命的手术即将进行的时候，他当着“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的面，毅然做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异常之举，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

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死神，又一次悄悄地从周恩来身边溜走。但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对

此，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正在领导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斗争的邓小平，此时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再走出病房，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啊！

一个月以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这一天，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仍然是上次的几个人：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车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话语，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

……

就在这年初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展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不得不因此而中断。

1976 年 1 月 8 日，78 岁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全国上下陷入一片哀恸之中。

同年清明节前后，一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北京，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迅猛掀起。这场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安建设）

后　记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组织撰写了《巨星灿烂丛书·周恩来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一书。

本书由费虹寰主编，参加本书撰写的人员有：廖心文、刘武生、熊华源、陈扬勇、费虹寰、安建设。

在撰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书籍：《周恩来年谱》(1898—1949)、《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传》(1898—1949)、《周恩来传》（1949—1976)、《周恩来选集》(上、下)、《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教育文选》、《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周恩来论林业》、《怀念周恩来》、《不尽的思念》、《我们的周总理》、《话说周恩来》、《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等。

由于撰写时间仓促，错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1年6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恩来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
作者=费虹寰主编
页数=556
出版社=北京市：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SS号=10499873
DX号=000000147109
URL=http://book.szd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147109&d=1F297A1F4EC2BA06D347E6DB3CB1D0F2